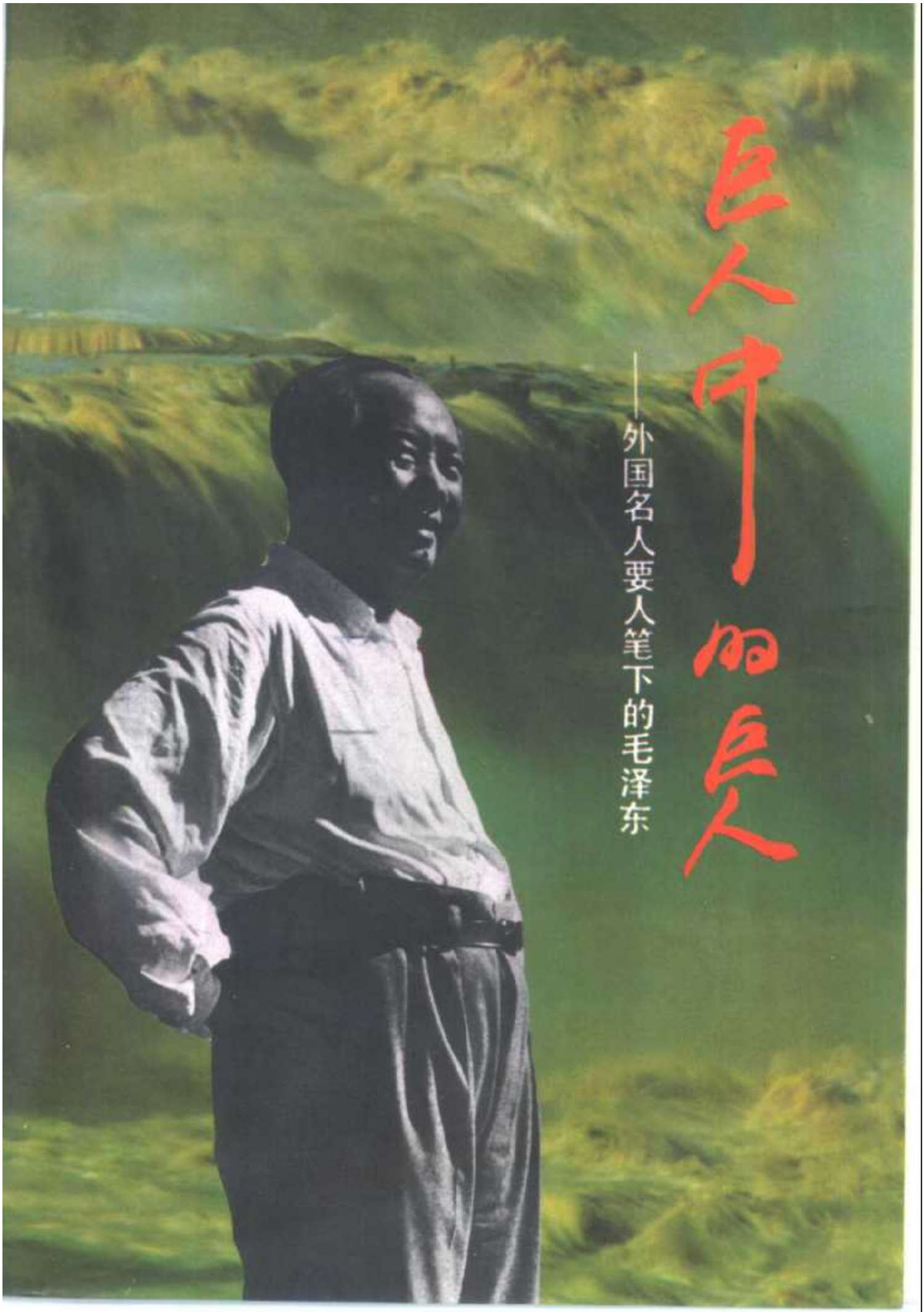

巨人中的巨人

——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

巨人中的巨人

——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

张一心　王福生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张一心，王福生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
ISBN 7-5035-0887-6

Ⅰ．巨…
Ⅱ．①张…②王…
Ⅲ．①毛泽东-生平事迹②毛泽东-评传
Ⅳ．A7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36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8.00元

·干部内参读物·

出 版 说 明

根据党校教学、科研工作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需要，本社将有计划地以“内参读物”的形式出版反映我国学术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成果，同时适当编辑出版经过精选的国外有代表性的政坛人物和学者的论著以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动态资料。出版这类书，目的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多地了解国内学术动态和国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基本情况，开阔眼界，拓宽思路，以求更好地针对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央党校出版社

引　言

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需要、体现群众意志、凝聚群众智慧的杰出代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然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伟大的时代造就出了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这历史伟人们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最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大变革的缩影。

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某些过失。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他们的伟大功绩，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和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

而毛泽东在我们这个时代那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中，无愧是最为璀灿的一颗。因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他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外国人，每当提到新中国，便会把她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每当人们走进北京，首先想要做的便是瞻仰一下他老人家的遗容；每当人们来到湖南，最想去的地方便是韶山。

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写的。当历史的车轮走进八十年代，又进而驶向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十一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温饱，又由温饱奔向小康的时候。一股“毛泽东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悄然兴起，并且正在进一步滚动、奔腾。从北方繁华的冰城到南方偏僻的山寨，从高级干部到普通群众，从专家、教授到一般工人，从大学校园到工厂、矿山、农村，从机关办公室到个体摊点，从学术界到出版界，都在探讨、在寻找。答案不一，观点各异。然而，无论这股“毛泽东热”的社会背景如何，民众意识怎样，文化审视高低，政治评价好坏，人民群众的选择就是历史的选择。不难断定，随着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到来，这股热将进一步走向鼎沸。

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巨人，他的理论思想、丰功伟绩，不仅根植于中华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又一代人。同时，他的思想和影响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迈出了中国，跨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正象美国专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文版序)中所说，“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毛泽东的理论思想从它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了国外的重视。在国外，从一些政治家到外交家，从国际友人到作家、记者，从专家、学者到一般工作者，从军事专家到普通士兵，他们当中，无论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还是加拿大的、墨西哥的、柬埔寨的、澳大利亚的，或是德国的、苏联的、秘鲁的、印度的，等等，等等，无论他们还是她们，怀着这样或是那样的目的，都是在研究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以后，更受到了世界各方面人士的

注意。为争取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研究它，从中吸取夺取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它，从中探求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世界思想史的贡献；反动统治阶级研究它，为扑灭革命、和平演变寻找对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人，尽管身份不同、动机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毛泽东及其思想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世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外国人在宣传中国人民革命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种种阻挠，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那一孔孔窑洞中，他以一个西方人所特有的眼光和笔调，纪实地描绘了这些被说成“赤匪”的人，并以一部《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人民中颂扬了毛泽东及中国革命的创造者们。通过它，毛泽东的革命事迹在美国广为人知。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以及印地语方言等近20种文字出版。从总统、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红星照耀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读者，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了解毛泽东的热潮。这一时期除了斯诺所写的专门介绍毛泽东的十几种书籍报道及各种中译本外，另有一些国外记者也相继来到了中国，象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根瑟·斯坦因等，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毛泽东的书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和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开展，许多外国的领导人、国际友人、专家、学者等等，通过各种渠道拜见了毛泽东。在他们所写回忆、报道文章或专著中，从各个角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称作是“巨人中的巨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世界上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革命家，国务活动

家，哲学家和诗人”。他们或多或少地懂得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毛泽东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而且“毛泽东的生平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等等。

随着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的日益临近，各种研究、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书籍也相继出版。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编者收集了许多过去和近年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这些书籍或多或少地介绍了外国人研究评价毛泽东的状况。为了便于读者系统地了解外国人是怎样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编者将其中一部分收集在一起，并对其按著作者的职业进行了分类。书中每个标题都是编者在详细归纳、分析原文的基础上后加的。另外，为方便读者，在每篇的前面都加了概要的说明。

由于外国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及世界观和阶级的局限，加之他们所掌握材料的限制，使得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着许多失实之处，有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为了全面了解外国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编者除对其个别地方进行删节以外，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所以，敬希望读者在研究和阅读时，注意鉴别。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编著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是编著自身的不慎造成的失实，当由编者本人负责。

张一心　王福生

1992 年 3 月 15 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王　杰　贾铁燕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苏彰秦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编　政治家笔下的毛泽东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
…… 〔美〕理查德·尼克松 (2)
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 〔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 (10)
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
…… 〔德〕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16)
力量、自然和威严的印象 …… 〔法〕孚尔 (19)
追忆毛泽东 …… 〔苏〕尼基塔·赫鲁晓夫 (25)
毛说：我接受博士的劝告 …… 〔美〕乔治·布什 (31)
三次拜见毛泽东 …… 〔日〕冈田春夫 (36)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 〔澳〕高夫·惠特拉姆 (40)
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 …… 〔英〕爱德华·希思 (43)
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
…… 〔巴〕布托·佐勒菲卡尔·阿里 (46)
毛说："西德人好" ……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48)
领导才能来源于他坚强的意志 …… 〔美〕理查德·尼克松 (57)
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
…… 〔墨〕埃米略·希尔 (60)
毛泽东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 〔朝鲜〕金日成 (62)

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的人 ……〔日〕田中角荣（64）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 ……〔苏〕尼基塔·赫鲁晓夫（65）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72）
跨越太平洋的会晤 ……〔美〕理查德·尼克松（73）

第二编 外交家笔下的毛泽东

完全靠自学出来的人
……〔印〕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80）
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苏〕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84）
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
……〔日〕大平正芳（91）
中国共产主义之父 ……〔美〕亨利·基辛格（93）
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99）
一个非凡的人物……〔德〕王安娜（104）
毛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美〕亨利·基辛格（108）
纵谈国际形势……〔美〕亨利·基辛格（114）

第三编 记者笔下的毛泽东

21年后重见毛泽东 ……〔美〕埃德加·斯诺（122）
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美〕海伦·斯诺（134）
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讲话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40）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秘〕塞莉亚·巴里奥斯（145）
法国人笔下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法〕K·S·卡罗尔（148）
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56）

忍耐和决断，自信和谦逊……〔美〕爱泼斯坦（160）
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
……〔日〕福原亨一（164）
“向杜勒斯学习”……〔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66）
他的生平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美〕埃德加·斯诺（173）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美〕埃德加·斯诺（181）
“他是中国历史这个剧中的一个重要演员”
……〔加〕马克·盖恩（189）
三次难忘的谈话……〔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行……〔法〕K·S·卡罗尔（214）
毛泽东的印象……〔法〕根瑟·斯坦因（220）
所有的斗争终须解决……〔美〕埃德加·斯诺（223）
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美〕埃德加·斯诺（227）

第四编　专家、学者笔下的毛泽东

“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232）
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
……〔美〕迈克尔·H·哈特（238）
毛泽东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英〕韩素音（242）
毛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
……〔美〕莫里斯·迈斯纳（247）
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美〕R·特里尔（252）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苏〕费德林（266）
毛泽东像一个有恩赐感的祖父那样……〔美〕R·特里尔（277）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征……〔日〕中嶋岭雄（283）
二十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美〕白修德（290）
他为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而遗憾……〔美〕李政道（295）
他有系统地毁灭已有的神话般的形象……〔英〕韩素音（297）

毛泽东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
……〔美〕R·特里尔（299）
毛泽东的领导作风……〔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305）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日〕野村浩一（308）
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
……〔美〕杨振宁（321）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英〕狄克·威尔逊（323）

第五编　军事家笔下的毛泽东

揭开我们时代军事奥秘的人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334）
毛泽东在掌握战争艺术方面是一名专家
……〔美〕塞缪尔·B·格里菲斯（352）
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军事领袖、军事理论家
……〔日〕宍户宽　中山敏雄（359）
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
经验的一个……〔美〕菲利普·戴维逊（368）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共产党取得
优势的钥匙……〔美〕亨利·基辛格（374）
毛泽东与孙子、克劳塞维茨……〔日〕伊藤宪一（379）
与军事战略大师孙子反其道而行之……〔美〕斯拉姆（383）
毛泽东的战略是具有各种特点的战略的综合体
……〔日〕浅野祐吾（388）
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综合研究……〔日〕持田真一（393）
反“围剿”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美〕斯拉姆（398）

第 一 编

政治家笔下的毛泽东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

〔美〕理查德·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自1951年任美国参议员起，尤其在担任副总统、总统职务期间，周游和访问过许多国家，与当代许多领袖人物有过直接接触。他在担任总统职务期间，也为中美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尼克松所著的《领导者》一书描述了十几位领袖人物，并以其亲身经历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领导者》一书。】

二十世纪中国这两位伟大领袖非凡的伙伴关系，在1972年以文化革命的结束和中美恢复友好关系的成功达到了顶点。

周陪我走进毛那摆满书籍的书房去会晤时，我记起了来北京前几天在白宫的晚餐上马尔罗对我说的话："你将同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打交道。"毛和我并没有进行谈判。他在估量我，我在估量他。他想知道我是否有一种同他的观点协调的全球观点。他试图弄清美国的富裕是否使我们变得温和了，以及在越南的麻烦是否削弱了我们意志的力量。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他们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周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象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

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又深奥的风度，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胸中同时盘算着各种思想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时，声调安详平板，在一个小型的会谈中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向大众演说，这种语调是不行的。

甚至在谈严肃的事情时，他也喜欢讲些难听的话。他爽朗地微笑说，“你们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你的票。”我说他一定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他异常愉快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即共和党是右的），希思首相也属于右派。”我猛然举出戴高乐的名字。他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接着他继续说，“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右派。当这些右派的人掌权的时候，我是比较高兴的。”在谈到我们恢复邦交时，我说了下面的话来证明这种观点：“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美国，至少在当前，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情，右派却能够做到。”

他还时常喜欢以自我否定来转弯抹角地说明一种观点。摄影师们在我们开始会晤时工作，我们就轻松愉快地交谈着。基辛格

提起了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把毛的著作指定给他的学生们读。毛答道，“我的那些著作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回答说，“我可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不过能够改变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1976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象一连串单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的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看到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正在为越南综合症而受苦，正要摆脱它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毛问了我这样一个要害的问题：“和平是美国唯一的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不过这种和平不只是意味着没有战争。我告诉毛，“那必须是一种正义的和平。”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和友谊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就要说，假如和平真正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我们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的动作全部僵化了。他的体态从来不曾优雅过。不过在八十二岁时，农民的拖沓的大步已经变成一个缓缓地拖着脚步走的老人了。毛象年迈的丘吉尔一样，仍然是自豪的。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相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

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路斯·特里尔在他关于毛的传记研究中写道，“毛的肌肉痉挛并不会引起人们的误会。他生命中的平衡，如果真有这种平衡的话，是来自对立面的冲突。他谈到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毛不象周那样，他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

作为政府政策的主宰者，毛容易冲动。他彻夜工作，白天起得很晚。他常常象斯大林那样，为了一些琐事把工作人员一大早叫来。他从日常事务中抽出身来进行长期的独自省察。他会盘问政策专家们好几个小时，然后溜到他的花园里去征求一个卫兵对这些政策问题的意见。

马尔罗对我说过，毛身上有种“巫师般的气质”，他是“心中有幻想存在，就为幻想所占有”的人。毛想象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类似大家庭的社会。当他得知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牺牲了我的儿子，或者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不过如果毛身上的猴气被这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毛要求人民中间的自发性。不过只有这种自发性适合他的幻想时他才忍受。当他们偏离了的时候，他就要通过运用国家的法律制约和残暴的警察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毛直到最终似乎都没有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产生了等级制，窒息了主动性，毁坏了自发性。

作为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通过战略上的洞察力、战术上的灵活性和令人惊恐的暴力，使他在历史上取得胜利。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使农民成为取代产业工人的革命阶级。他修正了列宁主义，用组成军队的士兵取代结成阴谋集团的造反者，来夺取革命的胜利。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同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而秦始皇的专制在帝王们中间是无可匹敌的。他说过，“你们以为你们把我们比作秦始皇，就侮辱了我们。可是

你们犯了一个错误，要知道，我们超过他一百倍！”

仅仅依靠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一种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和一种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毛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我在会见他时有一种感觉，他的意志力不知怎的是一种体质的特征。他的最生动的诗篇是在长征的战斗中间和战斗之后写的。当他写到斗争——特别是激烈的斗争——时的振奋情景，他似乎提到了意志的锻炼，就像别人所说的肌肉锻炼的那种情况。他以这种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因为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战胜的人。

1972年，毛用一种既可以囊括我们的会晤情况、也可以囊括整个中国的横扫一切的手势告诉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赞成这件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我们同他的友谊史，比你们同他的友谊史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同蒋会晤时，这位委员长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横扫手势，表明他的讲话是同大陆和他在福摩萨岛上的据点有关的。

我发觉这两个人谈到他们国家时都有某种帝王的味道。他们的手势和谈话似乎都暗示，每人都把他国家的命运同自己本身的命运等同起来。当这样的两个领袖在历史上相遇时，他们就不会妥协，他们就发生冲突。一个成了胜利者，一个成了被战胜者。

说起来也许很奇怪，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东方人。毛离开中国只有两次，即1949年和1957年在莫斯科同苏联领袖们会见。蒋只有两次到过亚洲之外旅行，一次是1923年随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作为四巨头之一到开罗去开会。两个人都经常长期隐居。毛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诗，蒋则在山间散步时把时间花在背诵古典诗词上。

毛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蒋在同我的会晤中从未想表现任何一种幽默。毛的书法是龙飞凤舞的，那不规则的汉字

分排成散乱的行列。蒋的书法则是刻板的，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全是由完整的线条构成的。

在我同毛的第一次会晤中，他提到蒋在最近一次演说中把共产党领导称为“匪”。我问他，他把蒋叫作什么。毛笑了。周答道，“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我们在报纸上有时候称他为匪，他反过来也称我们为匪。总之，我们是互相对骂。”周和蒋之间的关系就象公园里悬空铁道上起伏滑行的小客车，是突起突落的。周在二十年代初作为蒋的部下在中国军校工作过，据称蒋说周是一个“讲道理的共产党人”。可是几年之后，蒋却用八万美金来悬赏周的首级。总起来说，无论如何，我发现，周和一些其他问起过蒋的官员，在对蒋的态度上都有着奇怪的矛盾心理状态，这使我感到惊讶。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敬甚至还钦佩他。在我同蒋的所有讨论中，他从来没有过相应的尊敬对方的表现。

胜利以后毛在大陆每个地区、社会的每一级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统治。事实上，历史大概要把这一成就看作毛的最伟大的成就。

周的历史性成就更难抹杀了。他在内战中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1949 年以后，周要用奉行一种经济逐步现代化的政策来使务实主义缓和意识形态。但是毛政策中唐吉诃德式的政策上的摇摆不断地阻挠了周的努力。周还几乎是孤军作战，试图缓和共产党中国生活上的严酷性，允许少许的自由讨论，给中国社会灌输伯克称之为“有钱难买的优美生活”。不过，他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周将以他的外交成就而博得崇高的声誉。他引导的是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虽然如此，他还是利用提供给他的各种机会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就。我在 1976 年周逝世后不久会见他的遗孀时，我对她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

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然后我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周的非凡经历："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在我同周和毛的谈话中，两个人几乎都宿命论地谈到还有大量工作要他们去做，而他们能用来做这些工作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转回到年龄的问题上来，我感到他们明白自己快与世长辞了。

他们的晚年也没有用来追求同样的目的。据信，在周生命的最后一年，后来以"四人帮"闻名的小集团要逼他下台，这或许有毛的心照不宣的支持。那时，由于预感到随着毛的逝世会发生权力斗争，周不显眼地把他的政策的支持者尽可能多地安置在关键的岗位上。毛在无法预言地从一种政治倾向偏到另一种政治倾向中度过了他的晚年，在这个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害。他支持一个温和的务实派一段时间，然后就变得不耐烦，接着就联合极左派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然后自己又颠倒过来。

共产党中国的这两个伟大领袖，在1976年都去世了，相隔不到九个月。他们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过周的政策的生命力超过了他的寿命。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少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们，而且鼓舞了全世界的千百万人。但是毛象那些最革命的领袖们一样，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周也会破坏。不过他有着革命领袖少有的才能，能够做比统治废墟更多的事。他能保存过去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为未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它是否会幸存下来，而且最终做出的好事能否比坏事多，这要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象周那样决定，他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如

果这样做，中国在二十世纪里就不需要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的日本、甚至东面的美国。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

【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亲王，杰出的爱国者，前国家元首，现为柬四方联合政府主席。西哈努克自1956年至1970年，曾先后7次访问过中国。1970年3月，朗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合法政府。此后，西哈努克长期居住北京，组织流亡政府，领导国内反对朗诺集团的斗争。这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及我国许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公开声明，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一书。】

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

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象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到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送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 ……

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象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

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帐。可是军火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援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中国政府把整个外交部腾了出来——该部原来设在那个漂亮且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里——把它移交给一个“被废黜了”的国家元首和他的随行人员作为住宅，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它就是柬埔寨王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甚至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另外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的抵抗政府使用。一切便利与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来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而且总使我们感到我们接受它们是帮了他们忙似的。

在 1970 年 5 月 1 日与毛主席会见时，我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他回答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二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从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坦率，那么豪爽，而且总是想得出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毛主席在同我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有一次他曾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在我们友谊的很早阶段，我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喜欢同反对他的某些想法的

人谈话。在一次闲谈之后，他曾经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我回答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

他大笑说：“你很聪明，”他又说，“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太武断，而且事物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人性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

我还发现毛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象希诺芬和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我相信毛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象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程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

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当时都在纷纷揣测，以为推迟放焰火可能是由于毛主席的健康情况所致。

他重复说道，“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到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家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他对于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真使我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但是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

有个官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主席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24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好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后，毛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

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

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

〔德〕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前任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他曾于1975年1月访问过中国，并且于1月16日下午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他说："你们要继续迫切地警惕欧洲'芬兰化'的日益逼近的危险，苏联帝国主义搞欧洲'芬兰化'是要使西欧屈从于它。"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施特劳斯的《悼念毛泽东》一文。】

他是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著作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践，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样一位伟人，必须强调指出他的三大功绩。毛泽东成功地把他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为外国列强所左右的中国，不仅从政治上统一了起来，而且还使它摆脱了饥饿。我在1975年1月访问中国时就能断定这一点。人们都有房子住，丰衣足食。如果人们把这些情况同过去的情况作一比较，这确实是一项很大的成就；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我们自由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成就。

毛泽东的第二大功绩是通过按照他的设想改造中国的政策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如果人们回想一下以前几十年的痛苦情景，那么这同样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而他最大的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8亿人民又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在我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高潮就是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方早就知道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学说的态度。那次对我的邀请是经过双方长期周密准备的。那次邀请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一种古老的不仅是亚洲的外交学说认为，人们必须始终把邻居的邻居作为朋友，因为人们可以设想，同邻居的邻居有着共同的利益，即遏制共同邻居的冒险欲望。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欧和联邦共和国有着普遍的兴趣，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注意这样一位德国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同其他一些政治家，特别是同执政联盟内的政治家不一样，他以对当前波恩东方政策的明确态度，特别是以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扩张欲望的警告者而著称。中国的政策原则是，和苏联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特别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这一点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彼此利益的共同点。

我今天之所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人格，首先是因为北京领导人关于德意志是一个民族的主张现在还使我记忆犹新，北京领导人还提醒和警告我们要克服欧洲的分裂，提醒欧洲人要从最切身的利益出发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欧洲组织，这些提醒和警告同样使我难忘。如果概括一下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国的官方立场，那么可以说，中国的立场是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的，即现在有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美国和苏联。

因此，中国主张必须摆脱这种两极状态，中国认为，这种两极状态，使世界政治的进程充满了危险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多极体系，造成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就

是说，建立一个多种力量的体系。在这方面西欧理所当然地起着重要作用，这正是由于它同苏联西部边界接壤。

我是竭力主张欧洲政治统一的，这是个生存原则，因此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上中国的这种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当我在1975年1月16日那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会见毛泽东时，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正如他所教导的那样。在一间高大的不进阳光的屋子里，毛泽东站着接见我，这间屋子十分实用地布置着沙发椅，在沙发之间安放着小桌子。在我们进行的谈话中，他精神集中的能力和机敏表现得很突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的变化。毛泽东对我讲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要继续迫切地警惕欧洲“芬兰化”的日益迫近的危险，苏联帝国主义搞欧洲“芬兰化”是要使西欧屈从于它。他明白地说出了对于我们危险的事情。

力量、自然和威严的印象

〔法〕孚尔

【孚尔，法国前总理。孚尔曾于1955年访问过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毛当时对他说："法国可以再负起调解的任务……法国有光荣的历史，她一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这个任务属于法国而不属于中国，因为法国较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孚尔的《毛泽东会见记》一书。】

在会见毛泽东主席之前，总有连续多次的预先通知，使我联想起法国内阁危机之际受召前往爱丽榭宫的情形。星期三晚上，吴茅山先生（译音）邀请我们进晚餐，他告诉我说，主席一定会在次日接见我。我立即询问，把原本安排在次日的游览长城节目加以取消，是否比较恰当。同桌的客人听了，都坦然觉得好笑。主席其实不会在早晨接见我，也不会在下午接见我。他是惯于夜间工作的人。法兰克·哈里斯曾在清晨六时受克鲁格总统召见，而我这次决不会碰上这种难堪的情形。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安排早上游览长城，晚上会见主席，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见

我们的证实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为准备周全起见，当晚本来要在旅馆外吃晚餐，我们决定改为在旅馆内进餐。我们在晚餐时又遇见优秀的法文通译员罗大康先生（译音）和他的担任法文教师的夫人。罗大康夫妇两人曾在法国蒙巴纳斯区居住多年，两人都全心全意献身中国社会，政府允许罗大康先生解除教师职务，专心从事翻译法国名著工作。

晚上九时，贾先生正式来到小餐厅，请我们在九时五十分准备出发。时间到了，我们在大厅里集合，吴茅山先生不断看着手表，说再过几分钟就要出发了。为甚么需要这么准确地遵守时间，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

我们再次进入主席居住的地区，这次我们经过一道美丽的红色城门，它实际上常称为“新华门”。我只看到两名卫兵站岗。

汽车在南海边沿的垂柳夹道的路上行驶。

中国式的小院子，两棵紫荆，还有盛开的山楂花……主席走上前来在石阶下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我当时明白了严格遵守约会时间的理由，主席因此才能够对我们表示这么细致的礼貌。

毛泽东的容貌不若他最近一张照片那样年青，那样丰满，那样柔和。他的身材魁伟，精力充沛，（他在六十三岁时游过长江，全程超过十二哩）。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写到这里，就想起前几天某报有一位主要专栏作家，形容毛泽东年老体衰，患上某种怪疾，简直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到这些话就觉得可笑。

住宅一半像小宫殿，一半像平房。我们走进一间偌大的客厅，霓虹泛光灯和中国式吊灯一齐照耀，木雕装饰物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客厅一旁有一张铺着红布的会议桌，另一旁是排成半圆 形的一列扶手椅，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周恩来总理亦在座，还有张奚若先生、吴茅山先生，自然还有董先生（担任翻译员）。茶几上摆着绘上蓝色中文字的美丽瓷茶壶，所斟的茶不是普通的茉莉花

茶，而是杭州的特产的一种长叶茶。

毛笑着说："你们的代表团很小，只有两个人，意见比较容易一致。"

接着，他特地为了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而亲自向我道谢。

周恩来总理和主席比较起来，神情比过去显得更加调皮。他能够比别人先听明白我的说话，而且显然对此感觉有趣，同时他也很注意董先生的翻译有甚么错误，以便纠正它。他已经预先知道我的谈话题目，有了这个有利条件，他就能协助我说明我的一些观点，但同时却很清楚表明他并不同意。

毛主席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

"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

"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稍微垂着头，好象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他合拢着双手。有人曾说毛泽东身上兼有军人和农民的气质。

我说，由于他没有教条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因此而得益，他的一些灵活的方式，例如混合经济的方法，应该是有前途的吧？

"这大概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主席一向对农业经济很关注，他要求我对他说明法国的农产品合作社制度。我强调在这项制度下取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他摇摇头，同时表示赞同和否定。

"它在此行不通，农民的土地太少了，不可能划分为合作社经营和私人经营。"

我们预期"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告诉主席，我们对这些运动深感兴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

这些运动从一个很不同的角度上表现出了“自由化”倾向。

“是，一定要容许批评，否则，就会造成对问题不理解和愤愤不平的聚点。应该允许人们说出他们心中的话。”

他证实两个运动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受同一个思想倾向引导。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必须遵守一定的限制。”

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语调，使我对自己早已持有的见解更为深信不疑。这两个运动的确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如果从西方的角度出发，把它们视为重大的转折点，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并未超越共产制度的诸种限制，但我们再次回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中间路线：谨慎处理党外人士，把全国各阶层都容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之下，教育共产党员并使他们也明白这种目标。

主席又一次提到“洗脑”，但这个名词并没有我们西方人士所赋予的轻蔑含意。这个名词暗示，目前的运动对于共产党员是一个教育运动，而对于一些其他人士（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实际上的反对派）则是为了“治病救人”。

问题主要是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士倾吐他们的不满，让他们畅所欲言。

这种做法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成绩，一种对病人的良好治疗，而且通过这种做法可以进行鉴别，无论意见是如何的强烈，都可以从不满和保留的意见之中区分出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以容许的。反之，倘若出现真正的偏差——不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预料它很容易就会被孤立，而且通过目前已经展开的反击，把它有力地镇压下去。

毛泽东喜欢讲寓言，他引用了一则寓言说明最近的外交事态。

“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它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他是俄国渔夫或者美国渔夫?”

他微笑作出我意料之中的回答：

“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正是美国人使中国感到不安。

“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中国基地。”

“你的确认为美国人想要战争吗?”

“美国人民当然不要战争。”

我说：“美国领袖也不要战争。”我告诉他，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议的一星期内，我每天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见面，因此对他的深切和平愿望深信不疑。我曾经承蒙中国领袖承认我个人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希望他们注意这个证据。

我补充说，如果和缓的政策过去曾有一些进展，而目前已受到阻碍，那么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不能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领袖的。我设法使他了解法国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情绪和反感。我的见解似乎触痛了主席的情感。

他立即问我：“你是否说，法国人民由于这些事件而对中国怀恨在心?”

“当然不是，中国不牵涉在内，但人们总是喜欢按照集团、集团政策和‘共产集团’的概念思考问题。”

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对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之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全部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毫无疑问，“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苏联表同情”，但主席拒绝接受“共产集团”的概念。

他说：“你们不能和纳赛尔取得谅解，而他并非社会主义者。那么，你们还担心什么呢？只有四分之一人类属于社会主义，其

他的四分之三，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实行你们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进行和平的竞争和比较。”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应对未来绝望。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附带提起我对禁止核子试验的态度，于是我再一次对着周恩来说明我对裁军的见解，即把裁减军备所得款项拨为援助落后国家基金。

毛泽东说：“法国可以再负起调解的任务……法国有光荣的历史，她一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这个任务属于法国而不属于中国，因为法国较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

他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的礼貌，这是带着自豪感的一种礼貌。正因为中国已经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步，她才能强调她的缺点，她的落后和陈旧的一面。

我们在离开以前，和主席谈起他的诗。

“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词藻所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主席陪伴我们走向等待我们的汽车。他扶着我的手，指出黑暗中的一道石级。我透过车窗，最后一次看他的容貌——在哔叽紧身服装的紧扣颈领上，是他的为人熟悉的脸庞，他举起手来表现一种慰问的姿态，给我留下力量、自然和威严的印象。

追忆毛泽东

〔苏〕尼基塔·赫鲁晓夫

【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到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和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唯一参加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在这里，毛泽东第二次与赫鲁晓夫见了面。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一书。】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揭发了他对数百万诚实人的独断专行的惩办，揭发了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独裁统治。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

从某一点来说，毛做得对，他没有低估苏共领导班子中某些人所起的作用，这些人毫不动摇地正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而象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所主张的那样对斯大林的胡作非为保持沉默，则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在二十大上表现的英明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列宁的英明，我们只是过晚地重新发现了这种英明。

毛也开始诉说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满。例如，他谴责斯

大林支持过蒋介石。他还举出具体例子证明斯大林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具体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毛指的是斯大林写给蒋的某些信件。

毛还指责斯大林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小看了——因而妨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

毛特别批评了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态度。当然，斯大林要对共产国际负全面责任。

在向我们祝贺了二十大上作出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对斯大林进行了一大通批判之后，毛后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开始颂扬起斯大林来了。我想，他内心压根儿就不同意我们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我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相信毛一生也象斯大林那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对别人的看法也有着同斯大林一样的病态观点。

象斯大林一样，毛从来就不是平等对待他的同志的。他把周围的人看成是一件一件的家具，就是说，暂时有用，但总有用坏的时候。在他看来，家具（或同志）用坏以后就没有用了，他就要把它搞掉，另换新的。

我还记得在共产党会议期间我同毛的几次谈话。他讲起话来那么象斯大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交谈完全是诚挚的，但是毛对中国政治局其他成员的那些说法引起了我的警惕。他把一切都说成漆黑一团，对谁都没好评。

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我越是听毛讲话，越是不由自主地把他跟斯大林做比较。但即使我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我也远远没能得出最后的结论。我还不能预见到毛的品质将会以何种形式表露出来，也不能预见到他后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灾难。

毛问到我们党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一切都好，我们正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工作。不过，我也说到有些同志对布尔加宁（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不满意，不时有人提出给他调换工作岗位的问题。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后才发现我们领导班子的变化。如果我不跟他讲点我们领导班子内的情况，他也许会因自己讲了中国党内的事情而感到后悔。

毛问我们打算派谁来接替布尔加宁。我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我想我们的同志倾向于柯西金。

"柯西金？"毛说："这个柯西金是谁？"

我告诉了他，他要求我把他介绍给柯西金。我对毛想认识可能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感到高兴。我把这看成是毛希望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迹象。毛把柯西金带到一个角落里，同他谈了一次话。

我想（但不能肯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如果我们进行某种分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可能比较容易完成一些。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亚洲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我们想中国人集中精力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个好办法，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经济情况与中国相类似的国家。至于我们党，我们负责同西欧、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接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我们向中国同志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毛泽东说："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由苏联起领导作用，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的党，苏联党的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苏联请教。所以，我认为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的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我们一边听毛赞扬苏联和苏共，一边不由得怀疑他口是心非。

我们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总觉得我们两党两国迟早会发生摩擦。

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发表了一次演说，其要点如下："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他讲的最后那句话比我这里复述的要粗鲁，但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说的了。我坐在孙逸仙的遗孀旁边。她听了毛的话后，失声大笑起来。毛也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跟着笑了。但是毛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首先，毛应该考虑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话应该检点一些，更严重的是，他说话的内容令人深感不安。除了由孙逸仙夫人带头的那阵大笑之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对于这样的一个演说，谁也没有精神准备。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

毛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一心想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我记得当我告诉他我们希望解散北约和华约这两个军事同盟的时候，他表示怀疑说："我认为目前你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假如西方接受这个建议，你们就得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军。结果，民主德国就不能维护其独立，就会崩溃。那时我们

会落到什么境地呢？我们就会失去民主德国。”

那还是毛讲“我们”，也就是指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关于民主德国的意见也许有点道理，但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公开建议解散这两个同盟是为了宣传的目的，我们肯定美国不会马上就接受的。等到就北约与华约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成熟时，民主德国就会发展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了。

我还记得我同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谈，那次会谈说明了毛当时态度的发展。会谈前不久，国防部长朱可夫根据我国政府制定的方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警告说，对于任何胆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盟国）的侵略势力，苏联都将给予反击。我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但毛耍弄外交手腕，只评论朱可夫的话，不评论我的。

“我认为朱可夫的那个声明是错误的”，毛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采取朱可夫声明的立场，侵略势力就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消灭掉——先消灭一个国家，再消灭另一个国家，直到把我们全部搞掉为止。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一心想干的事。他们想分而克之。关于这一点杜勒斯已经讲了很多。再说，毛同志，朱可夫的讲话也不光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反映了我国政府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朱可夫讲的那个方针 。”

“不见得，”毛回答说，“如果敌人从西面进攻苏联，我看你们就不应该同他们交战，你们不应该反击——应该退却。”

“什么叫‘退却’？”

“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 1 年，2 年，甚至 3 年。”

“根据你的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撤退到哪里去？我们又为什么要撤退？要知道，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我失败啊！”

“未必。”毛说，“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你们不是一路撤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动员力量进行反攻，并且一直推进到柏林吗？”

“那当然是的，可那时的撤退既不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是敌人把我们赶跑的，敌人逼着我们后撤。有些人以为斯大林是把希特勒引入纵深以后再消灭之——或者以为当年库图佐夫故意让拿破仑一直推进到莫斯科，然后把他打败。毛同志，看来你就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斯大林在德国人打到斯大林格勒之前根本扭转不了战局，正象库图佐夫在法国人推进到鲍罗季诺之前不能打败他们一样。如果你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读一读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作好反希特勒战争的准备——而这种无准备状态几乎送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撤退3年以后再来顶住敌人的入侵。”

“我不同意，”毛说，“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就能参战了。”

我紧紧地盯着他看，但从他的脸上无法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毛同志，下一次战争可不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了。今天美国人的原子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有核武器，并且正在加紧用这些武器来装备我们的部队。下一次战争不会是以敌人跨过国界发动入侵开始的，而一开始就会是敌人用导弹或炸弹袭击我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用足够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便敌人给我们造成多大破坏，我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同样大的破坏。”

毛没有被说服。他后来开始攻击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公然声称这个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执行下去势必酿成和平主义。不过，在当时，他还只是表示怀疑而已。

毛说：我接受博士的劝告

〔美〕乔治·布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前任总统。1975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来到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身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1974.9—1975.12）的布什参加了这些预备性会议。基辛格希望见到毛泽东，最后如愿以偿。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接见了基辛格、布什等人。毛泽东当时对美国客人说："我快要上天堂了！""我收到了上帝的请帖"。因为毛泽东主席当时正生病。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布什的《布什自传》一书。】

国务卿基辛格于1975年10月19日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象以往一样，他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3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无人能就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将谈些什么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和周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象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他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象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1964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象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对美国推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说，这是一项“缓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1100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不同点之后，基辛格说：“我不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然而，基辛格这次先遣访问的一个主要未知问题是，他是否会被邀请会见毛主席。象以往一样，中国人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采取了拐弯抹角的回答方式。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原文如此——译者注）有意提起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不久前来访时会

见了毛。王是毛主席的侄女。她补充说，希恩为这次会见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基辛格明白了她的意思，说："如果这是有关是否我想见主席的官方征询，我的答复是我想会见他。"

几小时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了邓和乔。我看见邓手中拿着一张写有几个中国大字的纸条。邓看着纸条，中断了讨论并宣布说："你们将在6点30分会见主席。"

毛居住在离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一座幽静的高级官邸中。我们穿过风格独特的大门，环湖而行，又穿过几处院落，终于来到那所房子前。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已守候在那里。他们跟随我们穿过几间屋子，进入了毛的起居室。

这时已81岁的毛正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他在两名女服务员的搀扶下站起身来。这是我来中国后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从远处观察，我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震惊。当他按来访者的职务高低顺序首先对基辛格表示欢迎时，只发出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喉音。

我第二个被介绍给他。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显得要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黄褐色的皮肤，握手很有力，还是相当健康的。他身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剪裁合体的服装，脚穿褐色袜子和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白底黑布鞋。

基辛格问他感觉怎样。毛指指头部说："这部分工作得不错。我能吃能睡。"他拍拍腿说："这一部分不太好。走路时它们不得劲。我的肺也有些毛病。"他稍停了一下说："一句话，我感觉不太好。"他笑着补充道："我是个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橱窗。"

基辛格坐在毛的左侧，而我又在基辛格的左侧。环顾这个房间，我看到一侧墙上安装着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部书法方面的书。房间那头的桌子上放着一些医疗器械和一只小型氧气瓶。

毛以充满哲学意味的口吻说："我快要上天堂了。"此话出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之口，听来令人惊讶不已。毛说：

“我收到了上帝的请帖。”

“别急着接受它”，基辛格笑着应道。

毛无法说得很连贯，就费力地在一个便笺簿上写字，以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写好后，坐在旁边的两位女士就起身凑在一起研究写好的词语，弄清楚他所要说的意思。毛写道：“我接受博士的劝告。”中国人在称呼亨利·基辛格时，爱双关性地使用“博士”这个头衔。

亨利点点头，然后改变了话题。他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毛对此的反应是伸出他的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说：“你们是这个，”他指了指大拇指，“我们是这个”，他举起了小拇指，“你们有原子弹而我们没有”。由于中国早在10年多前就已拥有核武器，毛这里显然是指美国有比中国更强的军事力量。

基辛格说：“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东西。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写下了他的回答，他的一位助手拿来给我们看。上面用英文写着：YES（是的）。

主席和国务卿又就台湾问题交换了意见。毛说，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或许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在我看来，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外国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他们的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之前。在与性急的西方人打交道时，他们把时间及自己从容不迫的文化特性视为盟友。

如同邓和大多数其他革命领导者，毛也是农民出身，在正式外交会谈中经常使用中国的粗鄙俚语。当转到另一个话题时，他形容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象“放狗屁”一样无关紧要，一位女译员忠实地把它直译出来“a dog fart。”

即使满口粗话的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也讲不出这种词。

随着会谈的进行，毛似乎变得更强壮和更机敏。他频繁地打着手势，将头从一侧摆到另一侧，看来已被谈话激励起来。他频

频提到造物主，评论道："上帝保佑你们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因为我是个好战分子，又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呵，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3个。"他朝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点点头。

在会见快结束时，毛把话题转向温斯顿和我。他朝我打着手势说："这位大使处境艰难呵。你为何不来作客？"

我回答说："我很荣幸。但我担心您很忙。"

"噢，我不忙，"毛说，"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读国际大参考。你应来作客。"

当福特总统在5个星期后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那时，关于我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新职的任命已经宣布。在第一次与基辛格一起会见毛之后，我曾与联络处的有关专家谈到毛说的他希望我去作客的邀请。我说我最好按毛说的话去办。但这些专家认为，这位主席这样说只不过是个外交姿态，所以我大可不必当真。然而，在一年后——此时毛已去世——我和芭芭拉再次访问中国时，我向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了毛主席的邀请。

这位官员说："你本应按照您的直觉去做。我敢担保，除非毛主席真的有意，否则他决不会发出这个邀请的。"

三次拜见毛泽东

〔日〕冈田春夫

【冈田春夫，曾任日本国会议员。他曾于1960年、1964年、1967年，三次拜会过毛泽东主席。他认为："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是20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冈田春夫的《缅怀毛泽东主席》一文。】

我要谈一谈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亲自感觉到的毛主席的形象，但是否正确地领会了，也并不是有把握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家，因此，我觉得要真正全面了解他是不可能的。

我拜会毛主席，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60年，第二次是1964年，最后一次是1967年。

1960年，是日美安全条约在这年春季成了国会里的大问题的时候，而且同时又牵联到美国的亚洲战略，所以也正是亚洲各国人民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中国也多次举行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集会。

那样气势磅礴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于6月阻止了艾

森豪威尔访日，岸内阁全体辞职，但条约却自然成立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民心中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挫折感。正在这样的时刻，中国邀请了围绕着反对安全条约进行斗争的一些人。在国会方面进行斗争的我和当时的社会党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委员长黑田寿男访问了中国。记得那是10月底或11月初的时候。

在北京期间有机会见到了毛主席。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使当时感到遭受了重大挫折的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我们认为，那不是对我或黑田个人的鼓励，而是对日本人民的鼓励。

那时毛主席肯定地说，不仅日本人民的斗争，凡是人民的斗争都必然有高潮的时候，接着就是低潮的时候，但是低潮以后还会有高潮。这第二次高潮的浪头多半比第一次更大。这是自己在中国革命历史中也深深感到的。所以日本人民虽然遭到了挫折，但人民的斗争将来一定会形成更大的高潮而发展起来。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听了这话都感到心里热呼呼的，深受感动。可以说他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伟大的政治家，他那和蔼可亲、从容不迫的伟大形象和充满信心的声音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忘不了。

第二次会见是1964年，是我组织了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和积极分子35人齐集北京的时候。

在会场里，身材魁伟的毛主席站起来，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手很大，很柔软，很温暖。

毛主席的幽默而温和的欢迎词一下子就使我们这些日本人紧张而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了。话是怎么说的，记不清了，但意思是说日本的社会党是一个奇怪的党，和不斗争的西欧社会党不同。在这和蔼的气氛中会场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有和我一起来的北海道荒哲夫（北海道议会前议长）站起来说话了。他说的大意是，苏联至今不把北方领土归还日本，身为日本民族的一员，感到非常遗憾，毛主席您是怎样想的？这时

会场立即静了下来。老实说，当时我曾经想，提出那样大的问题，不大好。因为那时中苏争论虽然已经表面化了，但主要是理论问题，还没有出现彻底对立的情况。

毛先生通过翻译仔细地听了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但是很快就开口了。首先说，“苏联本来就贪心太大。”接着举出了具体的地名，说明苏联夺取了中国的领土，也夺取了东欧国家的领土。然后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这样贪得无厌地扩张领土。日本民族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合理的，我们坚决支持这个要求。”

中国至今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一贯支持日本。因为12年前，毛主席已经亲口说了。而且在中苏对立越来越激化的阶段提出北方领土问题，表明毛主席通过领土问题果断地论证了今天中国所断定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之，生动的表现出一个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的思想家的气概。

第三次会见是1967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毛主席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1960年、1964年见老了。当时谈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是在这次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站在8亿人民的前列，而且提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社会主义革命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并付诸实践，看到毛主席这样刚强的形象，他那豪迈的气魄，感到实在佩服。

我这三次会见的感受，简单地说，就是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是20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有人说见到了毛主席的人就象是被他那无限的伟大气魄迷住了一样，他的气魄之大是我们无法比拟的。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锐敏的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

毛主席的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不论是作为革命的思想，作

为政治思想，还是在哲学领域，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这样世界历史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之，矛盾论和继续革命论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是极其重要的贡献。历史很快就会验证其正确性。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澳〕高夫·惠特拉姆

【高夫·惠特拉姆，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曾于6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在他看来：由于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受到了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惠特拉姆的《毛泽东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一文，此文原载于1976年《澳大利亚人报》。】

北京寒冷而萧瑟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坐下来准备会谈，四周是官员和译员。

4点30分时，电话铃响了。周恩来在隔壁的房间里接了电话，他当时已75岁。他回到桌子边说："主席现在要见我们。"

周恩来立刻把我带到我们的汽车旁，我们驶过不长一段距离，来到主席的住所。这是一座朝东的朴实无华的建筑物，前面是一个小湖，对面是紫禁城。

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会面。这是一间暖和而舒适的房间；如

果再小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工作室。那里放着大的扶手椅；气氛表明，他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我注意到了西方的一些百科全书；书架上放满了数不清的书匣和卷轴。

毛站起来迎接我，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高大得多。他矍铄的精神，永不衰减的勃勃兴致，则是无疑的。我还记得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好象他仍在思考着深奥的问题，虽说对他的客人优遇有加，礼貌周到。

我们开始了谈话。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的特点是很热烈。毛从不感到无话可讲。他似乎跟我一样兴致很高。

我们曾对比了中国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我说，他的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的党是一个进化党。

“啊，达尔文主义的”，他笑着说。

“是的”，我回答说。

“达尔文港是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吗？”他问道。

我解释说，达尔文港原先是以帕默斯顿勋爵的名字命名的。我想，他认为，我们最北面的这个城市用来纪念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比用来纪念一位英国首相更为可取，但是，打动我的是他的反应之快。他不可能预料到我会提到进化，但是，他立即把这个词同澳大利亚的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很说明他对西方哲学很关心，他对这个地区的地理和发展也很了解。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他最后说，“跟我一起走出门吧”，好象要离开的是他，而不是我。我们握手，我朝引导中国摆脱混乱和奴役，并使它在世界上占有目前地位的这个人，看了最后一眼。

当天晚上，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我还要主持悉尼·

诺兰壁画展览开幕。在祝酒之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一位年轻妇女让大家都安静下来，静下来后，她宣布：

“总理会见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中国人的反应是令人惊讶的。房间里充满了掌声和不可能是虚假的欢呼声。在这一片笑脸中，我感受到极其强烈的友善情谊。

毛的存在和人格似乎已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他是当代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证据表明，他不仅为他的人民所钦佩和追随，而且真正为他们所爱戴。他的政府是简朴的，但却是诚实而有效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受到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指导精神。

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

〔英〕爱德华·希思

【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英国前任首相。希思曾于1974年6月和1975年9月两次会见过毛泽东主席。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希思的《不停顿的革命者》一文，此文原载于1976年英国《每日电讯报》。】

当我1974年6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

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

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那一次，以及1975年9月的那一次，我们都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谈话是从不停顿的，因为他的两名译员几乎是在同声翻译。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

万中国人民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他们对他的忠心正是由此产生的。

从我同他进行过的两次长谈中，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和我与之进行过讨论或谈判的许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

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问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我问他一个他不想谈及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不想谈。

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就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并要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考虑进去。

关于我们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以及同我们两国中的一国有关的问题——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

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这些都是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能否取得成功——实际上是政权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能否比在他所废除的封建主义制度下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

可是他对这一点也是抱现实态度的，一年前，我周游了那个国家——先是到西部，然后到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方，最后是到东海岸——以后，把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说："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这确实是他的问题，也将是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这种势头继续下去。

毛泽东的红书里的思想为的是使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心情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农业生产，因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此。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他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终将发生冲突。他唯恐赫尔辛基会议表明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了下来，并问及美国是否继续具有保住它自己的地位和西方的地位所必需的意志。

在他的世界战略的见解中，他赞成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欧洲，这显然是因为这是合乎中国的利益的，但也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苏联的影响扩大到我们欧洲。

他在许多方面称赞英国人。我上次见到他时他说，如果发生冲突，当然英国人会再次坚持到底的。

他很高兴的是，在我当首相的时候，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也很高兴我使英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

他还认为，保守党政府对苏联是坚定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表明，英国人不会听任任何人的摆布。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处在一切事务的中心。亿万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

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布托·佐勒菲卡尔·阿里

【布托·佐勒菲卡尔·阿里，巴基斯坦原总统，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发表的声明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认为“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所发表的声明。】

象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象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毛说："西德人好"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赫尔穆特·施密特，原联邦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974年至1982年出任总理。他力主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1975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在会谈中，他与毛泽东在哲学、国际关系、军事等方面广泛交换了意见。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在这部回忆录中，施密特记述的是他与中、美、苏三大国领导人的接触、会谈的情况，并对这些领导人直率地进行了评价，尤其对同毛泽东主席的会晤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述。】

1975年10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毛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4年以后，即1979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

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10年之后，1984年9—10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直爽地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这次访问于1975年秋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服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发夹。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70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北京先是给我一个出乎意料的“非中国”的印象。一条从东到西、又长又宽的长安大街显然是在战后年代穿过北京老城修起来的，它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半。昔日的“紫禁城”就在市中心。由花园、大殿和宫殿组成的这座建筑，正好位于长安街的北侧；对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与东西两侧的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联接成一个松散的整体。

政府各部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大建筑物更多是斯大林主义的建筑风格，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某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因素，象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首都的很多战后建筑一样，难看而单调。但是，大街上无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上下班高峰时成千上万辆晚上不亮

车灯的自行车，还有那街旁一行行的白杨和梧桐，居民楼阳台上数不清的花盆，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幅生气勃勃和亲切舒适的景象，尽管这种景象对我们是陌生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相当难看的、蓝色或灰色的服装，但他们不象莫斯科人那样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难以接近的面孔。

毛主席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话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木刻般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周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这一点可能同当时党内派别和集团的斗争有关。周恩来已危在旦夕，毛本人的去世似乎也非遥远将来的事。也许这些谈判对手这样装扮一下，为的是掩饰他们的思想，以便不致于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之争中出现对他们不利的结局，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甚或惩罚他们。然而，1976 年 4 月，邓还是被毛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还是伟大主席的语录红小书盛行的时代。

毛的住宅在紫禁城里靠近边缘的地方。从外面和里面看，都不怎么显眼。墙上没有挂照片或轴画，屋里摆了一些公务需要的家具、办公用品、几个软座沙发，呈半圆形，沙发扶手和坐垫上铺有花边。站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可怕的，他垂着下巴，张着嘴巴：一副衰老的面孔。毛不能走过来欢迎我们，这是一位得过严重中风的人，这是我的感觉。我们一起拍了“家庭照”：我的夫人，我的同事库特·格沙伊德勒、克劳斯·伯林和玛丽·施莱，邓小平以及毛和我的工作人员，其中有我们的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接着，绝大多数陪同人员被迅速地请了出去。中国电视台拍下了毛欢迎我们的场面。晚上电视台播放这一节目时，我的印象

是：这是让人民对他们的领袖即将终结生命作准备。这次会见开始时似乎纯粹是一次礼貌的姿态，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气喘，已不能发出适当的声音。他周围的三位女士中的一位好象是在编造他的欢迎辞，但她装着是在翻译。

然而，这个失望的印象却是错误的。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毛坐下时需要人扶着——，马上就开始了一次活跃的辩论。就体质而言，他无疑已成为一个残躯，但他精神集中，思想活跃。他在坐下的时候说，他的腿已不听使唤，讲话也颇为困难。三位女翻译（其中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是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在翻译之前就他想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这种情况在这次谈话中经常出现。有时她们反问一下，如果在毛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

显然，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程序，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有时还伴随着女士们的哄笑声。人们毫不拘束，也没有一点宫廷式的敬畏感。但是，先把他的意思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这种翻译技术确实很花时间，很明显，他发音很吃力。由于这两个原因，他特别注意讲短句。他说话不用华丽的词藻，但不无诙谐幽默。

谈话是以相互恭维开始的。关于德国，毛说："德国人好。"然后他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我谈到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也提到玛丽·施莱特别喜欢毛的诗篇。毛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了他显然打算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们同意，就苏联的战略和对莫斯科采取正确的战略问题交换意见。为促使对方作出反应，我决定作比较广泛的论述："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

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毛表示，讲得好，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的（即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我反驳说："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议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毛回答说：他知道这些，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理想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的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的是对的。"

这段话使我们离开上面的题目讨论了10分钟的哲学问题。我不想进一步讨论恩斯特·海克尔和我40年前在我父亲书架上发现并读过他的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世界之谜》。对黑格尔我只是说，德国有些人把国家这个概念神秘化，他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当然，我表示了我赞成康德学说的意思。然后，我把话题转到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天才，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却更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作为对军人的一堂课来读，即：在战争中，也是政治领导优先，而不是——象鲁登道夫所认为的那样——军事领导优先。由此我得出结论，战争仅仅是供领导选择

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们绝不可以坚持战争是唯一可能性的观点。”

毛继续发挥他的思想，防御战总是比进攻战好，因为通常是进攻者遭受失败。正如蒋介石或者是进攻越南之后的美国人一样，威廉二世也不得不吃这样的败仗。“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打死5万人，受伤10万人。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我问道：“你如何看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毛回答说：“要打仗。”他简直是被这个思想迷住了。他接着说：“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欧洲不团结，对战争又怕得要死，尤其是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美国人基本上也是如此。也许南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的抵抗精神强一些。如果欧洲在今后10年内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00万西德人就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对毛的最后一个比较我未进行详谈，因为我不愿让人散布这样的谣言，说这位伟大的主席和联邦德国总理讨论了西德为了重新统一的目的而发动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荒唐想法。我只是说：“我们的军队属于世界上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我们军队的精神素质也是如此。在危急的情况下，我们能很好地自卫。但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的看法的急剧变化。什么东西使你如此根本地改变了对苏联的判断？20年前你讲的完全不同！你从那时以来在同莫斯科打交道中有些什么经验？”

“是苏联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是中国。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已不再是斯大林那样的人物。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类，他们都背叛了列宁的事业。”

但他本人不是还主张不断革命论吗？我插话说。他是否认为以后几代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完全不可能再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

——比方说在对待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方面以及在政治领导高于官僚机构方面。

毛突然再次以老革命家的火性打断我说："不，不，不！这些他们都不会干！"我问他为什么不会时，他说："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强，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太多核武器。"对此毛回答说："又怕又不怕！但首先是他们有400万军队！"

谈话中，不论什么时候提到苏联，50年代末苏联的"背叛"对毛所产生的那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都是明显的。对苏联的不信任感显然是根本性的，这是构成他当时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因素。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看法仅仅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派生出来的。如同毛对其他西方的来访者试图做的那样，他想引起西方的不信任感并推动西方为建立强大的军备作出努力。要是在10年以后，里根总统和他的头脑简单的部长温伯格一定会对毛的刻板式的反苏观点感到高兴。

当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向毛说明，他不应当把德国的和平意愿同软弱、缓靖、甚至屈服于莫斯科混为一谈。联邦德国寻求缓和，但只能是建立在安全不受损害的基础上。我们所谋求的，不是欧洲一些弱国同一个占有优势的苏联进行合作，而是在一个联合的、有防御能力的、因而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欧洲同一个不可避免地同样强大的苏联进行合作。

毛看来是认真对待我在这番说明中所表示的决心的。除了谈到越南战争之外，他没有对美国作贬低的评价。但是他表明，他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履行其所有的战略任务和联盟义务。话题又转向欧洲。毛重复了他的名言：欧洲太散、太弱。我对此表示怀疑说："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过数百年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发展之后，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苦的任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欧洲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洲将是很强

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会不会把它的压力转向中亚甚或远东？”

毛说得非常干脆：“这是可以设想的。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为对付他们的到来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谈话又转向亚洲地区。我问到日本的作用，问到他对日本安全依赖于美国的看法。毛毫不犹豫回答说：“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足够的粮食。光人口数字还不是一个足够的因素。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

嗣后，他又补充说：“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地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诺言；另外还有近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我握着毛的软弱无力的手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说，他的思想在我观察世界形势的马赛克中是一块宝贵的石头。然后我补充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的意义。”

毛冷静地回答说：“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这时，我引用了滴水穿石这句成语。他接着说：“是的，但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水，你要用你的水来穿石。”这句话完全是双关的，在座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哄堂大笑起来。

下午，中国驻波恩大使的夫人问我夫人是否看到毛。我夫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握了毛的手。这位外交官的夫人接着便激动地紧握我夫人的这只手，因为这只手刚握过毛的手。我夫人感到，这一姿态同时包含着高兴、钦佩和羡慕之情。

在毛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一言未发。他坐在沙发椅上将近两小时，没有表示他对整个谈话是如何看的。但在翌日，

他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谈话。在我拜会毛之前，邓和我已经进行过一次详细的会谈；此外，我们还在一次或两次宴会上会晤过。在这些会晤中，邓请我谈谈我对世界战略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

总括一下我当时的印象，我觉得毛对世界政治的看法依然是盯住莫斯科不放，虽然这种争吵起始于近乎20年之前。中国领导人显然对北方的潜在的军事威胁忧心忡忡，但他们把这种忧虑隐藏在自豪、怀疑和蔑视的后面。另一方面，由于我了解苏联害怕中国人口不断增加——两个大国的人口比例是1：4，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曾多次向我表示过这种担心——，所以两大国之间进行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事实上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在两个巨人之间发生一场战争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从北京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目前担心的完全是另外的事，他们基本上把精力集中于内政，而不是外交。然而他们绝不忽视大的战略。

毛本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的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但列宁周围的俄国领导层面窄，也许在中国所形成的领导层按比例来说也不算广，但由于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其领导层就人数来说要多得多。而孔夫子、老子和佛教的光辉数千年来就一直照耀着中国。

领导才能来源于他坚强的意志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

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止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

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

〔墨〕埃米略·希尔

【埃米略·波尔特斯·希尔，墨西哥前总统。希尔曾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偕夫人访问过中国，并且两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后来他根据会议的材料写了《中国》一书，此书也曾在中国发行。希尔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希尔所写的，此文原载于1976年《墨西哥先驱报》。】

我曾应毛泽东先生的邀请偕同我夫人访问过中国。我们在中国过了两个月，看到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进步。

我曾两次见过这位伟人。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发行。

第二次会见是在他的家里，我是上午十一点整到达的。当我下汽车时他就上前来迎接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您夫人怎么没有来？我回答说：她早晨起来时觉得有点感冒，天又在下雨，我让她留在饭店里了。

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他亲手递茶和递面包。

后来他问我有关墨西哥和墨西哥革命的一些问题，我对他说，我们的革命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以完全墨西哥的哲学为指导的。

我对他说，我们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几乎三千公里的边界，我们遭受过三次入侵，在第一次入侵中失去了我们一半以上的领土。

美国政府企图使我们不在宪法中写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最进步的原则。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继续进行会谈，他给我描述了如何开始反对英国、日本、法国和其他强占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题为《中国》的书，这本书广为发行，包括在中国本土上。

当我回到饭店时，我看到有位医生在那里，他是毛先生派来给我夫人看病的。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毛泽东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朝鲜〕金日成

【金日成，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金日成曾经在中国战斗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多次来中国访问，并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接见。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1976年9月9日金日成悼念毛泽东的唁电，此文原载于197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积极支持和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同志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在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阻挠，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同志为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的人

〔日〕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他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面这段文字是1976年9月9日，田中角荣就毛泽东逝世向报界发表的谈话。】

接到具有数千年友好历史的邻国——中国的代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感到不胜悲痛。

为结束日中两国间数十年的不幸历史，我曾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访问北京。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业并不是事务性地就能解决的。为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决断的，是新中国的八亿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为日本、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作出的伟大决断。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

〔苏〕尼基塔·赫鲁晓夫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衷于"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

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1957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撤退。”

“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我们和中国的裂缝比这要深。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危险的。这次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独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党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当然懂得这种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大会揭露并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毛泽东则正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复杂现象。所谓个人崇拜有点像宗教。很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祷告："主，可怜我们；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些祈祷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当然没有。但是人们还是照样办，继续相信皇天会降福的灵验。

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我国也有反映。大约在1962年，我发现我们的军人在发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我立即请来了国防部长，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知道你们在发行毛泽东的著作。这简直荒谬！苏军打垮了德军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他们用了20到25年的时间只是玩弄玩弄梭标和刺刀而已。可是现在你们却在发行毛的军事著作！为了什么？学习将来怎么打法吗？你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是怎么想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军人都是聪明人，但印发毛泽东军事著作却是一桩浪费时间的蠢事。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些书怎么处理了，也许放在某个书库里，也许烧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到这里来作国事

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他们那儿去谈。这次最好是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是在1959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的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5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么做。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鼓风炉。在毛泽东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

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于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中国人真正是怎么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提出中国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我退休以后，曾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了某个美国作家，该作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的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毛泽东回答说："不，中国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进攻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迫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多次重复说中国赞成和平共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所谓的"毛泽东声明"实际上是周恩来搞的。我从来也不能确定毛泽东自己的立场。要确定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关于他，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一边喝茶一边随便聊天，所谈的内容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使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他身上的表现。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2亿人，我们有7亿人。"

然后，他又开始议论起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吹嘘："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当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时，这方面的宣传品就越过边界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告诉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

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赞成他的“平均主义”改革中的一件事。他从中国军队的军服上取消了肩章，这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好。由于同样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军服上恢复肩章和勋纹的做法是错误的。

但是，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他的党引入了歧途，他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已经发疯了。这不是事实。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加拿大前总理。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下面这段文字是特鲁多在毛泽东逝世后发表的声明。】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一书。】

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使得好几十年来和好几世纪来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国家实现了统一，在他的组织下，他确实结束了一种周期性的饥馑和水灾。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伟大的领袖。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等等。但是，他的国家是一个曾经陷于混乱的而且被进行了数十年的内战搞得四分五裂的有七亿到九亿人口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跨越太平洋的会晤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

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 10 分钟或 15 分钟，却延续了将近 1 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度，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第　二　编

外交家笔下的毛泽东

完全靠自学出来的人

〔印〕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

【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印度前驻中国大使。1950年，潘尼迦曾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他在后来所写的著作中，详细记载了这次会晤，并且把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作了对比。他认为“毛泽东是完全靠自学出来的人，他的历史和经验知识几乎全是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潘尼迦的《毛泽东会见记》一书。】

礼宾司司长到旅店来见我，告诉我毛泽东主席已安排在20日下午五时接受我呈递国书。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使我放心了，因为我听说毛主席已安排不出白天的时间，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大使都在昨天晚上十一点才呈交他们的国书。其实，后来我才发觉到中国新政权习惯在夜间接见外宾。这也许是因为白天的会议太长太多的缘故吧！至少，我有三次会见周恩来都是在夜里，两次是在十点之后，有一次很重要的会见却在半夜！

想到将与这样一位使亚洲历史起了巨大变化的人物会面使我非常激动。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像他这样一个在山沟和窑洞的恶劣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英雄，与三亿五千万

印度人的解放者甘地和尼赫鲁比较怎样呢？和他的政敌蒋介石比较又怎样呢？我看过一些记叙有关他的书，知道他的中国古文造诣很深。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充满了强有力的见解和分析。显然，他是个有独创有卓见的思想家。

呈递国书的仪式是在毛主席的官邸举行的。毛主席这个住所位于中南海湖边，是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小皇宫之一。据说是乾隆皇帝为他的爱妃香妃所建的。……毛主席并不住在这里，他和他的夫人住在西山的一所别墅。呈递国书的正式仪式时间很短但很隆重。我在讲话中强调中印两国牢固的友谊将会加强世界和平事业，而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不仅提到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而且提到了我们两国为恢复自由的共同斗争。

仪式过后，毛泽东带我到另一间较小的接待室。我们就中印两国的情况谈了半小时。在座的只有周恩来和一位翻译员。毛泽东主席首先打开话题，他说过去中国人曾经相信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行善，死之后就会在印度复活（即魂归西天）。我们谈到了亚洲的一般情况，以及欧洲人撤出亚洲大陆的问题。但他不只一次指出，只要西方的经济力量存在亚洲一天，亚洲人民就不能享有完全的自由。我说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开发自己的资源排除西方在亚洲的经济力量，而我们印度人决心遵循这样的政策。他还问到缅甸的情况，而且极表兴趣，我说缅甸政府和我们印度一样坚决保持完全独立。他还对佛教相当感兴趣，而且问我佛教对印度有怎样的影响。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印度与英国关系的状况，谈话气氛一直很友好，而且我们频频为中印友谊举杯。

毛泽东比一般人高一些，但和一般南方人比较，他算是高个子。他的体格魁梧，两肩很宽，脖子粗短，一双仁慈的眼睛，给人一种慈祥、亲切之感；他的容貌极其非凡，宽大的前额，配上那又黑又厚的头发，轮廓非常清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那威

严而又不使人生畏的风度令人觉得亲切自然。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哲学家，富于想象，但又充满信心。从他早年他父亲的农民家庭开始，经历过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才到达今天的崇高地位。在井冈山上他反抗蒋介石的屡次围剿，被迫带领他的伙伴，像新摩西奔向天国那样，爬过崇山峻岭，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艰苦，终于到达延安，住在窑洞里，继续抵抗着坚决要消灭他的国民党，同时组织游击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策划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取得了控制从满洲直到印度及印度支那的边界的辽阔土地的胜利。可以相信在毛泽东的光辉一生中，无疑受过极其艰苦的磨炼，然而，过去的那些经历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怨恨、残忍或忧伤的痕迹。

毛泽东讲话很慢，声音很低。他的讲话常常涉及许多历史问题，例如他曾问起蒙兀儿人和蒙古人的关系。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提及西方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亚洲人民的种种不平等，并指出这一代的领导人担负着扭转这种局面的任务。

毛泽东虽然已经年近六旬，又是个经历许多艰难的人，但他却仍然精神充沛，非常健康。他来自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阶层，所以，尽管他作为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重任，却完全胜任有余。

拿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恐怕有些不公平。蒋介石虽然也是个强人，有他自己的性格和意志，但是他无情、自傲、又残忍。因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过他，他便把他一家三代都杀尽，连孩子也不放过，这种做法充分说明他是记仇极深的人。此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蒋介石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拿毛泽东和尼赫鲁比较也许更恰当。毛泽东和尼赫鲁两人都善于国际行动，而且都有富于理想和幻想的特点。从广义上说，他们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但尼赫鲁的思想渊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他的社会思想；而毛泽东则是个完全靠自学出来的人，他的历史和经济知识几乎全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对西方那套个人自由主

义也许他是很讨厌的。然而他是一个受中国文化抚养长大而且早年受过佛教熏陶的人，也许可以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并不只是那些枯燥无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苏〕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前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在五十年代曾几次会见过毛泽东主席。他在《回首往事》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几次会晤的情景和对其所产生的感受。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几十年。他感觉，毛泽东是一个“大体上可亲的、甚至很和气的人。”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葛罗米柯的《回首往事》一书。】

毛泽东是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我不打算分析他的世界观和他对社会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已基本上对此观点作了评价，并将此观点同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产生强大影响的实践活动一样，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苏共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兄弟党对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观点也给予了明确的评价。

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谈到毛泽东是一位对国际形势发展也产生过影响的活动家。须知，他的思想、他的哲学观点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几十年。因此，我想，有我在场或直接同我交谈时，毛泽东说的一些话可能是相当有趣的。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49年12月他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已经取得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夺取了政权。蒋介石的军队被消灭了，举国欢腾，因为可以建设一个独立的、沿着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国家了。

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位领导人表示欢迎，从而也就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一直得到苏联人民同情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表达了崇敬之情。1917年10月，红旗在俄罗斯的上空升起，这一事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规模日益壮大。而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以后，这一运动的力量更加壮大了，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极其友好的欢迎。除了表达彼此的友好感情外，宾主双方还准备通过用政治条约把两国之间的友谊固定下来。

1950年2月14日，在“大都会”饭店为毛泽东访苏举行的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出席了宴会。宴会的气氛是隆重的。

同时，我作为这些谈话和会见的参加者，而且不仅是我，明显地看到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交谈，可以说进行得不很顺当。他们两人交谈几句（自然是通过翻译）就停一停，而且这种停顿绝不只是一分钟。在午宴上两位领导人并排坐着，也是这种情况。

我坐在桌子对面，我试图促使他们继续谈话。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这一切都要通过翻译，太麻烦了。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两人都明显缺少某种有助于他们建立必要的接触的个人素质。

看来，只有精明的心理学家，对这个场面做一番观察，才会对两位领导人的心境作出某种接近实情的判断。但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也不尽然，因为这里被观察的对象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以，任何普通的心理学模式都无助于弄清细微之处，当然也就一无所获。

这次会晤之后，我产生一种感觉，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还“没有消除隔阂”。不过，这种想法我未曾跟我们任何同志说过，因为我认为也可能是我错了。时间或许会弄清楚某些情况。

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大厅门口低声对我说：

“为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很少交谈。”

要知道她当时坐在他们的旁边，因而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回答说：

“我也有这个印象。”

次日，我听别的同志说，他们认为，午宴上“两巨头”不够亲切。过了好几天，总的看来气氛也没有变化。

尽管如此，事先拟好的条约还是在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同盟国的关系，它们的共同利益在条约中得到了反映。

毛泽东第二次来莫斯科是在1957年11月。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被告知，中国领袖想同我会晤，谈谈国际政治问题。这次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担任这次谈话译员的是精通汉语的罗满宁，他当时已经是中国问题专家和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

从今天的观点看，毛泽东对苏中关系的评价，无疑是这次谈话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谈话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代表中国人民主动地声明：

“我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对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保证说：

“中国永远不会做那种有害于同苏联的关系的事，并将同你们共同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毛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能否确定美国的政策，具体地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

“美国的经济实力真的强大到已经很难同它进行斗争的程度？”

无论是第一个问题，还是第二个问题，我们都谈得相当详细。

我在回答时谈了这样一些思想：

“北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成立，以及遍布全世界的众多军事基地，绝不表明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华盛顿政府拒绝苏联关于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一切建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接着说，谈到美国的经济条件和它的经济潜力，应当考虑到，在战争年代，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从西德运走了“第三帝国”时代在康采恩和工业企业中建立的许多试验室。当然，这就更加增强了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但是，这种情况绝不说明美国是不可超越的，同它竞赛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恰恰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这些潜力是会被发掘出来的，这一天必将到来。

毛泽东总的来说也谈了类似想法。不过，他是按自己的方式讲的。他很喜欢“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句名言，他津津乐道地重复这句话。我根据交谈的情况说：

“美国人在谈论自己的经济潜力时总不免吹吹牛皮，但是，当经济危机这类严酷而又常来的宾客光顾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吹牛就要收敛了。”

毛兴致勃勃地接过这个话题，讲起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总之，从各方面给人的感觉是，他读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章节，而且想让我知道，他读过这一部分。

在具体谈到中国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冶金工业的可能性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就能每年炼出 3000 至 5000 万吨钢。"

谈话结束后，我像平常那样自问：

"毛谈话的重点是什么？他想借此向我们表明什么？"

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主要是想让人听听他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实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实力的估量。他还想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使美帝国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首先是不强加于中国。

由此可见，他同我谈话的目的，是想使我们苏联人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1958 年 8 月，我在北京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使我个人对评价他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局势、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等问题上的观点有了最可靠的材料。苏联领导作出决定，要我作为部长前往中国首都，并同毛泽东就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中关系中因中国沿海诸岛引起的紧张局势进行会谈。中国领导欣然同意了这次访问。我当时是秘密去北京的，也就是说没有通过舆论工具宣布这件事。

1958 年 8 至 9 月，远东政治局势严重尖锐化。美国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杜勒斯在 9 月 4 日的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远东局势有了变化，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决心"采取"及时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蒋介石以至美国在台湾和沿海诸岛的地位。

美国大肆鼓吹黩武主义情绪。在各种声明中强调美国军人不惜使用原子武器进行讹诈，直到用原子弹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上的目标，并决心一如既往地在中国领水内为船只护航。

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进行军事讹诈，吓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使美国居民对美国采取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准备。

在苏联政府首脑 9 月 7 日致美国总统的信中曾明确警告说，华盛顿的举动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认为这些举动是干涉中国

内政，从国际法的观点看是不正当的。同时苏联还表示愿意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我在北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重点是讨论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同围绕沿海诸岛形成的局势，以及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苏中两国在政治方面协调行动等有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谈话的基调是，不应向美国人让步，要按“针锋相对”的原则行动。

他说，“不错，美国可能冒险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应当考虑到，并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打算投降！”

毛泽东在发挥这个思想时，强调了苏联和中国作为盟国必须协调行动，他接着这样说：

“假如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应当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中国军队应诱敌深入，以便使美国军队在中国受到夹攻。”

接着毛泽东好象是建议苏联领导人应当怎样做似地说：

“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在战争开始阶段不必用自己的主要手段给美国人以军事反击，以便不去阻挠美国军队深入到辽阔的中国内地。只有等到美国军队深入到中国的中部地区之后，苏联才应当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打击美国军队。”

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就知道毛泽东的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关于美帝国主义的论述。但是，当我第一次直接听到这些言论时我感到极其惊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言论“别出心裁”，而且还由于他在描述俨然一幅美国使用核武器侵略中国的图景，以及如何同这场侵略作斗争时，他的言论是那么“轻松”。

我以适当的方式向他表示：

“所描述的战争图景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赞同。我可以肯定地这样说。”

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到此结束了。

1957年在兄弟党莫斯科国际会议上，毛泽东也讲过类似的话，使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总之，在那里他也是坚持己见。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同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缔约国以及绝大多数兄弟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距离有多么大。

1959年10月，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尼古拉耶娃、作为外交部长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同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一事实。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还要补充几句。假如撇开他的理论观点，撇开他的世界观和特殊的政治观点，那么，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大体上可亲的、甚至很和气的人。毛懂得笑话，自己也爱说笑话。他把中国古代哲学看作是自己的财富，系统地研究它，也经常谈到这一点。他很善于引经据典。

毛泽东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到，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

〔日〕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他为建立日中外交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曾于1972年9月为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和1974年1月为签订日中航空协定而访华时，先后两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可能是日本的政治家中见到毛主席的最后一个人"。在他的眼里，毛泽东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毛泽东的言语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大平正芳的《真诚坦率，和蔼可亲》一文，原文载自日本1976年《读卖新闻》。】

我作为外务大臣于1972年9月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1974年1月为签订日中航空协定而访华时，先后两次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想，我可能是日本的政治家中见到毛主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两次会见时，周恩来总理都在座。

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

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我是在北京市内中南海旁的住宅里见到毛主席的。那间接待室兼书斋里摆满了线装书，书中夹着许多白色的书笺。毛主席似乎就在那里度着专心读书的生活。

我没有看到那里有外国书。我感到，他对日本问题很感兴趣，并且有很丰富的知识。我听说他没有来过日本，但是，他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了解。

譬如，毛主席举出“I、RO、HA”及“A、I、U、E、O”（都是日文字母的读音——编者注）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他还说他在学日文。可能是半开玩笑，他还说想到日本留学。

当我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主席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如今，这已成为值得怀念的回忆了。

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事也毫不掩饰，调皮就是调皮，不遮不掩，发出朗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感到他象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在第二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时，他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紧张心情。

毛主席谈话时，总是慢慢地选择着词汇。

毛主席尽量地特意抽出相当长的时间会见我和别的人。我想他是尽量地会见各国的应该见的人的。

在国务方面，他作为最高的负责人，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先生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自始至终保持了非常恭敬的态度。似乎可以肯定，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周恩来先生作为卓越的组织者的能力，是缔造了今日中国的巨大动力。

中国共产主义之父

〔美〕亨利·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前任美国国务卿。他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突破。4月2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给白宫送去了一份照会，照会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或者国务卿，或者总统本人。7月9日，基辛格飞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来到北京。从而揭开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帷幕。从此以后，基辛格博士几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下面这段话就是摘自《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生前被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备受人民崇拜，就像他所取而代之的皇帝那样。他住在昔日的皇宫"紫禁城"宫墙里一处简朴的房子里。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的每句话奉若神明。他们对他的一些极平常的话似乎都能领悟出一定的道理来，连周恩来总理也总是说，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由毛拍板。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到处挂着毛的画像；他的题字充斥于告示牌和公共建筑物的墙上；在他所创建的这个国度里，他的个人权威无所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称，物质因素和

历史力量起决定性作用，可是在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竟然如此突出个人，岂非咄咄怪事。这位出身清寒、后来擢升为世界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伟大人物好象不相信那个他借助其名义而取得胜利的意识形态能维持久远似的。他敢于向鬼神挑战，却企求在亿万黎民百姓的顶礼膜拜中获得永生。那些亿万黎民百姓熬过多少征服者的蹂躏，经受数不清的强迫改造，毕竟能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讲求实际的精神和处处皆有的人性克服这一切。

毛意识到对他的颂扬不会长久；阿谀奉承之辈最不可靠。秦始皇曾在中国进行革命改革20年，死后渐为人所遗忘，这就是妄想更改中国自然节奏的人们的命运。毛泽东大概是担心自己也落得个秦始皇的下场，结果他把本来竭力想避免的事情反而加快实现了。他本来企图让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永久的革命，结果却唤醒了中国人历来对连续性的向往。

然而在1973年2月的时候，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存在任何疑问。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地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性，令人可望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其实毛根本不需要这一套来加深人们心目中对他的印象。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慑。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2月17日这次召见我时，我正在国宾馆同周恩来会谈，已经是晚上11时，周宣布："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我们坐上周那辆1939年型式的十分陈旧的座车，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往市中

心。这时是深夜，街道上已经行人绝迹。车子快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向左一拐，穿过与宽广的马路平行的长长的红色宫墙，进入一座由红漆圆柱支撑的传统中国式的大门。车行约一英里，两旁高墙后面有一些朴实的宅院；接着沿湖岸走，湖对面有几处苏联官府式的建筑。毛的住处很简朴，象一个中层官员的住宅似的。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门廊下面，那里看不到有何特别的警卫措施。进去后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便看到毛在摆成半圆形、蒙着褐色罩布的沙发前面伫立。屋里放满了书：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

毛说了几句风趣话，中国摄影师大照其相。我们后来才得知，次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往往是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的可靠晴雨计。1973年2月这一回，《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报道了我们的会见，还在头版刊登了两张照片；这是友好的绿灯。

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美中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我们朝着沙发走去，摄影师还在屋里照相时，他说道："我看来还不错吧，"（他猜透了我的心思，我当时的确觉得他的气色比一年前会见尼克松时好一些。）"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罗。"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但不知怎么倒不使人觉得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他的言论看起来很随便，可是他的下属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指示。毛拐弯抹角地用一句话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开玩笑地向我挑战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

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他笑起来了。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我回答道。

毛对此犹不满足：“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他坚持说。

毛紧接着赋予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以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坚持说。“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他开玩笑说。但他却没有说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验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何从知道中国人不会趁机占便宜。毛的意思是说，冒小风小险没有什么意思。他谈得来劲儿，索兴对大规模情报活动有没有用也表示怀疑起来。他确实认为情报部门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它们知道政治领导人需要的是什么时，报告就“如同雪片似的”飞来了。但在真正关键的问题上，它们就不灵了。他说，中国的情报部门事先不知道林彪搞阴谋，也不知道我想访华。他猜想我们的情报机关也给我们带来类似的问题吧。

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 1972 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毛把这层意思发挥了一下，达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强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只要双方不要假戏真演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

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

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预料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古典定义。"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原则，"我回答说，谈得投机起来了。"而且如果我们双方用同样语言说话，反而会造成混乱。"

我们就是用这种近乎诙谐的话语来谈论世界形势的，一直谈到清晨一点半钟。

尽管这位主席主要谈的是外交政策，然而他却摆脱不了在他晚年时北京内部问题对他的缠扰。在中国历史上，这类问题往往好象随着自己的势头发展。毛一再向我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他说得很隐晦，我这个不机灵的西方脑袋瓜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毛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不放心我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有所指的，但还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后来，温斯顿·洛德的妻子贝特给我作了注释：当时中国的局势远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稳定；女人——指毛的妻子、激进派的头子江青——在中国兴风作浪，对现行政策发出挑战。

然而，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在历史上，中国更多地是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和优越的文化来确立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不象欧洲政治史的特有现象那样靠显示赤裸裸的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毛的革命既革中国旧价值标准的命，又对它们加以肯定。毛

主义力图克服中国的旧事物，但它又象传统的儒家一样把社会看作是一种伦理的和教育的工具，只是注入了这位湖南乡下农民的儿子所规定的、与儒家截然对立的学说。毛在 1966 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中国以外哪个国家能把一个流血的政治大动乱冠以“文化”二字呢？——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铲除现代社会中不符合中国特性的东西，为了打击西方的影响和官僚主义化，以免中国堕落和被纳入世界普遍的文化之中。

到了 1973 年 2 月我们会晤时，这位年迈的主席已经意识到，他最近那次宏伟的设想虽然戏剧性地表示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却注定它从此陷于衰弱。他如今已懂得——那怕只是暂时地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与外部世界隔绝，就必然丧失影响，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无感伤地表示，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他把“文化大革命”停了下来，悲哀地说，中国人民“非常顽固和保守。”他说，他们应该学学外语。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意义所在。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但是这位年迈的主席太老了，已经无法把另一场革命进行到底，而这场革命所要反对的是共产党本能的东西，是他的人民的传统，是他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在与我进行谈话后不到一年，他推翻了自己那天深夜在书房里所谈的见解，或者至少是让别人这样干。周恩来下台了。过了不到一年，周的继任者邓小平被推翻了，而推翻邓的那股势力正是毛在 1973 年时似乎在抗拒的。这么一来，现代化又一次被推迟了，而毛曾经承认现代化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方面。究竟是毛鼓励了那些日后被叫做“四人帮”的人呢，还是那帮人钻了毛日益老朽的空子？大概两种情况都有一点。可见毛临死的时候还被他自己那个革命以至于中国历史的难题和矛盾所缠绕。

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1975年除夕之夜朱莉和丈夫会见了毛泽东主席。用朱莉的话来说，“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标志着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新年，也标志着前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时刻之一。”毛泽东主席当时虽然有病在身，但却给会见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下面这段话摘自朱莉的《毛主席说再见》一文，此文原载于《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1975年12月31日，即除夕的那个夜晚，在中国9亿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跟前，我和我的丈夫看着时钟走过12点，迎来了1976年。我们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标志着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一个新年，也标志着我们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时刻之一。在紫禁城的深处，在他的书房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态度安详而健谈的老人。

当我们跨过门槛时，我们看到主席在屋子的那一头。他坐在一把大安乐椅上，其他六把同样的椅子以这把安乐椅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圆形。在两位穿着同样灰色毛式服装的年轻女服务员的搀扶下，他费力地站了起来。他身子摇晃了一

下，然后那两位女服务员便退到后边去了，他独自站着。

礼宾司官员向我示意，让我坐在主席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在这次会见之前，两天来，接连听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以及党的干部和外交部人员长篇大论的讲话之后，我预料毛主席也会向我说教，当然不会进行一次交谈。因此，我思想上是轻松的，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看那间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一切摆设——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和卷轴；奇特的6英尺高的落地灯，灯光强烈到足以拍电视；装在听头里的熊猫牌香烟；盛着绿茶的精致的茶杯；摆在大安乐椅之间的桌子上的热毛巾。我对每张桌子底下放的白痰盂最感兴趣。我聚精会神地看这些摆设，并等着听他讲话，因为尽管我渴望会见他，可又不好意思仔细去端详他。一来到他的面前，我就感到去凝视这位82岁有着那样一番经历的老人，是对他的不恭。

直到我父亲的信译出后，我才认识到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局势，尽管看来患过的中风已使他的嘴有一部分麻痹了。看来他对我父亲以个人名义写给他的信感到很高兴。他对我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然后，他从唐闻生的手中把信拿过去。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在信译出之后，毛对我说，当时我坐着的椅子正是大约4年前我父亲访问中国时所坐的那把。于是，我从扶手椅站起来并对主席说，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他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当我们迅速掉换座位的时候，主席爽朗地大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于是戴维大谈起静脉炎造成的影响。当我看到毛凝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局促不定，以为戴维可能讲的太冗长烦琐了。但是随着会见继续进行下去，我发现毛很少朝我们这边看，他总

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他翻译的人身上。

房间里的气氛是热烈、友好的。我把黄大使的夫人当天晚上赠给我的一枚上面有主席侧面像的小圆像章拿给主席看。虽然毛见过千百万男男女女佩戴类似的像章，但是他的反应却是象孩子般地高兴，并且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也许是由于年迈，并且身体有病，起居上大多需要依靠旁人照顾，所以毛的举止出人意料的温和。他不装腔作势。他在谈到将于新年发表的一首讲斗争的诗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 1965 年写的。"

到了将近凌晨 1 点钟的时候，我两次起身准备告辞，因为我不能不理会坐在房间另一边的外交部长作出的表示。他轻轻地叩叩他的手表，提醒我时间很不早了。但是主席两次提出异议，他向我们摆摆双手，要我们再坐一阵。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实际上，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听出，他对他本国人民、尤其是没有受过考验的青年一代，抱着怀疑态度，并感到失望。"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

这位主席对我们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自从我们进入他的房间以来，他第一次变得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然后他突然问道："你们怎么看？"

这番交谈是这样出人预料地开始的，以致我和戴维都沉吟了一晌，然后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的……"我们俩的声音深沉地此应彼合。接着是一片沉寂，毛等着我们再说下去。最后主席又说话了。"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 82 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

活力，更渴望斗争。毛仿佛是在回答他经常在自己心里提出的一个问题似地，讲了他是如何处理过去反对过他的革命斗争的人的。“我们并不可怕。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如果他们认识了错误，就可以官复原职。”接着，仿佛是要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的两位美国人同意他的话似的，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杀人。”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说：“前几天我们刚赦免了一些国民党人员。”他指的是释放了几名在内战期间同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人。我们认识到，毛热切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当我们打算向毛告辞的时候，他把双臂用力地放在座椅的扶手上，强调地对我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口气坚定而有决心。

毛在晚年也许开始意识到历史以及他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觉得他是这样的。在深夜同他会见，不可避免地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安静不下来的人。他并没有向我们说出他在生命的尽头所感到的种种憾事和视为满意的事情。尽管如此，他那羸弱的体质的痛苦表现使我们沉痛地回想起我们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临终之前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们在毛的面前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精疲力尽了。然而，每当我们作出要告辞的表示，他都要我们留下来，对于拥有他可能希望他还可以拥有的机会的来宾感到依依不舍。最后，在外交部长领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毛同我们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在两年多来没有对任何来宾作出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行人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姿态。

我在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感到悲伤。他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他不再对我们微笑了。两个护士站在他的两旁搀扶着他。当我们消逝在另一个房间的黑影之中的时候，他两次向我们挥手。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

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变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一个非凡的人物

〔德〕王安娜

【王安娜，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1935年与王炳南结婚，后来定居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之久。她曾多次会见过毛泽东主席。毛的生活、工作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

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其实，那不能算是正式的剧场，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在大厅的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作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即延安的普通市民和从近郊来的农民）。

我时而看看舞台，时而望望观众席。这时候，艾格妮丝问我：

“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

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经盛上咖啡的杯子。

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慑服。这个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党和红军都确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我知道这一点时，能不为之惊叹吗？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机，毛泽东现在正以中国这一边远荒僻的地区作为根据地，全力以赴地为革命进入新阶段而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

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还未越出1900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毛是夜里工作的人。他很晚才起来，用两三小时在延安的小街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形怪状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

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

毛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美〕亨利·基辛格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白宫岁月》。】

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象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

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

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1975年10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容和其他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象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

象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见有生动而准确的记述。毛泽东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

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毛泽东利用大家在取笑着谈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象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用的就是省略语。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

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致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毛泽东跟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在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纵谈国际形势

〔美〕亨利·基辛格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80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

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象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象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制度，甚至最高

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

关于我们长远的对苏政策，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事实上，苏联的整个兵力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布置来反对中国的——这多少有些估计过低。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反过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全球安全的关键。真正的危险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保持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苏联侵略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苏联人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它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危险境地。换句话说，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然后，毛泽东按照这种观点评价了欧洲各国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对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了如指掌，不用任何提纲就能够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推演出结论。毛泽东的信念的核心是，虽然我们的欧洲盟邦由于各种原因而犹豫不决，它们最终绝不会受苏联人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从而抛弃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重要的是不能把暂时令人恼火的策略同长远趋势混为一谈。即使我们有些朋友似乎犹疑不决，我们必须保持坚定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从我们的领导中得到勇气。

毛泽东并不是一口气说出这些意见的。相反地，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

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来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一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而且使你无法得出其他结论——同时又使我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

毛泽东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国际形势进行基本分析，然后突然转到台湾问题；他并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间接暗示出一种解决办法。他说，他听说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在美国还有大使馆。我肯定了这一点。"但是苏联并没有要求你们首先取消这些大使馆才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吧！"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立关系时苏联还承认这几个国家。但是，如果毛泽东是在暗示同台湾的关系不一定会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我没有理由要来指出这种微妙的历史区别；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见解。周恩来也帮忙插话说，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但进不了联合国。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默许台湾保持单独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就行了。

毛泽东的谈话又转到另一个方向，用更为绕弯的方式做了同样暗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信徒，他一开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我们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他也不相信和平过渡；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并不急于实行他那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也无需按照中国国内争吵的锣鼓点慢条斯理地进行；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还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台湾问题分开对待？暗示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将取决于我们？它至少是暗示：中国并不企图在以后很快就吞并台湾；台湾问题肯定不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障碍；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

有受到压力。我倾向于相信，同周恩来前一天的做法一样，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些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我们无法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为中国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不容许我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意进行探索。这件事对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一百年”也不会从他谈的一般原则中做出政治结论。为了避免我们不能领会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锐性从来都是很难说的——他把台湾的情况同香港和澳门进行了比较。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并不着急（事实上还同“占领”这两个地方的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台湾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仅没有施加压力的迹象，而且明确地把它抛到一边去了。接着，毛泽东就转到中东问题上来，似乎是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讨论如何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的过程中来谈的。他回顾了他对我在宣布警戒状态那天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一次谈话的反应，借以表明他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对不幸的黄镇来说，我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他还是按照老一套办法重申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支持。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把这次谈话放在正确的背景上来看。

然后，毛泽东几乎逐一分析了这个地区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强调指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对阻碍苏联扩张的重要性。他对伊拉克和南也门感到不安。他敦促我们加强在印度洋的力量。毛泽东的谈话都没有提纲；他的同事也没有给他任何提示，只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

毛泽东在环顾世界形势的最后转到日本问题上来。他赞成我决定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几天。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

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毛泽东以赞同的口吻说。“其次才是我们。”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将尽力使日本继续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办事；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我们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指我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的设计师之一，我个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恐惧。”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显然是不协调的，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热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访华时他们表现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联系不过两年，这位两鬓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导美国的国务卿如何保持盟国团结了。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却成了具有默契的伙伴。

谈了两个半小时以后，周恩来表示该到告别的时间了。但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局势还放心不下，要谈下去。他的政治理论曾经预言美国国内会出现动乱，而且鼓吹这种动乱。但是现在他最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象一位交响乐的作曲家一样，最后又回到他开始的主题：他多少比较同意现在的总统的看法，但是水门事件会不会削弱这位总统的权威呢？这场混乱可能产生一位什么样的新总统？他“怀疑”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燃；我怎么想呢？我深信：如果伪称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任期最多也不会超过 1976 年，而且可能提前结束——能够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但是，在得到这个教训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空隙是可能的。毛泽东抓住了这句话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击说：“那么你似乎同我一样。我们双方多少都有点怀疑。”

他对美国军队可能象民主党参议员不断建议的那样撤出欧洲特别感到不安。我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存在差别。毛若有所思地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

词令；我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大笑着说，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我想制止这种猜测："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他听到这种保证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在分手时他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

当我们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时，毛泽东突然重新提到我们2月间谈话的主题：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将近3小时的会晤就此结束。主席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外间接待室——这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当他同我们告别时，又照了一些相。他对我说："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第　三　编

记者笔下的毛泽东

21年后重见毛泽东

〔美〕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1936年他不畏艰险，冲破种种阻挠，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实地采访。据此而写成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该书向全世界作出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此后，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后几年中，斯诺还写了十几种专门介绍毛泽东的书籍和报道及中译本。在斯诺的影响和介绍下，一些外国友人，象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特朗、斯坦因、爱泼斯坦、贝尔登等前往中国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这些人离开后，都写了许多报道和著作。向世界和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1960年在中国国庆节之日，斯诺再次来到了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与毛泽东主席见了面，并开始了以后几次与毛泽东的会见。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斯诺记下的1960年，1965年见面的情景。】

一

24年以前，我在中国人民古老历史的发源地黄河河套里面陕西省黄土山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大本营是在一个名叫保安的残破小镇上，在长城之南不远处。他当时是一批不到4万人的“赤匪残部”的领导人，蒋介石已迫赶他们走过中国几千英里的路程。

当我同其他客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革命胜利11周年时，我又与毛泽东重逢，这是我从1939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观看着百万群众列队游行过去，毛泽东是这次游行中的第一号英雄人物。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两天的庆祝和感恩活动。

毛泽东同我握手时说：“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21年了。”我环顾城楼上宫殿式的大厅，回想起了上次见面时的环境。“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为扩大了一些！”

他微笑了。“情况好了一些。”他邀请我去看他，在后来的几次见面时，我们共度了大约9个小时，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

……

我第一次在中南海访问毛的那天，走进新华门时，我看见只有两个警卫站岗。就在新华门的东边，在叫做长安街的那条宽阔繁忙的大街上，耸立着雄伟的天安门。天安门对面是大理石柱子的人民大会堂。毛经常徒步从家里走到大会堂去，后面只跟着几个便衣人员。在院子里面，柳树夹道的汽车道两旁看不到有警卫。这条汽车道绕过宫内的湖泊，穿过菖兰和菊花花圃，通到他那所优雅古老、黄顶平房的住宅。这所住宅属于原来是清宫贵族、后来又是国民党官僚居住的一个宫殿建筑群，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住在类似的住宅里，彼此离得很近。皇宫主要部分的一些大殿现在已成了博物馆或游览场所，北海的一角还有个模范幼儿园。

毛家中的宽大舒适的起居室，中式布置，颇为风雅；与此相连的有个小餐室和他的书房及卧室。他自奉和待客的几碟菜肴是湖南风味的家常便饭。他和我一起喝了点茅台，祝贺这次见面。他又拿中国红葡萄酒款待我，这种酒在华北的酒店卖（不限量），人民币1元钱1瓶。

毛比从前胖多了；他的饭量不大，香烟吸得比以前少了。作为一个年近7旬、经常有流言说是已经“死了”的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依然故我”，多年来没有得过什么严重的疾病。他身穿一件领子扣紧的素色深灰呢料上衣，相同质料的裤子；自从孙逸仙提倡以来，这种服装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制服。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我认为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是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时所用的“铺张浪费”一词的。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毛有一班秘书，不过他住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时候也是如此。花园那边就是清朝皇室的宫殿，他如果搬到那里去的话，是满可以使白宫黯然失色的，但是这些宫殿都作为“人民的宫殿”而保留下来。政治局委员没有兴趣搞个人的东西。不过，他们有小汽车和飞机供自己支配，可以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国宾——那里开宴会时可以坐得下5000名客人——常常用最上等的筵席招待获得荣誉的工人和农民。

这些政治局委员曾经过集体生活、在食堂里吃饭达20多年之久；他们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仍有很多时间在一起，每天仍然工作12到15个小时，过着相对来说简朴的生活。他们的妻子衣着朴素，并没有像旧中国的统治家族那样私设银行，大做买卖。他们恶毒的敌人也并未指责他们接受贿赂或在国外银行有户头。他们没有拿公款作私人投机交易或操纵黑市。如果说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个人丑事的话，那是一点痕迹也不露的。但是他们都拥有权力，而且都喜欢权力——以毛为首。

毛不再能够骑马或作长途的徒步旅行了。他以游泳来锻炼身体。南海和其他宫内湖泊现在引进了清净的自来水，西山的昆明湖变成了人们所喜爱的游泳场，这可以说是一部分原因。这也可以说是全国普遍对游泳发生兴趣，城市、学校和公社修建了许多优良的游泳池的原因。1957年，毛宣布他打算在汉口附近游渡长江，这使政治局大吃一惊。国务院甚至请总理出面要想劝阻他。江中有危险的暗流，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点缀江景的毛的标语中有一个口号是："敢想敢干。"一个年轻的游泳选手首先自告奋勇，泅渡成功；然后一名姑娘也渡过江去。毛在他们之后下水，用"打游击的办法"轻松地游过去了；他随波飘浮，迂回前进。江中很快布满了游泳的人。上海附近渡江者之多竟使国外出现谣传，说中国准备进攻台湾。毛的一位外国来宾说，这条消息是夸大了，中国不会用一支游泳队去占领台湾。

我想，毛为了权力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是失掉了周游世界的个人自由。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时，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

蒋介石始终是个神经过敏，动作拘谨的小个子。毛则仍然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别人话中的细微含意，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他的性格也很热情。

要做一个不仅献身于解释历史、而且献身于改造历史——这关涉到1/4人类的生命——这一重任的领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尼赫鲁有一次告诉我，说他只有在"山顶"上的时候，才感到"真正的自由"。毛在64岁时首次游渡长江之后，写了一首诗，

乍看之下，这首诗也许会使人想到他同样是个渴望恬静的遁世者：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子”是指孔子，他在河岸上沉思一番后，在《论语》中写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细读之后不难发现，在这里，就像在毛的所有诗词中一样，有一种政治上的含义，远远不是把退隐作为理想。在风吹浪打之下，毛发现他处于一种根本变革之中，因为他处于这一斗争的中心，所以他感到蓬勃的活力和完全的自由。

…… ……

毛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有许多情况是因为他在长时间地闭门读书。他有时用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看书，这是他在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一度脱离他念书的一所中学，因为“它的校规令人讨厌”，结果花了半年时间“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

他告诉我：“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中断一会儿，买两个糯米团吃……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看的书无所不包，诗歌、传奇、古希腊神话和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等严肃的著作都有。”在这以前，他早就为尧、舜、秦始皇和汉武帝等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的事迹所吸引。

毛通过译本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知识，也许比任何西方统治者对中国文学的知识要广得多。他阅读的书籍也不限于政治文章。最

近，他对一位法国客人很贴切地提到了茶花女玛格丽特·高蒂埃这一角色，使这位客人感到意外。

毛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访问俄国和东欧以前，从来没有出过中国。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非共产党国家，甚至连印度或日本也没有看到过，也不会讲任何一国外语。直到1962年，政治局里只有两个人——洛甫和董必武，到过新大陆。比政治局低一级的任何人，是否能听到与毛自己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概念相矛盾的理论，是令人怀疑的，这些概念比他在大多数问题上的概念都要僵硬，都要过于简单化。

……

二

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就认识的朋友……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作记录。我事先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主席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

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我相信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还是一个受通缉的“赤匪”住在陕西窑洞里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1936年，我还是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想看一看蒋介石费了10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而进入了中国西北地区。我是第一个进入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人。毛当时43岁，很瘦，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经过康藏高原的东部）进行以“长征”闻名的6000英里英勇撤退的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好多个夜晚，听他讲自己的生平，介绍到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

从那以后，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了，今天72岁的毛泽东在紫禁城的天安门隔着广场的对面，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接见我。

上一次我同毛谈话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中国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到1965年1月，情况已大有改善。连续3年的丰收使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处商店都摆着便宜的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中国正在偿还欠苏联的最后一笔外债。1964年10月核装置的爆炸提供了新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信心和自尊。

毛主席本来可以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但是他没有夸口。我发现他处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绪之

中，谈到他同死亡的约会，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一两度精力的高潮，还有时间去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这是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他在同我谈话以前，连续几个星期曾同到首都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的许多省级领导人日夜紧张开会。如果他有病，他同我的谈话会较快地就结束了。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看去十分轻松。交谈从下午6点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后来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方面的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毫无病痛。他吃带辣的湖南菜，饭量不大，并且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喝一两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开始交谈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我曾要求他准许把采访过程全部拍成电视纪录片，当时本不抱多少成功的希望。这时我说：“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传记发表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说到你的健康，我们过去没有谈过，从今天晚上来判断，你看来身体很好。”

毛泽东苦笑着回答说，这点也许还有些疑问。他又说，他准备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相信吗？

“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去弄清楚上帝是不是存在。你相信上帝吗？”

不，他不相信……

在晚餐时，毛提起他的两个弟弟都已被杀害。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时期（1930年）被害，他们的儿子是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他说，奇怪的是，至今死亡总是放过了他。他好几次准备了要死，但死亡看来就是不要他。他有什么办法呢？有几次看来他要死了。他的一个警卫员紧挨他站着时被打死了，有一次他全身溅满了另一个士兵的鲜血，可是炸弹没有碰到他。

"那是在延安吗？"

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一个警卫员在长征途中被打死。另外还有过几次死里逃生。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切斗争最后都必须得到解决，地球上人的生存斗争也是这样。

"放过你的性命的这些意外命运，成全了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事业。在中国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人曾像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但领导一场社会革命获得成功，而且写下了这个革命的历史，制定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在一种新的文化中实践了自己的哲学，这种新文化对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毛想了一下然后说，他的生涯是从做小学教员开始的。当时他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我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感到奇怪，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的结果——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事实就是这样……

"在1937年听过你演讲的青年，后来在实践中懂得了革命，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能有什么代替物呢？"

当然，现在中国20岁以下的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见到过帝国主义者，也从来不知道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讲给他们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书，跟亲身经历过是不同的。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自己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他说，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到他的意见。当然，他不希望发生反革命，但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期的人比封建时期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在我站起来告别之前，主席要我转达他向美国人民的致意，并且只简单地说他祝他们进步。如果他祝他们得到解放，有些人一定会不同意吧？他们岂不会说他们已经有了选举权吗？但是对其中那些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和要求解放的人，对这些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送我到门口，尽管我一再辞谢，还是看我上了车，他在零度以下的北京的冬夜，没穿大衣，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以文化古都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大门口周围我没有看到警卫人员，现在我也想不起，整个晚上在我们近旁看到过一个武装的警卫员。只有两三个服装简朴的年轻妇女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有时站在后面，像是服务员。她们会是毛的女儿吗？当他站起来时，

有一位过来搀扶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了手，嘱咐我要谨慎小心，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开动后，我回过头，望见毛挺直了身体，徐步转身，走进人民大会堂去。

三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10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1/4（或1/5?）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

在下面能容纳50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微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节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77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新来的人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〇"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

〔美〕海伦·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第一夫人。1937年5月，海伦·斯诺访问了延安。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她。在延安期间，她收集了斯诺1936年未及采访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她在延安（1937年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等地呆了四个月，会见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问题，写成了34个人物小传。后来，她根据这次采访的材料，写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三本书。后来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时，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就是由她提供的。该书中几十幅珍贵照片，其中十多幅为她所拍摄的。

下面这段文字摘编自海伦·斯诺的《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

1937年5月，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警卫员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而东倒西歪。我不能决定是重新涂上口红——我的西方文化生命线之一——还是完全擦掉，结果两者都没有做。

我们握了手。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对等的部分，以致在中国有些人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毛是头脑，理论家，“主席”。朱德是心脏，军队，完全出于本能成为人们的领袖，是人类材料做成的。两个人都是由优等材料做成的，这使他们在80岁和90岁时仍然居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位置。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秘密的统治权。

朱德谦虚地坐在歪斜的方桌后面，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剃光的头上戴着帽子。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们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没有什么可损害毛泽东的。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是坚韧的材料制成的——这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的子弹的那种材料。

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对毛泽东很少了解是有些原因的。埃文斯把他写成“谦卑的，和善的，孤独的天才，在这里长夜的黑暗中奋斗着，……为人民寻求一个和平的生活之路。”

毛泽东除了是个天才以外，埃文斯在上面所提到的其它方面都不是。这每个人都清楚，或许毛和他的朋友们从他孩提时代就看清了。埃文斯用基督徒的标尺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的洞察力。在他看，谦逊是美德，特别是一位总司令。

很可能除了我丈夫以外，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我已经比旁人知道得多——因为毛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

我告诉毛："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他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决定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和蔼地点点头。

由于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对我也就完全敞开了所有的门。朱德在5月党代会的几天里领着他的将军们来看望我。（只有一个重要的领袖没有来过——林彪，他明显地比其余的人更排外。）为了我的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我收集了34个简短的自传，进行了多次访问——这都是因为毛已经做出了榜样。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泽东是每件事的主宰。

那个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虽然还不像一年前埃德加所建立的那样亲近。我给他送了一个提问的长单子，进行几次访问。他对我提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许多是请求解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这使我不安。后来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这个夏天，毛泽东形成了并修改了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中试讲。他知道我曾经学过黑格尔，但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他是愿意为我澄清事情的——他欣赏智力的挑战——并且同意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他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让我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第一次采访，以表示好感。但是，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就把我转给他的得力的助手吴亮平和官方历史学家洛甫，去完成其余部分。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公开讲了他的"矛盾论"；这是他看了我的长问题单子，并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而作的。他给我的主要答案是：通过形式逻辑你不能懂得中国

的革命，只能用矛盾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术语，但我准备接受这个观点。它要把古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贴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内容上。我肯定那个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也不理解它的逻辑。虽然那时李德和毛是对立的，我却不曾料想1937年使我困惑的矛盾，实际上导致了1970年中国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的武装对抗。

智慧的开始是承认存在矛盾，这是真理的本质，永远是两面性的。问题是要能在矛盾的转变点上看得清——并按正确的方向去行动。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天才。直到他至少是42岁时（长征中1935年在遵义，由于需要他取得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他一直试图理解并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论点。1937年他仍热衷于支持苏联的地位，甚至达到释放他的宿敌蒋介石的地步，作为取得外国支持以抵抗日本和轴心国家的振作点。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曾经是，那么中国很多事就会不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共产党代表会从1937年5月1日开到5月15日，当中央委员会在8月集会时，毛泽东的终生统治权就永久地确立了，除了1966年以前一度中断。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软弱的和吓坏了的国民党抵制，十点要求中没有包括经济纲领；联合阵线是这样脆弱，不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东西，连简单的全民经济总动员也没有。

在访问的结尾，毛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

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我站起来点点头，“我也这样看”，“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

这就是我的延安之夏期间的主要结论：群众必须动员起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行动——这就是讲“民主”的一种方式。（毛后来用了个关键的短语“新民主主义”，而埃德加和我希望我们曾经把这个小而重要的词加在我们杂志的名称上）我了解共产党人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不必在物质上给他们什么，仅仅一个精神上的友爱，或者象他们所说的“生死与共”。十几岁的青少年的队伍是自发的——所有红色士兵都是无偿的志愿军。他们会被摧毁，但是新的军队又会起来。在延安的黄土上，虽然蔬菜和动物的生命只能勉强生存，但人类的生命却活下来了，因为出现了由饥寒和危险哺育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觉醒。中国的青年在反抗着所有可怕的疾病和往昔的绝望。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青年运动，它的生命冲动总是包括妇女的。

毛泽东年老时被神化是有各种原因的。他把“新中国”人格化了，既有他的灵机，又有它的限制。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一个辩证的头脑。西方除了冒险去蒙蔽多于澄清以外，并不描写他和他的事业。在他的整个时代，他是最乐观的人，可他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愚人，即使他相信，也不是愉快的。他比中国任何一个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对外来的影响都更为开放——可是他又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他提高了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地位。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惧怕他，但在最后承认了他的权威，也或多或少地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神化。同外国人相比，毛更象林肯，连他那高大的魁梧的身材，天然单纯性的伟大，也都相似。他有同样的填不满的求知欲望；七十年

代他还在学习英语给人们作榜样。

对毛泽东用的词是大——各个方面都大。他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的大纲，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琐细的，不是平庸的，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欣赏取得胜利的过程，他的成功大多由于赢得了别人的心。据迄今所知，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仇人，这是高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向着文明行为前进了一大步。在1937年，当老布尔什维克们互相杀戮的时候，他允许给他的两个死敌以自由——他们继续破坏他，直到最终。一个是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时，张在抗大教书，他被允许离开延安，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去欢呼蒋是唯一的“真正领袖”。

毛主义是变革和革命的方法；是课题，而不是一组建设用的蓝图。它是一座桥，通过它，亚洲和非洲非工业化国家可以轻快地越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抓住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去发展，变得强大。在长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毛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他的方法是不坐等新的工具和机器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进行武装革命。他的武装起来的当地农民，保护着其他的农民，他们按照自觉的愿望去改造经济和社会，而不等待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条件从外而来。

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讲话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女记者，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本世纪30年代，随着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一些外国友人及记者，竞相前往中国苏区和抗日根据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其中之一。她先后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如：《毛泽东访问记》、《毛泽东》等。

斯特朗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958年她定居中国。

下面这段文字摘编自《斯特朗在中国》一书。】

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出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毛的机智时常使我措手不及。某次我谈到延安平静的生活，他略带玩笑地要我注意蒋介石和朱德的差别，说："两个人都刚庆祝过六十寿辰。蒋的头发全白了而朱德才有几根灰发。"

我把他的话当真了，"但是朱德在战场上过的是一种艰苦

的生活，蒋却安逸地坐在南京。”

“我并不认为他坐得那么安逸。”毛眨眨眼睛反驳我。

另一次我赞扬毛说，他挑的这个地方气候好，我喜欢天气干燥。他立即答道：“我们并没有挑选。”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共产党经过闻名的长征，“发动全中国起来抗日”之后，是在一种胜利的情况下来到延安的。但毛反倒指出他们是因为被赶出南方生长稻米的好地方，才到延安来的；由于这个地方很穷，又十分遥远，所以他们才能站住脚。

毛和在延安的其他人一样住在窑洞里。他经常变动住处，也许是为了就近研究问题；也许是由于他是中国头号的共产党人，有可能遇到危险。1946年8月，在我访问的初期，蒋的首批炸弹正落在两周前毛曾居住过的窑洞不远处。延安有许多人认为轰炸的目标是主席。除去随时迁居外，毛无忧无虑地四处随便走动。

我同他的第一次会晤由于一阵晨雨，延河水上涨而被推迟了。次日河水下降，我和翻译乘卡车前往毛家。车子滑下陡峭的河岸，冲撞着河中的大块圆石颠簸而过，从一个危险的角度爬上对岸，驶进杨家岭的大门，党中央就坐落在这个狭窄的峡谷里。我们在不远处下车，走上一条两旁长着玉米秆和番茄藤的陡峭小路，来到一个山壁，上面挖了二十来个窑洞。

紧挨着周围邻居的四个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家。看到陆定一来做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我很高兴。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而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快又谨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上的隔阂。毛的思想轻快地遨游了全世界。他看到了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他首先询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况。我发觉有许多事情他比我更了解。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二十年来，他连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邮局也没有一个。

毛认为谈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战争——当时是1946年末，冷战已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更为直接的许多矛盾”。战争或许终究会发生，但是他认为可以加以制止。因为苏联不要战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的右翼”才要战争。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惧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说，但是要同苏联作战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可能直接发动这一类战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毛笑着把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放在桌子上，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中间还隔着一长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被拖入战争。他把火柴盒和香烟放进长长一串的行列里，风趣地说着它们代表什么国家。他说，如果很好地唤醒人民，“各国人民的合作”是会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发生第三次大战。

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他称这些武器是“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讲：“它变得孤单了。它有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或病了，连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说起“反动统治者”时，他说：“他们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

“纸老虎”几个字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了，问我是否体会到它真正的含意。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稻草人”。毛让他停下来，请我解释什么是稻草人。他听后拒绝使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人们把它做得像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用纸压出来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解释后就接着说下去，用英文讲“纸老虎”，并且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好笑。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是一阵二月的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纸老虎。”

“等一下，我是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么？”我插话问。

毛答道：“不仅仅是这几个字。”他还在笑，然后又像一个要把话说得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以后在毛的文章里出现了“纸老虎”的比喻。我的感觉是有许多这样的比喻先出现于他的谈话之中，然后才加以发表使用。）

尽管毛泽东对蒋一笑置之，他却不愿预测自己的胜利。许多别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估计需要多久能得胜。毛说：“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仗；如果需要，我们能再打上二十年。”1946年他在延安就已考虑到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外国武装干涉。推翻蒋并不太困难，

但是在蒋的背后，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势力。自从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于1842年把洋货强加于中国后，这些势力就一直在阻止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因此，他不能说要多久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取决于许多国家，取决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力量”的发展。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对于这些人还有待进行教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答道，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自己。世界人民反对它。”“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毁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毁灭原子弹。”

当主席和夫人用煤油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我走下山坡时，已接近午夜了。我们来到卡车等候着的小路旁，相互道了别。他们站在小山上，注视着车子颠簸着往下开入延河的河床，溅起了浪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非常明亮。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

〔秘〕塞莉亚·巴里奥斯

【塞莉亚·巴里奥斯，秘鲁著名记者。巴里奥斯曾在应邀来北京聚会期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一文中，巴里奥斯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感受。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该文。原文载自秘鲁的《新闻报》。】

我一到达中国，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名字："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亲切地提到这个名字。对革命来说，这位领袖是团结的中心，是它的信仰和宗教。

要想见到毛是很困难的。当时我们这些应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大约五千人聚集在北京。

这位伟大的理想家，历史上最不屈不挠的造反者在全中国确立了他那作为唯一伟大力量的地位。

在北京逗留期间，我访问了公社、学校、工厂、合作社。毛的名言、他的思想一直是那个强大和复杂的国家的行动指南。

十月份温暖的一天，我到著名的北京"红星"公社去访问。

当我们回到市区时，《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等在旅馆门前，看上去她有些激动。她同翻译讲了几句话，于是脸上露出了微笑。

“别下车了”，她对我说，“毛主席将接见你。”

“毛泽东主席，现在，我就这样行吗？”我不知所措地问道。

“没关系”，她回答说，“毛主席是非常朴素的。你能见到毛主席很幸运，你的一些同事来过几次，都没有能够见到毛主席。”

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有一群人正等着，他们已经得到确讯，知道毛要来。

人们领我们进了大厅。大厅墙上挂着以中国传统国画轻灵飘逸的笔法画的大幅花鸟画。

我们按国籍分了组。一位阿根廷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将要见到毛。许多人同毛主席握完手后，恨不得把手留作永久的纪念。”我对她说：“同一个人握手实际上并不那样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作为领袖而参与的这个历史进程的规模。”

几分钟过后，毛泽东出现了。我原以为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进入大厅会象神人出现一般，形成一个震动人心的场面，实际上我却在肃静的气氛中看见一位衣着整洁朴素、和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的老人走了进来。

我看了他的面庞。他的目光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的目光安祥而清澈。全身都焕发出谦虚之感。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上最光华四射的智慧之一。他是一位纯朴的人，举止谦虚，这反而显出他的伟大。

于是我理解到他的心胸广宽，明白了为什么他的人民热爱他。他同他们一起斗争，他以顽强和不可动摇的造反精神坚持实现他的理想。他解放了他们。

当毛来到我身边时，他微笑了。他伸出右手，我听见他说“秘鲁”，还说了一些表示欢迎的话。

我向毛致意时说："看到您的思想唤起了全中国的智慧和意志真感到了不起。我看到，在工厂、公社和街道上，任何轰轰烈烈或平凡的创造活动无不从您的思想和教导中得到鼓舞。"

当毛离开大厅时，我看见一群个子十分高的、身穿长袍的非洲人一边眼里流着激动的热泪，一边唱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歌曲。

法国人笔下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法〕K·S·卡罗尔

【K·S·卡罗尔，法国著名记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友。卡罗尔曾于六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先后到过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并著有《毛泽东的中国》(原书名《毛的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作者在书中较为客观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大地上的所见所闻，同时也表露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不解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毛泽东的中国》一书。】

访华期间，我们干了好几件创纪录的事。首先，停留时间创了纪录。临时来访记者中，很少有人在北京呆过两个月的，而我们却呆了整两月。另外还在外省呆了两个月，创造了旅行里程的最高纪录。从地处中越边境的昆明、南宁到俄国毗邻的哈尔滨；从东南沿海的上海到西北高原的延安；我们南北纵穿，东西横贯，走遍了全中国。在这期间，我们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创造了采访人数的纪录；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中、小学和大学，创造了参观单位数的最高纪录。当然，我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各种纪录。

到北京的最初几天，我就觉得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奇妙的

杂交体。官方使用的政治术语，对话者采取的理论立场，几乎到处悬挂的斯大林画像使我不禁联想起在苏联度过的青年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把中国人的七巧板嵌入斯大林主义的框框中去。例如，中国的劳动付酬制度与苏联旧时的制度就毫无共同之处，中国树立起来让群众学习的英雄人物的类型也截然不同。许许多多别的事物也显示了根本的差异。我觉得，在斯大林的老模式中，中国似乎注入了斯大林根本不喜欢的一种材料。这使我困惑。

我们之所以尽可能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采取自相矛盾的态度，学说上采取斯大林的正统态度，实践中“离经叛道”？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体系的三个因素是一个整体：在不发达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一套特定方法；一个铁板一块、领导一切的党；一个宗教式的、用以激发劳动热情、为无情镇压不忠顺者提供依据的意识形态。这几个因素造成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人，而且这些因素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说它们谁派生了谁。例如，到底是工业化和强令推行的集体化分泌出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相反的情形，即斯大林紧抓党权的意识导致了工业化和集体化不得不那样粗暴地进行？实际上，这几点是互相联系的，迫于1927年的形势，苏联不得不采用这些方法，为达目的，他们也许没有别的选择。

这些，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辩护士的观点，西方的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在抨击斯大林宗教的同时，又指出斯大林本人既创造了他的制度，又被他的制度所禁锢。他是个只会请鬼不会送鬼的人，结果触发了一连串的链锁反应，弄得无法收拾，迫于事态发展的压力，他又做出一些连自己也无法预见后果的、纯属权宜之计的决定。

斯大林当初不曾冷静地估计到日后会把两千万苏联人投入劳动集中营；他不曾料到日后必须对先进工人和干部给予特殊照顾，

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一个政治、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毫无准备，基层对来自高层的指示不肯服服贴贴地接受的国家里，采取这些措施，正是事业的需要。

为了达到目的，斯大林也许知道必须将胡萝卜和大棒同时并用，但他肯定不曾料到镇压会扩展到如此广大的范围，对部分人的特殊照顾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会引起如此严重的腐化。斯大林被说成永远正确、高瞻远瞩、代表“马列主义”的正统而不容置疑。这使他能够对世界隐瞒苏联的真相，对内消除任何反抗的企图。斯大林宗教不能对事事都做出解释，但能解释为什么必须对政治上的反对分子赶尽杀绝，能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一种有用的恐惧感，能使信徒不为任何外界的影响所动。在这种气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苏联人，养成了一种特别的性格，对世界持一种特定的认识，这一切从他们的言谈用语上即可反映出来。

各人民民主国家事态的发展，表明问题不是俄国一家独有的现象。全凭经验建立起来的俄国制度，以一种学说为掩护，而在所有接受这种学说的国家里，又诞生了一批同样类型的人。波兰的镇压也许没有匈牙利的严厉，但两国的斯大林主义却如出一辙。捷克斯洛伐克比罗马尼亚远为发达，但两国却采用了同样的管理办法。即使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内，尽管没有政治警察强迫大家遵守纪律，也还是思想僵化，等级森严。精神文化上的一定态度，斯大林式的特殊语汇，在我们看来，最终与某一个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遥距中国的地方，阅读中国官方可以说用“斯大林式的语言”撰写的文献，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存在着斯大林主义，更何况，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早就拒绝走非斯大林化道路，仍然忠实于斯大林的原则。这当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从感情上讲，中共对克里姆林宫的干涉可埋怨之处太多了。但是，为了工业化，不发达的中国应该采用已在苏联取得成功的配方。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宁可牺牲好几代人来实现工业化，否则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

的。

这就是我们踏上旅途时的基本想法。同时，我们也极有兴趣看看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是什么样儿。中共素来以比较灵活著称，其领袖人物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及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十分了解。我们因此推测他们会设法部分避免由斯大林缺乏远见而造成的某些过火行为。总之，我们料定会在中国看到一种改进了的、"温和的"斯大林主义。

有一件事，我们原先并不知道，后来一见使我们十分震惊，这就是毛泽东主义者根本拒绝照搬苏联经济模式。也许他们从斯大林主义中抓住了可以与他们自己的形势相"结合"的思想，认为可以以此激励群众。他们使用斯大林时代的革命词句，向"资本主义桎梏下的阶级兄弟"发出号召，他们也继承了另一思想，即党应该团结得坚如磐石、对群众起教育作用。但中共教育的内容与苏共过去的教育内容则大相径庭。

中国人不想采用强迫劳动和优待工作突击手的办法来确保国家的发展。工厂里从不实行计件工作制，不主张搞斯达汉诺夫运动，没有劳动集中营。标语口号并不要求优先发展被视为苏维埃工业化的关键的重工业，农业仍然是基础，看来谁也没有把它单纯看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手段。

尽管市场远没有饱和，顾客因此也不苛求。但中国的流通销售部门仍然坚持检验商品质量。到处都在大规模地培养技术干部，但与此同时，又不惜牺牲他们的时间，迫使他们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以坚决避免他们脱离群众，自视高人一等。对机关干部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在一个幅员广大，实行集中管理的国家里，这部分人数是庞大的：任何试图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高于——哪怕是稍稍高于——群众生活水平之上的念头都会受到惩罚。中国在各方面都采取了类似措施，反映了一种"患不均"的心理，苏联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一问题。

当然，在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也实行某种程度的平均主义，

例如，实行免费上学和公费医疗。可是，如果说在起跑线上人人机会均等的话，那么“跑得快的”则给予偏待。中国人则不同，对于在一个穷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贫富不均，他们想减少到最小程度，从而把一个国家做为一个整体推向前进。苏联人的作法正好与此相反，想把这种不均作为刺激因素加以利用。

为了实现这种平均主义，当然需要一些调节手段。正是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提供了这些手段，它提出一套为人处事的“优良行为准则”和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标准。对于杰出人物从不给予较多的物质照顾，而是请他们帮助后进，在为人民服务中完善自己。对于基层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则教育他们首先关心集体利益，告诉他们只有整体进步了，他们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而这种富裕，首先是精神上的，其次才是物质上的。

很明显，这套体系比当年的斯大林主义更富于“宗教”意味。在中国，要做一个“有修养”的共产党员，只是热爱毛主席、坚定不移地相信党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时时刻刻遵守道德规范、坚决摒除任何自私的或反社会的企图。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种道德净化方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深知自己的不发达境况，对十五年前逞凶全国、严重后果至今未消的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唯利是图仍然记忆犹新。

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对中国经济起一种调节作用，它不是为了解释早先决定的正确性而在事后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教义，而是从所有“信徒”长期生活的经验中诞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中国独有的，也许不大可能输出到国外。

毛泽东主义者时刻关心结合自己的国情，因而不大愿意自诩为理论家。他们宁愿让人们说自己是斯大林主义的简单追随者，而不愿将自己的经济体制上升到理论高度。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社会，日新月异，所以必须经常地使其体制适应新形势下的新需要。这样，他们宁愿恪守一些大的原则，例如生产中人的因素第一的原则、集体高于一切的原则，而不愿将目前的管理方法

上升为法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方法仅仅是根据一时一地的特定形势制定出来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手段而已。他们并不理睬这样的观点：使用的手段不同，发展的方向也会不同，或者说手段会改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终目标——话又说回来，共产主义社会到底什么样，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大概心里也很清楚，但就是不肯提出而已。同时，他们也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经验的独创性；怕的是在自己激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的时候反而被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奇怪的是，自从国际共产主义爆发危机以来，毛泽东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主张平均主义，更加“中国化”，而与此同时，却声称自己是唯一忠于斯大林学说（它指导社会主义世界一直到 1956 年）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能保证他们获得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不得不“割裂”斯大林主义，甚至比他们的对手走得更远。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认为斯大林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基本原则”，这是不能触动的：革命成功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以此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党必须全体一致；面对阶级敌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互相支持。二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采取的具体做法：党与基层的关系，经济和行动手段（毛泽东承认这些手段充满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每个共产党只能遵守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自己也在著作中结合本国的情况重新阐述过这些原则。中国人说，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才能既解决一切内政问题，不管是集体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也有助于传播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全世界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毛泽东，他们能在斯大林永恒不变的原则范围内，解决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人们反复强调，经济发展问题就是这类特殊问题之一。

可否将斯大林的学说“一刀两断”呢？这种做法是否属于实用主义的简单化？它会不会使人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为

了替斯大林辩护，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在保留斯大林“正确原则”的同时，承认其“某些实践上的错误”，而且也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对这些原则进行筛选，记住其中的一部分，忘掉其中的另一部分。他们也象斯大林分子那样，杜撰一些根本不曾有过的原则，企图以此解脱自己的困境，例如生产中人的因素第一的说法即属于此。他们逢人便说，斯大林讲过“世界上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但你若对他们说，斯大林也讲过“干部决定一切”，讲过拖拉机比积极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更有用等话，他们却充耳不闻了。他们不缺乏热情，但有时缺乏自信，即使在谈到这些基本原则时也是如此。

此外，这种对斯大林正统的支持有时候妨碍了中国人对某些世界事件的正确分析；当谈及近几年苏联国内的大变革这一点时，则显得尤为明显。他们猛烈抨击寄希望于物质刺激的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所实行的政策，说苏联人的这种政策无法掩盖他们想要确保暴发户特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真实用心。中国人忘记了，斯大林主义一直给优秀工作者以优厚待遇而强迫不忠顺者服苦役。斯大林死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再也不能使用恐怖手段了，于是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变本加厉地使用物质刺激手段。他们使用这种手段是在一个政治上、实践上依然如故的环境下来进行的：仍然是铁板一块的党执政，“基本原则”仍然得到遵循。为了证明修正主义的异端邪说，中国人于是不得不抓住苏共1961年（斯大林逝世八年以后）纲领中的一小句话大做文章，这句话说，苏联今后将会变成“全民国家”（因此就不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事实上，苏联的历史表明，从斯大林式的经济体制中拆除部分零件，整个体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苏联政治上的铁板一块已经变成限制变革、束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动器。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保证学说的正统性和探求共产主义目标的连续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中国，也不能设想可以在与斯大林希望建立的经济基础迥然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建设一个杂交式的斯大林

主义。

不能否认，毛泽东主义也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打上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斯大林主义给予他们以思想方法、各种术语、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的方法，他们又想把这些东西传之后世。但他们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给他们的经历和说教蒙上了十分特殊的"色彩。"未来几代人可能更深地打上毛泽东主义这方面的烙印，而不是斯大林原则的烙印。在一个实行政治刺激、劳动者工作不计较报酬又对之灌输平均主义精神的国家，人民或迟或早要从党组织僵硬的家长制统治中挣脱出来。

一旦中国经济文化赶了上来，外界的威胁也有所缓解的时候，它就该动手解决一个发达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了。中国人民依照现今要求和他们养成的习惯，不会去追求更多的消费享受（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人民追求这种消费享受），而是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民主。中国人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人不同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建成另一种形态的社会主义。

目前，要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进行研究，是极其复杂的事，因为他们的用语和观念含混不清。仅仅因为两国都搞严重的个人崇拜，我们过去往往倾向于将毛的中国和斯大林的俄国进行类比。我们不得不成百上千次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以便迫使中国人"坦白"他们到底在斯大林的正统的掩护下干了些什么。但不管涉及的是过去还是现在，并不是每一个问题我都能得到答案。我感到无力以个人的假设填补这些空白，因而只能原原本本道出我的所见所闻。

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1929年，身为《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史沫特莱首次来到中国。1934年她再次来到中国，并于1937年初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期间，她先后会见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交往颇深，用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的话来说，"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的天才冒险家度过一段时间以后，毛开始与西方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

其著作有：《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前书。】

我初到延安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永生难忘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大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他

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一样，对他也有许多传说。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他，重价购买他的人头。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

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稍后几年我发现这类著作流传在一些穷乡僻壤。包括极端反共的政治家、有时也要剽窃他的军事著作，据为自己的东西发表问世。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铁面无情，象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由于语音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象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日深，我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又有一批记者冲破封锁线到延安访问，但无不经过西安军警特宪的百般

阻挠。甚至在红军改编成为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以后，记者要访问延安仍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冲破人为的封锁线，对外国友人说来仍然是冒险的生活，也是顽强的挑战。

访问过中国红军回去的记者个个都有一种共同的观感。即：他们曾经同当代中国的新人，同他们一样思想进步的新人在一起过。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给他找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几个月后，这个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

忍耐和决断，自信和谦逊

〔美〕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是继斯特朗后进入苏区的外国记者之一，并曾于1944年代表《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参加外国记者团到延安。著有：《中国未来的革命》等。

下面这段文字原载于1945年9月2日纽约《下午报》。】

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

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是干脆不见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这人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和风度是沉静的。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为有力。在1924年—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和作出错误，而且这些错

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功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与士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于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骄傲的知识分子们被他派到乡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识字的领袖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

在中国革命最初大失败的时候，他一方面反对愿意放下武器的人们，另一方面反对主张在中国主要城市中心进行拚死的暴动。代替这两个办法，他把运动的中心移到了遥远的乡村中。

在著名的“长征”的时候，红军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

在总司令朱德的支助之下，他把红色部队领到极其贫困的陕北，再进入山西，而在那边，他们被夹在一个似乎绝望的包围袋中，被夹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

可是正因为他们移动着对抗日本，同时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对付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蒋所派去打击他们的部队自己反叛了，反而把蒋扣了起来。其时，当毛可以随意处置他的旧敌的时候，他却坚持说必须把蒋释放，因为他相信蒋的经验已经

使蒋明白内战是不可能的，并认为释放了蒋，国共合作反抗侵略者的基础，就能够奠定。

同样的对于原则性的坚持，规定了毛对于国民党封锁的反应。1939年后国民党的封锁，使共产党人有完全饿死的危险。八路军当时是能够以武力冲破封锁的，但是毛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使中国内部发生全面冲突，这是日本人久已求之不得的事。

相反的，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主持了一次经济资源的充分调查，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为发展资源而工作。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教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获取抗战的人力，而不必扰乱后方的经济。

到1944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生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

今年4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成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坚持要和双方作军事合作，这样来使任何一方投外国援助之机，以拒却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

在今天和蒋的谈判中，他的立场也不是什么新的。早在上述四月间的演讲中，他曾说：

“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以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将来有了民主的选举制度之后，不论共产党是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党或是少数党，政府都应该是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

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

“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

〔日〕福原亨一

【福原亨一，70年代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

下面这段文字原载于1976年日本《熊本日日新闻》。】

毛泽东主席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新生，现在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夸耀享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的西欧、日本进行较量，在世界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在历史的轨迹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那末，毛主席的确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二十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必然结果，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具有极

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充分掌握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了使之奋起和团结而展开了有效的政治宣传。

中国，幅员非常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统治并未遍及全国。从这种现状出发，他制定了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借以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他怀着坚定的信念推行了这种战略。

中国革命历史的起伏，由于同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更加富于戏剧性；然而可以说，毛主席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创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游击战的理论，确立了他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乃至是内战的胜利者的地位。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为绚丽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光辉的英雄。

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反复阐述了革命和文化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文艺讲话尖锐地提出了艺术的阶级性、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他断定，不变革群众的思想，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功。

毛主席喜欢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一贯采取把这些作品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予以尊重的态度。他在传统诗词——它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创作方面也显露了非凡的才能。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铸成他是具体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的形象。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具有英雄豪杰的风格。

“向杜勒斯学习”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几次访问过中国。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谢春涛所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一文，文中斯特朗详细记叙了她与毛泽东会见的情景。】

1957年10月，我曾向毛请求过与他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人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同行的共有4人：中华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唐明照，他经常为外国人安排这样的旅行；浦寿昌，他作为周恩来的翻译曾与我见过面，这次是去南方为毛作翻译；我的翻译赵凤凤和我自己。浦的出现，表明毛在国内视察工厂和公社，不需要一个翻译。而且，他是在没有大员随行的情况下旅行，与工人、农民和当地的党的领导人交谈。这被证明是事实。

在我们的旅途中，另一个事实变得清楚起来。当我们在武昌城外的休养地东湖实际见到毛走下别墅的小石阶迎接我们到来的汽车之前，我们一直未被告知将去何地与毛会见。东湖是武汉的值得夸耀的地方。解放后多年来，它已被开发成为一个有水的湖泊，并被建成为一个既适合从喧闹的武汉城

内出来远足，又可作为休养所、旅馆和医院的公园。

13日，星期五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在10点钟之前，没有告诉我们，毛就在近处，还是在几小时的路程以外。在几个月之前，我曾游览过东湖，并且在湖边的一座不大房子里吃过午饭，我知道在石头房子不远处就有一些别墅。所以，当15分钟的行驶，将我们带进一所别墅，我们看见毛身着一套缝制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台阶时，我一点也没感到奇怪。

他精力充沛，甚至快活地急速走动着。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了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他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你不比我黑。"确实，毛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显得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时，他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开始计算年数时，我说："22年了。"他回答："很对。"他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想回复，但却没有时间。我说这是自延安我们的谈话之后，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略事考虑之后，他承认确实如此。我想，他的很长的解释，正是对于那年不充分陈述的补充。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的对面，大约有三码远。雪莉·格雷厄姆和我坐在杜波依斯两边。茶送了上来。

因为杜波依斯是位年长的来访者，座位已经自由地移动过去了。毛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你是女主人，他们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惯，客人从来应比主人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毛十

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而不是我，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幸好，我已理解了这点。

谈话是从谈人开始的，在半严肃、半玩笑的气氛中进行。他问了我的年龄，得知是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三代人，”毛评论道。我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抛开了他的评论说道，杜波依斯大到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毛说，暗含了对杜波依斯91岁高龄仍然活动灵活的赞誉，“但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这是我的游泳伙伴。”他指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省的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接着说，他喜欢游泳，并且，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

“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他接着说，“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真的？”毛问道，明显地比较高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象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马上纠正道：这不是他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他说，“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

从听众的脸上，毛看出了他们的疑问，他接着说：“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他盯住杜波依斯问。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时间。”他说。

“我不同意，”毛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继续评论杜勒斯，他称：“中东事件”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他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驻长一些，“为什么？”他问，“他们很快撤出？”

“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雪莉·格雷厄姆说。

“是这样，”毛幽默地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他接着说，依然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然后列数了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在那里，人民是用蛋和痰来欢迎他的。”第三，是去年6月14日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6月15日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毛说，“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他接着说：“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三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了边缘。”

“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

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为了说明这点，毛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的军舰的位置。

杜波依斯博士提出了战争中人民受害问题，打断了毛的谈话。台湾的人民受害，美国的黑人也受害。他甚至害怕美国的黑人会被灭绝。

毛使其放心地说：“美国有 1800 万黑人，灭绝他们是不可能的。将被灭绝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在中国也将很快被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战士永远不会灭亡。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杜勒斯及其同伙将被灭亡，他正做着他所能够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你劝我投杜勒斯的票？”杜波依斯严肃地问。毛笑他提问的直接，而且同样直接地回答说，他不要给杜勒斯本人投票。

杜波依斯坚持说，他的许多朋友已被消灭了。

毛严肃但却平静地说，他的家庭中已有 6 人遭到了杀害。他的弟弟、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和他弟弟唯一的儿子，都被国民党杀害。后来，他的大儿子又在朝鲜被杜鲁门杀死。“我的家庭中只有两人幸存下来，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这里很明显是指他的第一个家庭，而不是指现在的妻子及她的孩子）。

“虽然如此”他接着说，“他们永远也杀不尽共产主义者。我家中人员不多，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很多。浦在这里，”他指了一下他的在美国两所学院学习过的翻译，“美帝国主义培养他们来反对我们，但他却来为我们工作。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将会越多。”

大概就在此时，杜波依斯说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以为他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却知道他不是。

毛说，你已经 91 岁了，在另外一个 91 岁时，你将会遇到马克思，我想他会接纳你为同志的，这是始终可能的。”他接着说，“也许我先你而去，那么，到时我会很高兴地将你推荐给马克思的。”

话又转到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上来。毛列举“美国共和党在去年 11 月选举中的大败，”提及了“57 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至于此事，他承认“有了一些恢复。”他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认为在英、法、西德与美国的利益冲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走向解体。他说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将把西方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也提到了苏联“向太阳岛发射了一颗新的卫星，”即绕地球旋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他还说起了苏联已宣布了它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毛特别地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这点上开始了可以考虑到的讨论。毛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六百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点又导致了对于小和大的关系的讨论。毛评述道：“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 150 磅。但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

在另一层关系上，毛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 9 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毛声称，同样的力量崇拜，也影响着美国人民以及他们中的黑人。杜波依斯回答，他以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同不受收入影响一

样，也是不受恐惧和羡慕的影响的。接着，产生了关于经济的因素是否强于“迷信的力量”的争论。毛说，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一方面经常受迷信影响，另一方面又迫于他们的利益。

由此，又引起了对“迷信”的讨论。毛介绍了“吃狗肉”。“大多数人，”毛说，“如果让他吃狗肉，将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想到牛肉、猪肉、羊肉更好一些。”他自己就曾有过这一想法。不管怎么说，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得不吃狗肉，因为得不到其他的肉吃。起初，他极力克服不适应吃，但后来他发现其味道比其他肉更好。他接着说，“在广东，人们甚至吃蛇，吃鳝。他们为什么吃蛇？”在所有这些选择中，他说，人们看到了社会习惯的力量。

毛又回到了许多世界性事件受到了杜勒斯影响和我们应当欢迎他唤醒人民这一主题。我指出，他提到的两起事件不是由杜勒斯引起的，从哪方面说，苏联发射卫星与第七个五年计划是由杜勒斯引起的？

毛看着我，笑道：“那是你的问题。”

他的生平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

〔美〕埃德加·斯诺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

1936年，我终于到达保安，找到了同蒋介石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寥寥数百个字是不能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写清楚的。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在这里主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

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

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1937）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

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

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

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

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

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美〕埃德加·斯诺

【1970年，埃德加·斯诺继1960年、1965年之后第三次来到了新中国。来华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了他，并同他就许多问题进行了交谈。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斯诺的《漫长的革命》。】

毛主席常常说，他不希望进行记者采访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但是，后来我才能够证实，他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在1970年12月10日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大都由唐明照的女儿南希·唐记录，她出生于美国。（唐先生是《美洲华侨日报》的编辑，直到1949年为止。此后他即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还有另一个人在坐——一位中国女秘书。有趣的是，这两位年轻女性都没有佩戴毛像章，这是我会见一位官员时看不到人们佩戴像章的唯一一次。

后来，我立即凭记忆把我们的对话再记录下来，而唐女士的笔记，也给了我一份。

毛主席的北京住所座落在以前的紫禁城的西角。这个以前的禁城，为朱红色的围墙所围绕，住所离他检阅10月国庆节游行队伍所在的天安门不远。在这些高墙后面，是顶端盖了闪闪发光的黄瓦的建筑物，旧王朝的官员曾居于此。今天，

政治局的成员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同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很接近。进入紫禁城要走西门，西门两侧由两位武装警卫员守卫。沿着树木繁茂的环形车道兜了一转，很快地就来到了一座大小适度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在大门口，受到两位非武装军官的迎接，他们都不戴显示身份的徽章。南希·唐说“他们两位是将军”，她怎么晓得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主席等候表示歉意。我事先并未得到通知，是在睡梦中被唤醒的。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一点左右。他因为伤风而有些不适，因此他高声说不晓得医生有什么用：因为他们甚至没法预防象伤风那样简单的疾病，它使人损失了许多时间。我谈起了莱内斯·波林医生（主席听到过关于他的事情）来，他主张用大剂量的抗坏血酸来治疗伤风。我提出寄一些给他。他说他将试用，如果有帮助，那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宽敞的书房里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许许多多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册中夹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它不是“自留地”，它属于国家，也许他需要出产品，因为别人说他最近削减了百分之二十维持生活的“工资”。

我们议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 1965 年 1 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曾经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因此他说，你（按：指斯诺）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 1967 年和 1968 年重访中国的官员，都是属于一个极

"左"集团的。这个集团曾经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励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自然，个人崇拜搞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那些形容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了。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善的。你（按：指斯诺）千万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我说："我记得，就在您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您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个人崇拜吗？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如果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向我问道，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对于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以前的访问中，他曾经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说来健康情况良好，但他再次说他“不久就去见上帝。这是必然的事情，每个人终归都得去见上帝。”

我说：“伏尔泰曾经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就可能掉脑袋。”

毛表示同意，并说许多人因为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就掉脑袋了。

我说：“自从那时候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人类在许多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者10年以前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说，没有。我（按：指斯诺）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开初生的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美国情况也许一样吧？

我说：“在这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了。但是，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妇女，现在，她们正在学习行使选举权。”

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有人端来几杯茅台酒所打断，这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敬酒。使我后悔的是，主席注意到我敬酒时疏忽了在座的女士。我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依然没有平等对待女性。

主席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但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两国人民。

如果苏联不行（他的手指向一个方向），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美国就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国

家，而且教育普及，他将高兴看到那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预料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他说，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左、中、右的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象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毛解释说，应当欢迎他来，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将高兴同他谈，他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

他说，遗憾的是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不是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了解到，某些中间人当时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旨在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国际保证东南亚的独立；通过弄清台湾问题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 年，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今年进行的。我自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是最早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给戴高乐夫人的对这位将军的唁电，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任何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的外交官很活跃。一位已经访晤过一次尼克松总统的欧洲国家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 12 月再次来到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跑到白宫去举行会谈，而于 1 月间回到中国。我

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那里获悉，白宫当时再次转达了一个信息，询问总统如果派一位私人代表去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在中国首都受到怎样的接待。大致在同一时候，一位以前曾抱相反看法的高级中国外交官莫名其妙地告诉我："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情况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主席再次向我追述说，教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且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统治地位。

我提到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经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他对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最好的弹药运输队。"毛说，是的。他喜欢那样的帮助。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一"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的过程中，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情他很不赞成。一件事情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打派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主席很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情是虐待"俘虏"——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的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并发给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士兵受到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在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我问道："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有人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而苏联的原子弹有那么大（他伸出他的拇指）。苏联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拇指加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对付两个拇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听说他们有点怕。即使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这个人也可能吓坏了，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苏联因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中国人钻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了第一枪呢？苏联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苏联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苏联人的批评文章，但是苏联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后来他们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去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毛说，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话，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减了。

他说，苏联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就会都听从。他们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互相矛盾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他们国家之间的问题的。

毛主席再次提到美国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 50 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是不行的（他把两手摊开）。

当他亲切有礼地送我到门口去时，他说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真的很简单。他说，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有漏孔

的伞的独行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那些指导中国全部对外政策、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地区政策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在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以后，中国将谋求同欢迎它充分参加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的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他是中国历史这个剧中的一个重要演员”

〔加〕马克·盖恩

【马克·盖恩，加拿大著名记者。毛泽东生前曾几次会见过盖恩，而留给盖恩印象最深的会见却是1947年2月的一次会见。在他看来，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帝王和哲学家，好象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在与毛泽东会见时，谈了对原子弹的看法。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盖恩对当时会谈的回顾。】

我跟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中国西北他住的窑洞里。地点是在延安市郊一个山岭中，时间是1947年2月。当时，国民党军队距延安只有六十哩。毛泽东在当时是五十四岁。

毛泽东在延安有十年之久，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他在那里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早在二十年前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游击根据地时便已有了雏形。

我在延安与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会谈，经常长达十至十二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我和毛泽东那次谈话，从午后不久便开始，一直到翌日凌晨才结束。我记得，那天晚上回来时十分寒冷，引路的灯笼若明若暗，而我则一路上盘思着这个刚

刚离开的人。当时我想，一个有意志忍受延安这种困难和危险的人，是不会失败的。突然间，我感觉到，一个巨人就在我的面前。

在延安的年代里，毛泽东就意识到他是中国历史这个剧中的一个重要的演员。他熟知中国的帝王和哲学家，好象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但对毛泽东来说，历史是农民起义，不是帝王王朝。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甚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好的领袖、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他使人相信毛泽东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农民起义者，因为当他击败敌人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时，便不再会有农民暴动。

那天谈到晚上，天色黑得很快。我们一道进餐。但吃不多久，我们又一道分析国际形势。他预料美国的工农劳动群众会起来革"华尔街帝国主义"的命，成立一个民主政府。

延安那台残旧的收音机，每天都把美国的广播送来，包括华尔街股票市场行情等等。毛泽东研究了股市行情后，便预见美国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美国人民觉醒过来。

在我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问我是否愿意同一些领导人讨论日本问题，特别是原子弹投在广岛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来华前曾在日本工作了十五个月。除毛泽东外，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那里，我告诉他们广岛的可怕情景：在一刻之间，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一个炸弹。一些领导人担心现在美国会用一两个原子弹来毁灭延安共产党根据地。

几天以后，毛泽东会见了党的高级干部，问他们："原子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的同志为甚么把原子弹看得那么神奇呢？是资产阶级影响。武器决定一切的想法，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当我见到毛泽东时，他知道我的

讲话，指出我的说法错了。他说，帝国主义者发明这个武器来唬吓意志薄弱的人，但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说："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对核武器的弱点的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教导人民说，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过不少成为伟人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一起——在那严寒、荒凉的窑洞里。

三次难忘的谈话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过去的10年中，我在中国与毛有过3次长谈，每一次都令人难忘。从时间顺序上说，这3次谈话是：1959年3月初，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东湖，我与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一起与毛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在北京与被邀请的几位美国友人一起与毛的谈话；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为我祝寿时的谈话，正像我们后来所得知的，他已经开始发动在北京不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我将依次记述这些谈话。

一

他精力充沛，甚至快活地急速走动着。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了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他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你不比我黑。”确实，毛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显得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

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时，他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开始计算年数时，我说："22 年了。"他回答："很对。"他说，10 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想回复，但却没有时间。我说这是自延安我们的谈话之后，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略事考虑之后，他承认确实如此。我想，他的很长的解释，正是对于那年不充分陈述的补充。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的对面，大约有 3 码远。雪莉·格雷厄姆和我坐在杜波依斯两边。茶送了上来。

因为杜波依斯是位年长的来访者，座位已经自由地移动过去了。毛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你是女主人，他们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惯，客人从来应比主人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毛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而不是我，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幸好，我已理解了这点。

谈话是从谈人开始的，在半严肃、半玩笑的气氛中进行。他问了我的年龄，得知是 73 岁，而他自己是 66 岁，杜波依斯是 91 岁。"三代人，"毛评论道。我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抛开了他的评论说道，杜波依斯大到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毛说，暗含了对杜波依斯 91 岁高龄仍然活动灵活的赞誉。"但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这是我的游泳伙伴。"他指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省委第一书记，接着说，他喜欢游泳，并且，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

"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他接着说，"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真的？”毛问道，明显地比较高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马上纠正道：这不是他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他说，“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

从听众的脸上，毛看出了他们的疑问，他接着说：“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他盯住杜波依斯问。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时间，”他说。

“我不同意，”毛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继续评论杜勒斯，他称“中东事件”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他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驻长一些，“为什么？”他问，“他们很快撤出？”

“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雪莉·格雷厄姆说。

“是这样，”毛幽默地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他接着说，依然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

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然后列数了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在那里，人民是用蛋和痰来欢迎他的。”第三，是去年6月14日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6月15日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毛说，“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他接着说：“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了边缘。”

“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为了说明这点，毛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的军舰的位置。

杜波依斯博士提出了战争中人民受害问题，打断了毛的谈话。台湾的人民受害，美国的黑人也受害。他甚至害怕美国的黑人会被灭绝。

毛使其放心地说：“美国有1800万黑人，灭绝他们是不可能的。将被灭绝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在中国也将很快被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战士永远不会灭亡。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杜勒斯及其同伙将被灭亡，他正做着他所能够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你劝我投杜勒斯的票？”杜波依斯严肃地问。毛笑他提问的直接，而且同样直接地回答说，他不要给杜勒斯本人投票。

杜波依斯坚持说，他的许多朋友已被消灭了。

毛严肃但却平静地说，他的家庭中已有6人遭到了杀害。他的弟弟、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和他弟弟唯一的儿子，都被国民党杀害。后来，他的大儿子又在朝鲜被杜鲁门杀死。“我的家庭中只有两人幸存下来，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这里很明显是指他的第一个家庭，而不是指现在的妻子及她的孩子）。

“虽然如此，”他接着说，“他们永远也杀不尽共产主义者。我家中人员不多，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很多。浦（寿昌）在这里，”他指了一下他的在美国两所学院学习过的翻译，“美帝国主义培养他们来反对我们，但他却来为我们工作。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将会越多。”

大概就在此时，杜波依斯说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以为他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却知道他不是。

毛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时，你将会遇到马克思，我想他会接纳你为同志的，这是始终可能的。”他接着说：“也许我先你而去，那么，到时我会很高兴地将你推荐给马克思的。”

谈话又转到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上来。毛列举“美国共和党在去年11月选举中的大败”，提及了“1957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至于此事，他承认“有了一些恢复。”他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认为在英、法、西德与美国的利益冲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走向解体。他说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将把西方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也提到了苏联“向太阳岛发射了一颗新的卫星”，即绕地球旋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他还说起了苏联已宣布了它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毛特别地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这点上开始了

可以考虑到的讨论。毛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1/3。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点又导致了对于小和大的关系的讨论。毛评述道：“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150磅。但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

在另一层关系上，毛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毛声称，同样的力量崇拜，也影响着美国人民以及他们中的黑人。杜波依斯回答，他以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同不受收入影响一样，也是不受恐惧和羡慕的影响的。接着，产生了关于经济的因素是否强于“迷信的力量”，的争论。毛说，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一方面经常受迷信影响，另一方面又迫于他们的利益。

由此，又引起了对“迷信”的讨论。毛介绍了“吃狗肉”。毛说，“如果让大多数人吃狗肉，他将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想到牛肉、猪肉、羊肉更好一些。他自己就曾有过这一想法。不管怎么说，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得不吃狗肉，因为得不到其他的肉吃。起初，他竭力克服不适去吃，但后来他发现其味道比其他肉更好。他接着说，“在广东，人们甚至吃蛇，吃鳝。他们为什么吃蛇？”在所有这些选择中，他说，人们看到了社会习惯的力量。

毛又回到了许多世界性事件受到了杜勒斯影响和我们应当欢迎他唤醒人民这一主题。我指出，他提到的两起事件不是由杜勒斯引起的，从哪方面说，苏联发射卫星与第七个五年计划是由杜

勒斯引起的？

毛看着我，笑道："那是你的问题。"他提议，"让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我们走了出去，来到了湖边。沿着小山下的曲径，一直走到了门口。同行者经常变换位置：一会儿，毛挨近杜波依斯，一会儿挨近雪莉·格雷厄姆，有时则挨近我。当我们走过小房子时，人们，特别是小孩子们跑出来看毛，没有人靠近和闯入。当我们走到前门时，我以为我们的访问就该结束了。但毛继续领我们前行，我们发现，他已准备了午饭。

我们与毛一起花了两个多小时进餐。饭桌上摆了许多食物，包括被我谢绝的"海参"，我不喜欢吃它。毛问我的谢绝是出于迷信还是经验？我说我以前吃过。我承认，我说了谎，我从来没有吃过。因它们看起来就像海里的黑蛞蝓，使我感到厌恶。

散步时，我评论毛外出访问农场和工厂的习惯，说大部分美国人以为，北京的一小部分人想出了政策，而强加于中国人民。毛马上回答说，对于北京的一小部分人来说，生造让中国人民接受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它需要紧密地联系各界群众，以了解人民想做什么及他们将做什么。"工厂生产不可能没有原料，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也不可能制订计划。甚至工厂不得不将原料加工成产品，制订出适合人民要求的计划，也必须有很多的分析和思考。不管分析还是人民的要求，都是必需的。"

我又问，人民公社现在是否像他所预想的那样发展，它们的前景怎样？毛说，它们正像预想的那样发展，其前景有两种可能：它们或者得到增长、加强和巩固，或者将会瓦解。但不管怎样，既然农民需要它们，要求它们，他想，它们就不会瓦解。它们粗糙的边角将会变得光滑，困难也会得到克服。

我问，困难是什么？毛说，有一些组织方面的困难，不过正迅速地得到解决。公社组织得很快，每社应有多大，应包括多大区域，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新式工业，这些问题匆忙地作出了决定。

有时这些问题上决策是正确的，执行得较好。有时则未发挥作用，而且必须改变。他认为，组织上的困难将会在1959年内得到克服，因为已派出了检查者去“整顿”具体问题。

他说，中国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钢材。1958年，大炼钢铁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1959年的目标更高。如果1959年的目的达到，那么在以后的几年中，每年提供600万吨钢铁来制造农具和机器，是完全可能的。假若那样，在3到4年内，农业将会完全地实现机械化。

“公社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将采取分权的路线吗？”我问，“当然”，毛说，“每一块国土都应当有工业，各界人民都应当有工业知识。大的中心工业需要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如铁路的铁轨等。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应当发展工业”当我问，这种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否为了避免政府和工业中大的、集中的、官僚机器的形成时，毛回答说，这确是追求的益处之一。

午饭时，我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地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回答说，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他自己已不相信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他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

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不是我们的军舰在美国沿海，而是美国的军舰在我们的水域。帝国主义者虽然将会发动战争，但他们受到人民压力的限制。如美国在占领黎巴嫩后就迅速地撤了

回去。”

“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者，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毛接着说：“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或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的特务杀死。但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

二

我与毛泽东的第二次长谈，来得十分突然。1964年1月17日中午饭后，我被告知：“主席下午要见你。”就这样，下午4到5点钟之间，我在今天留作接待室的古老水榭中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毛泽东……

毛看上去不像已经71岁。他肤色黝黑，身体强壮，神态轻松，语气缓慢，把谈话带进了一个随便的和同志式的气氛，这使我想起了在延安露天空地上的谈话。这种交流不仅是对在场的美国人的，而且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的，包括年轻的翻译以及给我们送茶、站在一边聆听的服务员们。没有什么壮观的场面和外部表现，表明与我们谈话的是正在自我改造、同时也正在改变世界的人类1/4人口的领袖。

主席用随便的、谈话的方式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人物。我们尤其难忘的是，在一般交谈的开始，毛对我而发的突然评论。

他说：“我们不让你随我们进山”，这里是指着1947年的头几个月，当时，共产党部队正撤离延安。我曾要求与他们同行，但却被告知太困难，太危险，而且，我已看过了他们的许多“解放区”，应该把消息发向世界。因此，我乘最后一批飞机之一离开了延安。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写了一本我在中国解放区、尤其是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的书。

毛笑着解释说，实际上，战役并没有像他们开始所预想的那样艰苦和危险。“国民党部队向一座山行进，以为正在追赶我们，而我们却在他们后面，爬上他们刚刚离开的那座山。这怎么可能？因为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们给我们消息而不给国民党。胡宗南用45万部队追击我们，而我们却只有45000人，只相当于他们的1/10。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县城，并实际占据了每一个村庄。但不论怎样，当地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毛接着说，“在我们失掉延安后，都为我们担心。”他说，不管反动派的力量有多大，都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终究要灭亡。如果他们把全部部队放到前线，他们也赢不了战争。而且当他们分散兵力时，又给我们提供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他们的机会。

毛说：“胡宗南从西安出来，张牙舞爪地直扑陕北。当我们看到其中的爪进入我们的有利位置时，就将其咬掉。咬掉一个手指，也能震动全身。我们这样做了多次，因此，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我们当地的部队又重新占领了延安。我们自己没有再回过那里，我们逐渐走向了全国的胜利。”

毛举了1个幽默的例子：1个人10个手指想捉10个跳蚤，1个手指捉1个跳蚤。他让我们试试，发现用那种方法1个也捉不着。捉跳蚤的办法，他说，是用10个手指捉1个跳蚤，1次捉一个连续地捉。在有些国家，他说，还有许多正进行革命战争的同志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他们将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会这点。

毛将这一话题又转到了被他称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一分为二”的哲学原理上来。比如1个原子，通常被认为是1个最小的物质单位，然而人们发现，原子还可分为许多核子和电子，并且学会了如何释放电子和利用核能。后来，人们发现核子又可分为能够释放更大的能量核能的许多更小的单位。“电子能不能再分？我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电子世界的奥秘还未被发现，但我

相信电子是能够再分的。”

我恐怕没能全部掌握毛关于电子的论述。我正回想着更多的个人事情。我可能随中共离开延安以及后来被错误地阻止的发生、伤害了我。它好像消耗了我10年的生命。我谈论着这些年。我提醒毛：我离开延安的理由，是要向全世界报道情况。

“我至今以为它是一个好的理由，”我坚持道，“那也正是我这些年所干的。”

“如果你当时跟我们走，你就会有一些经历的。”毛笑着回答说。

“我没有这些经历，”我强调说，提及了我在莫斯科的被捕。然后，我承认：“当然，如果我被允许跟你们走，我也就了解了中国人。”

毛没有停顿地又转到了革命战争和其在中国的历史上来。革命者是怎样成长的？他问，他们怎样从失败中学习去赢得胜利？一个革命党应当怎样发展它的队伍，纠正错误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我自己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师。我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个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

他用中国一部古典小说解释了这点，这部小说的名字是《水浒》。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毛说，“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正像毛的许多评论一样，他是用过去的历史来解释自己的经历。当他在湖南的“秋收起义”遭到打击之时，他上了井冈山。在那里，他的残部会合了朱德的部队，在山上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据地。也就在那里，产生了中国的红军，并从那里后来移到了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只是在中南地区经过了将近10年的斗争之后，才开始了到延安的著名的长征。

这并不是他参加革命并继续革命的一切。他说，1920年有人提议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组织了。1921年我们12个人汇集上海，创立了有六七十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他说，这第一批的12个人，幸存者中只有两位仍在革命队伍，董必武同志、目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我自己。剩下的那些，一人成了托洛茨基分子，两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国民党的叛徒汪精卫手下的日本人的傀儡。不管怎么说，尽管有人退出，但许多新人加入了进来，大多数普通人看到：除了战斗别无出路。

在党的早年，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毛说："如果拿现在中国军队里的许多同志来看，北京的、东北的、天津的、南方的、福建的、西藏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全是贫苦的农民或士兵。他们参加红军的时候，无人受过任何教育。有些在旧式的乡村儒学教师那里学过很短时间，那是他们的局限。刘亚楼，我们现在的空军司令，在那时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为他基本上读完了小学。正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打败了蒋介石的黄埔之花。"

很少一些革命者是小知识分子。他列举了自己、周恩来、林彪、朱德和康生。"我们受到过一些中等教育，今天我被看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开玩笑地说道，"但是，我当时肯定没被列为知识分子，至多有人称我为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党内只占1%到2%，至多3%，但他们却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实际上没有大学生，"毛接着说，"他们大量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只是在1937年后我们的抗日战争中。"

当谈到起义组织之后，开进山区的时候，毛接着说，他们仍然不得不学习打仗。"只有在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明白了战争的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但毛却轻轻地眨了一下眼睛，继续说道："你们以为我开玩笑？一点也不！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正是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忽视他们的干部。"

"他们给部队安排任务，就好像部队可以行军一周而不吃饭一

样。他们划定路线，就好像我们不用走而可以飞一样。如果你与他们争论，他们至多会承认三大原则的一半，即我们的子弹可以杀死国民党士兵。但是如果你说敌人的子弹也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缺乏革命精神。”

“这都很好，但结果是我们失掉了江西的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结束时，我们走了25000里（8000多英里）。”“途中，我们在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停了下来，召开了我们的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我们没有改变中央委员会，但改变了路线。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委员们已经看到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的巨大损失，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并且因为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我们到达延安以后，”他总结说，“我们花了3年半的时间整风来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它需要时间。”

我们问毛，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整风运动的办法？因为在运动中有党内斗争，错误被尖锐地揭露和克服，但几乎无人被运动抛弃。

毛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丢弃错误路线，采取正确的路线，这不能以力压服。唯一的办法是劝说人们，我们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与敌人斗争。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摆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讲清道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他解释说，是出版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集。这就提出了双方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从来未被说服的同志，在看过并比较过双方的看法之后，被说服了。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忘掉了他们几年前说过的东西，通过出示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王明，从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那没有关系，我们不开除他，他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

这一整风运动，不仅改变了党的路线，而且也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口号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的观点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毛说，“不相信我们坚持这一口号，但当他们看到1956年的党代会上所有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被重新选举进入中央委员会时，他们相信我们做了所说的一切。”

谈到当前（1964年）的事情，毛说：“不要认为今天中国没有人反对我们。有许多当初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现在接受了。但有一些人至今还不接受。有些人口头上接受但内心不接受。当然，他们是少数，也有一些人，内心向往社会主义，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或不科学的。”

“从现在起，这种状况还会存在10年以上。你们以为当我们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时，经济体制将会永远不变？我不相信。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对我们今天来说不是实际的问题。但我不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人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区别，先进的成分总是会发现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分为二。”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评论说，没有斗争，生活将会变得很单调。毛笑道：“是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发现没有事情可做，”他说，“那时我们会失业吗？共产主义只是堆积木吗？人就没有工作可干吗？”

然后，话题转到了世界形势和革命者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问题。

毛开始了话题，“有人认为美国把苏联当作它的主要军事目标，有人则认为是中国。你们怎么看？”他好像是在对我说。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迹象证明华盛顿要发动一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倒是有可能发动局部的战争来占领较小的、不发达的国家来接收那里的财富，和利用他们作为将来更大战争的基地。在选举年——1964年，华盛顿无人想动用美国军队。在场

的另一位美国人说，美国已发现他们难以对付小的战争，如越南，现在正被迫防御。因此，美国更有可能企图在东欧通过颠覆而不是战争来谋取地盘。而有些国家则是易受这种颠覆的。第三位美国人则引述了西方报刊的共同主题，即美国把苏联视为眼前的敌手，而把中国看成是将来的敌人。

毛回答说，所有这些看法都很有意思。但是对他来说，另外一些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苏联，华盛顿看到了另外一支核力量。"而对中国来说，他们看不起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他们的轻视对我们并没有害处，实际上，还有好处。帝国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把眼前的敌人看得比将来的变化的预测更为严重。"

关于东欧和苏联，毛指出，"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候，苏联和东欧的人民不可能不一起加以反对。我不是为修正主义领导人说话，而是为那些国家的人民。"

毛接着说，有时，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勇敢对抗美帝国主义，"不久前，他逮捕了美国间谍教授巴霍恩，这不是对抗吗？当然，几天之后就放走了他，但那就是你们从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指望的一种对抗。在美国和赫鲁晓夫之间，还没有完全成交，"毛断定说，"那是因为他不能答应美国向东欧要求的一切。"

在讨论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主席做了一系列论述。我要按照他所提到的事件发生的顺序，将他的论述记述如下。

毛说，在苏共"二十大"时，中共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他说，此后事情的发展是复杂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公开场合给赫鲁晓夫以支持。如果不支持苏共领导人，那么支持谁？但中国也表示了在党内讨论中众所周知的异议。

与赫鲁晓夫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斗争"是在1958年。在此之前的几次谈判中，已经有过几次斗争。但这次赫鲁晓夫来北京是

要施加压力，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当毛拒绝时，赫鲁晓夫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当毛讽刺地告诉他，他“最好把中国的全部海岸都占去”时，赫鲁晓夫问毛：那你会怎么办？毛说，他将再到山里去，进行游击战争。赫鲁晓夫迅即地反驳说：“游击战争在现代世界是没有用的。”对此，毛回答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堵住中国的鼻孔，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又来到北京。他告诉毛，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毛问他有何见教，赫鲁晓夫回答，“在某些方面，对待台湾应当像列宁对待远东共和国那样。”毛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的，而且当时就控制在苏联共产党手中。他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台湾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应释放一些在朝鲜战争后跳伞进入中国东北的美国间谍。毛说：“那很困难，你知道，我们国家有法律。”赫鲁晓夫脸红了，但他坚持说，人必须释放，因为他已经答应过艾森豪威尔要释放他们。而艾森豪威尔说过，他担心赫鲁晓夫向中国提此要求是白费时间，所以，如果赫鲁晓夫被拒绝，人家会怎样看待此事？

这样，赫鲁晓夫就没能完成艾森豪威尔的使命。同时，他也没能完成尼赫鲁的使命。他竭力想靠说“那是一块不毛之地”来完成尼赫鲁对中国领土的扩张。赫鲁晓夫解释说，如果毛把这块领土让给印度，他“可能争取尼赫鲁去打击帝国主义”。毛回答说，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印度武装力量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以前他自己还不清楚这些行动的程度，连西藏驻军司令张经武也不太清楚，直到西藏的牧民们连续不断地报告了印度军队动向，他们才派出侦察兵前去调查。侦察战士发现形势十分严重。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向印度正式提出抗议，并采取自卫行动。

谈话转到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的一般问题。毛说，从他们对小国的态度来看，修正主义者（苏联）与帝国主义者（美

国）差不多。他把当前的国际斗争与以前的中国国内斗争作了比较。起初，革命力量是处于防御；后来，就转向了反攻。“与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他说，是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对中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攻击。

“自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毛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我们抛弃了天条！切记对天条不要太认真。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谈话又转到了毛在已被称为“大论战”的与苏联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

毛笑着说：“我在这次斗争中做得很少，只写了几首诗，我自己没有什么其他的个人武器。”

“在我们回击他们之后，他们就要求停止争论。可我们还没有答复呢！此外，赫鲁晓夫能否停止争论，也很值得怀疑，因为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而且，这已不是我们两党能够决定的问题。他们坚持把其他的所有共产党拉进来。所以，现在的办法，是达成一个得到全世界共产党支持的协议”。

毛告诉我们，去年（1963年）3月，他曾接受过一个苏联同志的访问，他带来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说：“主席同志，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有时对中国党的批评太严厉了，有时我们走得太远了。”毛回答说：“不，我不能同意。想一想，托洛茨基分子、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想让世界的一半在战争中毁灭的大国沙文主义者，以及种族主义者，难道不应受到人民的批评吗？如果我们犯了这些错误，那么，你们一定应该批评我们。”

苏联同志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如果继续争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会陷于混乱。”毛回答：“不用担心，同志，笔墨之战不会伤害人体。”他说出了一行诗一样的语言：“不管你们怎样批评我们，至少有4条我可以保证：天不会塌下，中国的母亲不会停止生养孩子，树和草不会停止生长，鱼在河里不会停止游动。”

有人提出了所谓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中立区”的问题。

“中国没有提出这个区，”毛指出，“事实上，它是存在的。戴高乐想领导这个中立区。第一个中立区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同盟军。第二个区包括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大洋（洲）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它们的统治集团剥削人民，但就连统治集团自身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剥削、恐吓、控制和干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反对美帝国主义。”

“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接着说，“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总的说来，世界形势大好。”毛充满信心地归纳说，“拿越南来说，它虽然很小，但美国没有任何办法促使其人民屈服。今年，1964年，刚过去短短的10几天时间，但我们就已经听到了来自巴拿马和桑给巴尔的两声春雷。虽然还没到春天，但它却表明大的风暴就要到来。”

毛接着说，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太注意巴拿马的一些小的示威，“他们告诉我们，那是少数人示威并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不是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一次体制的变革。所以，中国为什么有2000万人（相当于巴拿马人口的20倍）示威表示对巴拿马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发表团结声明？”

“我不同意这些朋友的看法，”毛说，“我们看到，巴拿马群众直接起来反对美国军队。我们认为这有着极大的意义。任何地方发生此类行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将给予可能的支持。”

讨论正在进行，江青——毛的妻子走进来了，邀请我们到毗邻的一个房间去就餐。进餐期间的谈话，就主要转到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上来。中国已发表了9篇政治评论中的“六评”，投入了日后被称为“大论战”的辩论斗争。讨论也继续了美帝国

主义和战争威胁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毛说，“现代修正主义把我们称为种族主义者，这并不真实。如果我们是种族主义者，那么中国人就应该与也是中国人的蒋介石联合。你们美国人应该与你们的约翰逊联合。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正与你们美国人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威胁。”

最后，因为中国人好客，主席将我们送了出来。在寒冷的1月份的夜晚，他既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我们中的一位提醒服务员，他应该把主席的帽子拿出来。服务员回答：“他不戴，他从来不戴，甚至在最冷的天气。”

他直直地站在那里，目送我们的汽车离去。看上去，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康。

三

我与毛泽东的第3次谈话，是在我的80岁生日——1965年11月24日。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会为我举行什么形式的庆贺，甚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此，在11月下旬，我生日的前两天，当我被告知毛主席想在我的生日见我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毛不在北京，而是像他多数时间所做的那样，在外地旅行。所以，11月23日，我和30多位美国的和中国的朋友，被安排乘坐一架专机，向南朝着一个在到达前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的目的地飞去。当晚上我们被全部安排进一个很好的饭店，并确切地知道是在上海之后，我就担心，主席是否愿意接待这样多的如此快速和偶然地集合起来的客人，如果他不愿意，我又怎样同他们和平相处。后来证明，我没有必要担心，他愿意。

次日中午，我们齐集在邻近一座建筑的大厅里，坐成一个大的椭圆形，与毛泽东进行正式的谈话。下午两点，谈话突然变成了午餐会。在第二天的中国报纸上，我们成了有标题、照片、名

字的头号新闻，好像我们与毛的谈话成了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我有点迷惑，我考虑了一个星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被这样特别地登载。

我注意到了，在11月的同一周中，美国的战争贩子麦克纳马拉作了他的第7次西贡之行，以策划越南战争的更大升级。同时，美国和平力量也正在向华盛顿进行着一个被称为“华盛顿所知悉的最大的和平示威”的和平进军。那一周，中国的报纸4次在头版报道了美国的示威。

因此，我想到，毛在我的生日邀我吃饭可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而这样多美国朋友的参与和公开报道，却正是他们向7亿人民及其他任何听众发表下述谈话的一种办法：“现在，当华盛顿的战争贩子进行战争升级、并对我们进行原子弹威胁的时候，请注意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美国人民民间的不同。对美国人民，我们是必须与之为友的”。

主席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招待我们正是在11月24日的中午，靠近我们旅馆的一座建筑的外面大厅。对于主人来说，这样招待是中国人的礼貌。然后，他打开了另外一个门，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大的接待室，在一个大的地毯上，可以容纳30多人的舒适座位围成了一个大的椭圆形。他穿过空地把我带到几个盖着白布的扶手椅边，标出了椭圆的首席，我坐在了首席之一。在客人们被一一介绍给他，坐下之前，我一直站在门边。我身边的座位空着，他的翻译就站在我们座位后。

毛在被安排座位坐下之前，他就开始了讲话。他看了大家一眼说，他已认识了在座的一些美国人，并把他认识的人一一指了出来，但大多数在座的客人是新的。然后，他点了一支烟，开玩笑地说道，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他弄笑着看了我一眼——则是反对派，不吸烟的一派。

正像经常被毛的谈话所引起的那样，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马海德医生救了我，他直接向毛发出了挑战：“你把这一问题看成是

派别问题吗？”

“当然”，毛反击道，“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抽烟，我说应该。”由于受到了鼓动，其他几个人也点上了香烟。

毛与大家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这一谈话，第二天的新闻准确但不恰当地描述为：“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与外国朋友的一次谈话。”我记下了这些字眼。他们说得如此单调，恰与事实相反。因为谈话充满了幽默、巧妙的应答和反驳，以及经常不断的惊奇。

毛采取了主动，但并不是攻击性的，他的控制似乎少于任何人。他靠着椅背，悠闲的抽着烟，开始一个个地引起人们的谈话。有时通过赞美对方国家的形式不仅北美人在场，而且五大洲的人都有；更经常的则是通过见缝插针地提出问题，或者玩笑地发表刺激人的但又十分幽默的评谈方式，如他对我作为不抽烟者的挑战和对马医生的挑战。他的巧妙应答是反应很快的，他的脑子显然是所有人当中最有生气的，他谈起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十分轻松，但有时又马上严肃起来。

当我提出“我们最好多听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时，他用以下的话来逃避：“我想先听听他人的意见．民主嘛！”他接着笑道：“请谈谈你们的看法和问题。”对每一个依次讲话的人，他成了关切和积极的听众，注意着他们谈话中疏忽的一些细节及未被注意的一些词句。他几乎无时不指出要点或归纳为信条。他乐于突然发表评论并传达给他人。

只有一次，他好像准备应我的要求，谈谈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他转向我说：“自去年（1964年初）我们小范围的会见以来，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在座的同志们已对此谈过好多看法，我完全同意。”他重复和加强了其他人谈过的一些看法。

突然，他对马医生讲话，打断了他自己的谈话。“你们卫生部的人一点也不管人民的健康，看看，现在多晚了，还没有吃饭！我的妻子已邀请我们去进餐了。”确实，毛的妻子江青正站在那里让

我们到房间里去洗漱，然后两点钟马上去另一座建筑物就餐。我很久以前在延安见过江青。她现在身穿宽松的裤子和夹克，是一位身材纤细的引人注目的女性。

在将近两小时的谈话和其后的进餐过程中，毛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其基础则是对于过去、现在及将来、从生物出海尚未进化成人时，直到人和地球像我们所知的那样终结之时的人类的潮流和其历史的深知。他很久以前说过："人类还只是处于它的幼年时期。"这是他了解自己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将要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角色在自己的短暂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分析、去行动的现实。

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不管暴风雨在任何时候，多么黑暗。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他沉浸于一个基本的哲学，即他愿意与别人分享最后将得到证明的信心，而不强加于任何人。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行

〔法〕K·S·卡罗尔

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就位于湖南省。韶山是一块面积相当大的地方，到处是沟渠和水塘，六百户人家散落在一个个丘陵上。村子主要街道上新落成的旅馆已经显得太小，无法接待所有前来瞻仰毛泽东1893年诞生地的客人了。另外，按照参观者的要求，还在村子的正中间建了一座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实物和照片，宣传这位伟大的韶山人的生平事迹。

村中有90%的人都姓毛，其它姓氏的人都是娶了毛姓姑娘从外地移居而来的。别人告诉我，韶山从前住的全都是姓毛的人家，大家全都沾亲带故，所以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宗族。祖宗祠堂是一座有两个塔楼的白色大屋子，属于毛氏宗族共有，直至今天，步入其中，仍有身临教堂之感。顺着一座不大的楼梯往上稍走几步，你看到的不是祭祀的供桌，而是会议室，里面摆着一张大桌子和几条粗糙的长凳。这个村子所在的人民公社的代表常来这里开会，讨论生产和政治。从前，各家的家长就围坐在这张桌子前，一边吃着丰盛的筵席，一边讨论收成问题、互助问题等等事项。族中的“长者”告诉他们，要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必须对保佑村庄的天神供以什么样的牺牲。在诸如此类的会议上，祭祖、解决实际问

题等事的安排都是随季节的需要而变化的。

然而，竞争的需要，似乎在上个世纪里打破了这种由共同祠堂为象征的宗族团结。人们会告诉你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靠贩卖谷物发了财，极不愿意帮助邻居，他的儿子当时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思想，为此常和父亲闹别扭。人们会对你讲述这样的故事：一天下暴雨，父亲要他到自己地里干活，但毛泽东不顾父亲的威胁，跑去帮助一位贫苦农民收庄稼。

毛家有地二十一亩（约合一公顷半），有房四间，内院一座，而且陈设舒服，看来五口之家生活得很富裕。毛泽东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他先被送进村里的私塾读书，后又进了长沙的师范学校，这种阔绰劲儿说明，毛的父亲除了土地收入以外，肯定还有其它收入。人们还告诉我，他希望儿子好好念书，将来管好家里的产业。

在韶山参观时，我们曾经走进一户人家，房子大致和毛泽东家的相仿，里面住着十四口人，其中一个是妇女队长。从前，村里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比这还要差得多，象毛泽东父亲那样“有偿还能力”的农民是极个别的。他们所处的优越地位，使他们能够对最贫苦的农民进行剥削。这部分农民时时刻刻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抵押青苗，以解燃眉之急。一个无法偿还的不幸农民往往要吃官司，土地被没收，全家沦为乞丐，因为政权和司法权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甚至还能招兵买马，建立地方“治安队”，几乎完全归自己调遣。

正是为了反抗这种专制统治，贫苦农民受广州来的宣传家的鼓动，才组织了 1926 年那些著名的农民协会。韶山人民公社现任社长毛屯芽（音译）先生当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但他对那个年代保留着清晰的记忆。毛先生细高个儿，一身整齐的工装，风度不像农民，倒更像工人，讲话充满自信。我们的会见是在祠堂里进行的。这里光线相当暗，即使在大白天也是如此。他告诉我，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主席 1927 年 1 月份召开了一个伟大的具有

纪念意义的会议。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这次会议是我们村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毛主席花了三天时间听取农会负责人的意见，并一一询问了农会会员。他为写作调查报告收集材料，只记笔记不说话。后来，当他要向我们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时，便召集我们到祠堂去，并且要我们把妇女也请去开会。以前，只有男人才进祠堂，在里面大吃大喝、讨论问题，妇女根本不敢进去。所以，应毛主席的邀请来开会的妇女不多。敢来的也是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或躲在昏暗的角落里。但是毛主席马上请她们上前面来，要大家把第一排座位让给妇女坐。他讲话一开始，先说我们都是旧风俗习惯的受害者，不管是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大家一律平等。他提到自己的母亲。这个人我们这里年纪大点的都清楚地了解，她比许多男人还富有正义感。他还说，贫农之所以首先起来组织农会、参加农会，这不是件偶然的事，因为贫农最关心改变现状。尽管他们比某些富人文化水平低，但却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需要及目前斗争的意义。他又说，再别听那班所谓‘长者’的话了，因为你们比他们更有智慧。他讲完话，所有的富人都吓得发抖。我第二天就参加了农民运动青年团。我们虽然没有武器，但富人害怕我们，再也不敢向我们讨债了，也不敢碰我们任何人一根汗毛。有的甚至逃离了村子。”

“可毛泽东主席的威信是怎么来的？他不是十五年前就离开了韶山，以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吗？”我问道。这使毛屯芽先生十分惊异。

“威信？我们这儿人人认识他，知道他很了解我们的疾苦。再说，他 1925 年还回过村子，组建了一个党支部，以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另外和他在一块儿只要呆三五分钟，你就发现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表面上他跟我们一模一样，讲话也是一模一样，但无论谁都能立即感觉出来，他知道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一回村子，大家都跑去跟他讨主意，甚至有些富人也找他，可是他

只跟穷人说话。”

毛屯芽先生回忆的其他部分似乎受到当今政治教育的影响，超出了村史和本人亲自经历的范围。譬如，他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它只顾和国民党搞联合、遏制农民运动的发展、阻挠没收地主土地。国民党彻底背叛后，革命农民被迫武装自卫，以免和城市革命者遭到一样的命运。1927年秋天，湖南省爆发了一次武装起义，但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了。毛泽东当时忙于领导较大革命中心的斗争，没有回村子，但这里的镇压仍然是异常残酷的。毛屯芽先生和他的副手列举了许多姓毛的人的名字，他们当时有的被枪毙，有的被迫逃离韶山。最后，他以乐观的语调结束了谈话：“尽管当时富人得势了，但他们在村子里老是提心吊胆。事情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大家再也不相信族长了，再也不肯逆来顺受了。人们只不过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罢了。毛主席家的土地被没收了，但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买这块土地呀！最后只好租给一家穷人耕种。这家伙一见飞机就发抖，以为是毛主席回来了。……”

湖南秋收起义的失败，使毛泽东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甚至被暂时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几年之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夺取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对农村革命潜力的坚定信念在毛泽东从事政治活动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信念也许来自他对农民世界的深切理解，而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却缺乏这种理解。然而，何以见得年轻的共产党在1926年就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从而赢得农民呢？我听到的有关农会的一切事迹都证实了这场运动的自发性质，但同时又说明它的初级和原始。这场运动是很难控制的，可否把革命的大厦建立在这一规模宏大然而难以捉摸的基础之上呢？即便抛开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根本历史作用的信念不谈，人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疑问：党到底拥有多少干部才能把这些农民协会变成“乡村苏维埃”呢？又将怎样对之实行领导并加以

维护呢？乡村第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似乎证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不是妨碍共产党赢得农民支持的唯一原因。

对于这些看法，当今中国的史学家往往引用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做答案。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确实论述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割据的局面为什么有利于在广大的乡村建立红色根据地。但是，他的这些论点是在今天所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以后才提出来的，而不是在1926—1927年的危机时刻提出来的。国民党背叛后，武装斗争已是势在必行。蒋介石发誓要在城里和乡下把共产党人全部消灭，武装斗争是逼上梁山的事了。共产党人被迫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反击，自然，这在混乱的乡下要比中心城市容易一些。在上述两个小册中，毛泽东确实明白地论述了这一点，但这是事后的议论。

奇怪的是，中国没有人说得清到底是党的什么机构最后决定提出武装斗争的口号。他们告诉我们，1927年8月1日，分别担任北伐军第九军和第二十军军长的叶挺和贺龙，率领他们的红色部队，举行反蒋起义，占领了江西省会南昌。从此，这一天就成为中国红军的建军节，为了永远记住这一天，中国士兵的徽章上也带着“八·一”二字。但是，这场反对国民党的战斗仅仅是叶挺和贺龙两人发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一场自发的运动还是如今天所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运动？或者这是共产国际指示采取的行动？

曾经以毕生大部分精力为中国的事业辩护、死后和其它革命英雄同葬于北京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此曾经采访过后来担任共产党军队总司令的朱德。根据他的叙述，1927年7月28日，在江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曾经召开过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人称“铁人”的周恩来，他虎口脱险，从上海赶来；有总工会主席苏兆征；有刚刚辞去农民部长职务的谭平山；有几乎在四川被枪毙的现任元帅

刘伯承；当然也有叶挺和贺龙两位将军和其他人。毛泽东、李立三、张国焘也出席了会议，但朱德当时不认识他们，对他们根本没在意。会上议定，由他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几天之后，他指挥军队打下了南昌。

人们本以为 1927 年 8 月 1 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之前召开的如此重要的会议会在中国所有的教科书上予以记载，在中国的所有纪念馆里予以展示，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史涅特莱的书也没有译成中文。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对此避而不谈？

总之，陈独秀在 1927 年 8 月 7 日被解职后，党的最高权力移交给了另一个知识分子——瞿秋白，而不是移交给江西那次会议的某个参加者。对于这位第二任中共总书记，大家现在很少谈及。但是，在一个不认为是党史圣地的地方，我认为却发现了他的踪迹。

毛泽东的印象

〔法〕根瑟·斯坦因

【根瑟·斯坦因，美国著名记者。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红星照耀中国》的广泛传播，加之斯诺本人的介绍，一些外国记者相继来到抗日根据地，斯坦因就是其中的一个。斯坦因曾经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写了专题报道、通讯，如：新华日报1945年9月25日登载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白山》1946年第6期登载的《毛泽东会见记》等，都详实、生动地记叙了会见后的感受。

下面这段文字摘编自《毛泽东印象记》一书。】

毛泽东给予我充分的提问题问他的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第一次会面从下午三点到次日三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像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动摇的小桌上，像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Liberation Daily)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

东不时地在窑内外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前面一会，他眼睛几分钟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之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枝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花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 ……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地区（即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词，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据说，毛有这样的习惯：他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要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

“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

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

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然后，毛泽东又和我谈到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他在讲课中谈到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在内战中发展了的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毛对我再一次详细说明在江西省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战略原则的内容。可是，当时那些正统派的党领导人不接受这些原则，他们已被西欧的军事理论俘虏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指在敌人比我方强大时，暂且退避，待条件有利时才进行反击。毛泽东在给我说明时，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兵法和古典小说的事例。比如，春秋战国时代以弱胜强的范例以及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中国人人皆知的曹操远征的故事。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12点多了。他让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译了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所有的斗争终须解决

〔美〕埃德加·斯诺

【新中国成立以后，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问过中国，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时（1965年1月），他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举行的宴会。用斯诺的话来说，他“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同他谈话供发表的第一个外国人”。

下面这段文字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摘自斯诺的《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1965年1月9日）一文。】

1965年1月9日晚上，我应邀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席间我们一同交谈约4个小时。我是唯一的外国人。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笔记。我事先晓得，谈话是不可以发表的。当晚，我一回到住处，就凭记忆所及把他说的都记下来。第二天，我惊喜地获得通知，说我可以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大部分的对话。

我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正如毛本人所说，“山南海北”。它是“海阔天空”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不消说，毛会见无数的人，但是他并不常常邀请非共产党的西方人同他共饭。我认为，我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同他谈话供发表的第一个外国人。毛72岁了，他在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大厅里迎接我。

毛主席本来可以怀着可以理解的自豪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他却不作什么夸耀。我看出他心情冷静地考虑着死亡的问题，似乎准备把他自己的政治遗产留给后人评价。这位老战士留有另外一生或两生的活力，并有时间来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保证他的教导对青年有着持久的影响，这直到第二年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毛跟我谈话，是在他同许多奉召到首都来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省领导人日夜开会，几个星期的紧张刚刚结束后。如果他是一个病人，谈话就早该赶快停止了。我们交谈时，他自始至终显得十分舒畅。主席的一位医生后来告诉我，毛没有什么器官疾病，除了因年龄的关系而产生正常的疲劳以外，他了无痛苦。

我们开始谈话时，一位摄影师出现，拍摄了短少的电影胶片，毛说这是应我的要求而这样做的。我曾经坚决要求准许拍摄一部完全的电视访问纪录片，却不抱很大的成功希望。这时我说，“多年前，我要求你给我讲述你的生活经历。最初你反对这样做，于是我说，让国外和中国的人晓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晓得什么推动着你工作，是有好处的。我想你将同意，发表你的传记是好事，不是坏事。现在，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厉害。那么，在电视屏上向全世界证明那些谣言是大大的夸大，难道不好吗？”毛苦笑着回答说，也许有几分可以怀疑。他不久就会要去见上帝了。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说你要探求上帝是否存在。你相信这个吗？”不，他不相信，但有些自称博识的人说有一个上帝存在。似乎有许多个上帝存在，同一个上帝常常能够偏袒各方。

进餐的时候，毛曾提到他的两个弟弟被杀，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时期被处死，而他们的儿子则在朝鲜战争中阵亡。这时，他说死避过了他，这是奇异的事情。他曾经多次准备死，但死似乎并不想要他。他该怎么办？有几次，他似乎会死了。他的卫兵被打死，当时他就是站在死者身旁。有一次，另一个士兵的血溅了他全身，但炸弹却没有触及他。

“那是在延安吗？”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卫兵曾在长征中被打死，还有其他九死一生的事件。根据辩证法，所有的斗争终须解决，包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争取生存的斗争。

“饶过了你的死亡事件，已使得中国历史上或许是最非凡出众的一生成为可能。在中国所有长长的年代记中，我可没法想得起出身农村微贱的人，不仅领导了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而且写了革命的历史，构想了革命的军事胜利的战略，有系统地阐述了一种思想学说，这种思想学说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思想，然后在一种新的文明中，以全世界的广泛含义实行他的哲学。”毛沉思了片刻以后，说我（指斯诺）是晓得他是作为一个小学教员开始生活的。那时候，他没有想到过打仗的事情。他也没有想到过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像我自己一样，或多或少是一个民主主义人物。后来（他不时奇怪于什么原因的偶然配合）他有志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事件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意志而发展的。重要的是中国过去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些就是事实……

“1937年听你演讲的青年，后来在实践中学会革命，但是，今天中国青年的替代者会怎么样？”自然，在中国，现年20岁以下的人后来没有打过仗，并且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帝国主义者或熟悉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社会没有直接的了解。父母能够讲给他们听，但是听讲历史和看书同生活于其中是两回事。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类是按照自己的环境创造历史的。你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了。许多人极想知道，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养育出来的年青一代将会怎么样。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他也没法晓得。他不相信谁能够肯定地晓得。有两种可能性。可能革命朝着共产主义继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性是青年会取消革命，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使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回到大陆来，并站在依然存在于这个国家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我询问了他的看法。自然，他并不希望反革命，但是将来的

事件会由后代人解决，并且按照我们没有预见的条件来解决。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后代人应当比我们更加有知识，正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见识会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见识占优势。今天的青年和继其后的青年，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准则评价革命工作。毛的声音低下去，眯着眼睛。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状况，正加速地发生变化。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我们每个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大概会显得有点可笑。

我起身告辞前，主席向美国人民表示问候，并简单地说，他祝愿他们进步。如果他祝愿他们解放，难道不是有些人肯定不同意吗？难道他们不会说他们已经有了选举权了吗？但是、对于没有获得真正解放和希望解放的人，他作最好的祝愿。

毛泽东陪我走出门口，并且不顾我的反对，送我去乘汽车，在那里，他独自站立片刻，在零度下的北京夜晚没有穿大衣，以这个古老文化城市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在大门口附近，我看不到安全卫兵。毛跟我握手，引用了一句中国格言叫我保重："天有不测风云！"

汽车驶离时，我回头望，看见毛缩着肩膀，慢慢地走回去，再次进入人民大会堂。

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

〔美〕埃德加·斯诺

【1970年12月，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毛对他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

会见时毛泽东主席与斯诺探讨了"个人崇拜"的问题。下面这段文字是斯诺对当时的会见的记叙。摘自《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1970年12月8日）。】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主席批评了对毛"个人崇拜"的专讲形式的做法，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必要采取这种讨嫌的做法，并预言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他说，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久将让能代表美国的最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开始进行谈话。他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还强调说，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1点左右。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

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我们议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曾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励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是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指斯诺）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我说：“我记得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城市或地方。”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

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

毛主席对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以前的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

第　四　编

专家、学者笔下的毛泽东

“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斯图尔特·R·施拉姆，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曾任该校东方和亚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当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近年来他多次访华，进行学术交流。

自六十年代以来，施拉姆教授相继发表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信、讲话译文汇编）、《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参加撰写）、《毛泽东：初步再评》等。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施拉姆的《毛泽东传》。】

最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8月7日的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八七紧急会议”，之所以称它为紧急会议，是因为按规定开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不足，但是，出席的人仍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缺席的陈独秀则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没有指出它来自莫斯科。党的新决策人是对俄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不久他就发展了极左倾向，并使党执行了一条现在官方的史书所说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但是，八七会议当时所确定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是相当温和的。再次使用了国民党（“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尚不组织苏维埃，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与国民党进行公开的斗争。

会议后不久，毛泽东被派至湖南任特派员，领导该地的起义并纠正湖南同志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他们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军事冒险主义”，即只信赖各种有组织武装部队（从由工人组成的民兵一直到土匪）的介入，而不相信农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不久，中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毛自己的军事冒险主义比要他去纠正的同志还要严重。除了这个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可称为“右”的错误外，毛还表现出其他可称为“左”的错误。其中主要的是他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他抵湖南后一周或十天，在 8 月 20 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 某同志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 1917 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 1905 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

毛认为共产国际已改变政策的印象，可能是由于他误解了斯大林 7 月底对其观点的修改。斯大林并未承认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成熟——这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反对派从 3 月份以来就一直提出应建立苏维埃——他说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宣传使群众对苏维埃的概念有所了解。这样在中国革命高潮再次到来时，就有了实际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了。但斯大林估计在六个月或一年内这种高潮是不会来的。同时，除了可以谈论苏维埃外，绝对不准组织苏维埃。

毛除了热诚维护他认为已作出修改的共产国际路线外，在其它两个基本问题上也参与了“左”的运动。他到湖南以后，在一封信中宣称，他终于明白了国民党不是号召群众的有效工具。他写道：“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

面旗子交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其次，毛坚决主张“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予以重新分配。

毛在5月20日的信中提出的意见，根本没给中央委员会留下什么印象。中央委员会严厉地命令他必须遵守党正式规定的路线，即不得组织苏维埃，应打国民党的旗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在他们谴责毛的“左”的错误的同时，瞿秋白及其同伴却执行着另一种“左”倾冒险主义。8月20日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明显是一条盲动路线，这条路线在1927年11月的全会上进一步发展了并获得通过。

这条路线具体表现在湖南、湖北的起义计划上，这是由中央委员会详细制定并在8月底传达给毛的。这些指示的中心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革命鼓动的工具。在起义前，要共产党人暗杀农村中罪大恶极的地主，以鼓舞农民的革命精神。在起义过程中，他们应全部消灭掉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城市中的所有官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平民政权”。暴动应开始在城市中举行，为夺取城市，可以使用土匪、各种军队的游勇散兵和工农民兵本身，但这些人只能作为辅助力量。城乡的起义，主要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自己的任务。

这种把革命当作连续不断的、自发的群众暴力活动的看法与毛当时开始形成的战略思想是有冲突的，他认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敌对环境下长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时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还只是何者才是夺取全国革命起义首次胜利的最好办法。很快，形势就使毛认为他领导的军事力量是代表革命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工具。

在秋收起义时，总共有四个团可供毛使用。从战斗力来说，由原武汉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团组成的第一团是主力。该团的军官基本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7月15日决裂后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

昌起义，但在途中听说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已经自南昌南下，他们即进入湖南。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第二团最可靠，因为它是由一千多名安源矿工和萍乡、醴陵的农民组成的。第三团是由萍乡、浏阳的农民和湖北的农民民兵组成。第四团则由原属5月份反叛武汉政府的夏斗寅将军的部队改组而成。

毛的计划是以第一、四团为右翼，自东北向长沙进军，第二团为左翼，自长沙东南的安源攻萍乡及醴陵，然后集中攻浏阳。第三团为中路，攻长沙以东稍偏北的东门市，在9月12日与第二团合取浏阳。然后，四个团向长沙集中，于9月15日开始攻打省会长沙。“数百名武装同志”和数千名工人将配合部队行动，里应外合占领该城。

中央委员会得知这计划后，在8月23日的信中（该信同时驳斥了毛关于苏维埃、土地改革和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说，将占领长沙作为起义的起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毛执行这计划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对于武装部队看得过重，对群众的革命力量却缺乏信心，因而，将起义变成了一次“纯粹的军事冒险”。中央委员会于是为他制定了在长沙东、南、西南方向三个地区群众起义的计划。

对此，毛在回信中相当严厉地说，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他还说，他把他领导的有组织的军事部队只看作是一种“辅助力量”，用以“补充工农力量的不足。”

无疑，毛比中央委员会更了解群众的“力量不足”。湖南在春、夏季的镇压中所受的损失比其他省都大。党内文件的统计透露，全国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共十三万人（显然，这数字不包括上海的数字），其中有一半是湖南的。在5月21日长沙屠杀前，全省有二万多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三千多名在长沙。现在，一共不到五千人，在省会的只有一千人。肯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尽管受到

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说他没有同时在湖南作好起义准备，他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沙地区。他的部队人数有限，他认为将部队分得太散是不慎重的。

9月9日，起义开始。通向长沙的主要铁路因组织怠工而被切断，在以后的一周内，没有火车通往长沙。10日，第二团按计划在安源起义，攻打萍乡。12日醴陵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恢复工会与农民协会。第二团由于受到优势敌军的攻击，不得不从醴陵撤退，但又于15日攻浏阳，结果大败，该团人员损失三分之二。在第一、四团合攻平江时，由国民党部队改编的第四团叛变，从后面攻击第一团，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一团（原警卫团）在损失了一百人后撤走。第三团按计划占领了东门市，进而攻打浏阳，但第二团未能抵约定地点，因此，第三团在无援军的情况下未能占领该城。

面对这一形势，毛在9月15日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因为无获胜的希望。他收集第一、三团的残部总共一千人，率领他们从省会走向农村。

这一形势是由一个“马同志”向中央委员会汇报的，他亲自到中央委员会斥责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一汇报，在9月19日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很难说毛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但他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改组了部队并在每支部队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然后率领部队进入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于10月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

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严厉斥责毛在长沙“背叛”的那一天（9月19日），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包括了毛在8月底争论中在所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即立即组织苏维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无例外地没收一切土地。这简直是一种奇妙的巧合。虽然很快就证明毛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仍然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他在中央委

员会和湖南省委里的职务被撤销了，因为他未能坚持土地革命的要求，并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

几个月后，毛才知道他受到了处分。他也不知道11月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即把“不停”或“不断”革命的思想作为总的理论原则——如果它的政策失败了，斯大林就可以因此将中国党的领导人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对这一原则的实施办法就是不断地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最后胜利。目前，这种起义只能在农村中举行，但其目的不是要像毛当时正在做的那样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要使群众经常处于革命激情之中。虽然只有以后在日常的经济斗争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时候才能举行城市起义，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起义最终将有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应对工人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以便将来能发挥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准军事组织应用于刺杀“黄色”工人领袖，抢劫银行，攻打警察局等等。

1927年12月初给湖南、湖北共产党员的一份指示中明确了毛应确切执行的战术。这些战术是：“封锁”各县（未解释如何做到这点），建立革命政府，尽可能多地处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大地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城市，除去上述恐怖与暗杀政策外，还要动员群众“打外国人”。

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

〔美〕迈克尔·H·哈特

【迈克尔·H·哈特，美国学者，《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的作者。在这部书中，作者按照自己的衡量标准，从世界范围内，从古到今挑选了100个他认为对世界历史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我国的孔子、秦始皇、毛泽东、成吉思汗等都被选入其中。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哈特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

毛泽东在中国领导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在此后的27年中，对这个大国进行了其历史上成效最显著、意义最深远的改造。

1893年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省韶山冲，那时他父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1911年，在毛还是一个18岁的学生的时候，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对清王朝的革命。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政府，中国实行了共和制。不幸的是革命的领袖们未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府。这场革命使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49年。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思想上的激进派。到1920

年他就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12位创始人之一。但是他上升到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35年才成为党的领袖。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走过了漫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党在1927年和1934年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却幸存下来了。1935年以后，在毛的领导下党的力量在稳定地增长。1947年，他展开了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面战争。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大陆。

中国在过去38年中，由于大部分时期里处于战争状态，人民饱经了苦难和忧患。现在才开始由党的领袖毛泽东来领导。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众多的人口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毛自己当时56岁，其生涯的主要时期似乎已经过去。

然而事实上毛最有影响的阶段才刚刚开始，到1976年他去世前，他的政策已经使中国产生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全面地实行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工业化有了迅速的发展，公共教育有了巨大的增长，公共卫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变化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在此期间其他几个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仅凭这些变化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毛在本册中名列前排。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第二项成就是使国家经济体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此外，毛通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宣传，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社会革命中也取得了胜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的忠于家庭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忠实于整个国家的观念。这种转变尤为显著，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有着特别强的忠于家庭的观念。中国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孔子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当然，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毛泽东一个决定的。他从

来都没有像斯大林在苏联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毛在中国政府内显然是最最重要的人物。

有一项运动他似乎要负主要责任，这就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这种运动是可以在农村公社开展的，它强调小规模和重体力劳动方式，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运动是一个失败（不管怎样它终于被放弃了）。毛所支持的另一个反对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运动就是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动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以毛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以党内的当权派为另一方的内战。

人们会有趣地注意到：毛在65岁时号召开展“大跃进”，在70多岁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快到80岁时恢复与美国的友邦关系。

毛起初相信城市产业工人是共产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大约在1925年毛得出了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农民的结论，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因而他把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在与国民党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他的政权基础总是在农村。在他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年代里，也坚持了这种思想。例如，毛泽东对农业和乡村的发展通常给予较高的重视，而斯大林在俄国一般只强调工业的发展，但在毛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生产也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评价一个当代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儿不太容易，为了估计出毛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或许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也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

多!）但列宁是毛的先辈，对毛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

与毛的功绩最相当的是秦始皇，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秦始皇排在毛之前，因为前者对中国的影响已长达约 2200 多年。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所带来的变化可能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但我们还难以确定他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毛泽东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

〔英〕韩素音

【韩素音，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

下面这段文字摘编自她的《早晨的洪流》一书。】

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毛自己一向深知这一点。他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象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到了1935年，毛的生活和中国革命已经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毛已经和他的事业结成一体，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如果要把毛和革命分割开来，就会使历史失去原有的雄伟壮观；同时也会使这个人物无血无肉；剩下一个空架子。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斯诺早已注意到，不仅毛，其他革命家也都一样，谈起童年回忆时，讲的是“我”，但当满怀豪情谈革命时，讲的

是“我们”。在充满生活（全部生活）激情的共同事业中，一般的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琐事都变得黯然失色，模糊不清，从脑海中消失了。有一位全心全意的革命家曾经说过：“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了革命。”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道：“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毛善于感染别人，使别人的眼界也像他一样开阔。这是他作为领袖的超凡的魅力。

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不过，在1940年以后，他的头发看起来剪短多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增加体重。他长了一副大眼睛，炯炯逼人——这是他最大的特征——还有一副非常机智的知识分子的面容。毛的一生经历是整整一代人丰富多彩生活的横断面，对于了解中国各种事件的根源十分重要。

虽然毛非常耐心，他却会毫不留情地讥讽党内骄傲自大，用口号吓唬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小人物”，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那些“领导者”。对同一件事他可能会感到愤怒而骂人，但也还是耐心地作再三的解释。他从不容忍思想路线的错误倾向，但他也会和他的论敌长年累月一起共事，直到在论战中战胜他们为止。

毛的照片很多。有的照片上毛穿着带补钉的裤子，破旧肥大的上衣，口袋总是被书报塞得变了形。关于会见毛的回忆录也很多，有的记载会见的时间很长——有时是彻夜长谈。有的谈到毛对讲解孜孜不倦的热情，连细微末节也不放过。他常常参加晚会，凑个热闹，看戏时不时发出笑声，照相时他总是不愿站在正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说毛跳舞时如何按他自己的拍子跳——他不太善于跳舞，还说毛工作时，孩子们如何从他的窑洞里跑进跑出。毛具有孩子似的欢畅性格，但是顷刻之间，他又可以变得非常严肃。

埃德加·斯诺写道，毛的政治才能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能够领导共产党，但还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士兵和农民对他那么亲。毛讲

话时，有办法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就连没有文化的人听起来也不难懂。他从来不会使他的听众感到莫测高深；但他也从不会瞧不起听众而故意简单化。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到了1940年，毛胖了一些（伙食不那么差了），他的头发也留得短一些。但他还是兼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性，难能可贵地将政治上的多谋善断和土生土长的常识结合在一起。他有很丰富的成语和典故，能在灵感闪现时立即写出古体诗词。他仍然研究世界大事，分析政治形势，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他讲话时，往往隔不了几句就用一句俏皮话或警句。他的领导艺术在于以理服人。他读书极多，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战术。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打一拳，从侧翼包围对方的论点，逐个打垮对方的论证，直至把对手完全包围起来，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或者在逻辑上指出一个致命的破绽，对方就倒了。他的想像力十分生动。

毛的幽默感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要嘲讽起人来，却是入骨三分。由于他常愿意把反对他的人留在身边发挥作用，担任有益的工作（甚至冒着被这些人破坏的危险），这样，对一些深受旧传统影响、死爱面子、宁死也不受辱的人来说，日子当然不好过。可这就是毛性格上的农民因素在起作用。农村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一个村庄，就像一出戏需要各类人物扮演不同角色一样，也都具备一定类型的人物。对毛来说，一定要有“反面角色”，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可以使人们不会忘记“错误路线”。毛不怕别人讨厌他，甚至恨他。尽管他很敏感，容易激动，而且非常注重朋友情谊；可是只要他鄙视某个人的话，他就会从始至终在一切场合表现出来。

毛就没有缺点吗？从来不犯错误吗？他的优秀品质也带有消

极的一面。他因为自己对革命无限忠诚而绝对地铁面无私。他绝对地有信心可以用逻辑使人信服，然而事实上有时行不通。他也犯过错误。他自己就说在井冈山时他订的土地法太严厉了，后来不得不修改。又说他有时讲话考虑不够周到，虽则他从来不背后议论人。他还说他可能时常会轻信别人，把别人也看作像他自己一样是出于单纯的热情。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挑毛病，在他宏伟的规划上是挑不出什么错的。既然他那宏伟的规划几乎就是他自己，那么，可以挑错的余地也就不多了。

毛还是一位艺术家，或者在独特的意义上说，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革命的艺术家。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冲劲，一种艺术家的苛求，对己、对人毫不留情。正如一个雕刻家雕塑石头泥块那样，毛塑造了革命。他以一种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而这种达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造。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就看到了文艺对舆论的重大影响。因而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革命家十分重视文学和艺术。在由毛在延安所开展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文学和艺术也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照抄“洋八股”。文艺不为革命事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传播文化的人必须服务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策。

毛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一位导师。他在延安的领导作用正是体现在当导师上。他教育全党、全军、全民。导师这个词是他的身分最确切的说明。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共产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运用在小米加步枪的国土上。1971 年毛泽东对他的朋友美国作家斯诺说：“我历来是想当教员。我讨嫌那些‘伟大’的字眼，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他尽了最大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个人崇拜”。“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毛嘴边挂着他在开玩笑时惯有的一丝微笑，眼睛望着每个被领到他跟前的代表的前襟，这些代表个个都佩戴着毛的像章。毛对他们说道：“还我飞

机!”——意思是指制作这种表忠心的像章所花费的金属原料太多了。说不定当人们挥动着红色封面的语录时，毛正在思考着要让他们好好受教育的问题。他也许正在想：在这些像章下面，有多少颗心是真正怀有毛自己为之献出了一切的那种伟大的激情的。正是这种激情促使他成了今天的毛泽东。

毛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

〔美〕莫里斯·迈斯纳

【莫里斯·迈斯纳，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其著作主要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等。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前言中，他曾声明："本书将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迈斯纳的这部著作。】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对手，并起用忠诚于人民共和国的新的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毛泽东的神话。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由"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只有通过削弱伟大舵手的完美形象才能确立，要放弃或是修改毛泽东主义的政策和思想戒律，也只有通过证明其作者的错误才能做到。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重新作出评价也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实际考虑和复仇的渴望，对于“文化大革命”幸存的受害者来说，它还有一种告慰那些死难者的精神需要，除了给死难者“平反”外，还要引人注目地表明，党已从灾难中汲取了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这种时代的灾难将不会重演。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长期与之共事的前领导人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毛泽东毕竟是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尽管他在理论上、政治实践上和个性上都与这两位俄国领导人有很大的差别。像列宁一样，毛泽东被公认为是革命的领袖和新社会的创始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在 1/4 多的世纪里是革命胜利后的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像 1956 年尼古拉·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那样简单地把毛泽东指控为暴君和篡权者，不但会使人们对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产生怀疑，而且也会使人们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产生疑问。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谴责斯大林时尚可以乞灵于列宁的权威，而对毛泽东的继承人来说，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则没有一个中国的列宁可以求助。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1980 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这样，毛泽东的问题就不仅涉及到政治合法性等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主

义革命的领袖，也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他创建了新中国，使长期受欺负受污辱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此外，即使在他去世以后，毛泽东毕生作为革命家和民族领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长久的巨大威望，尤其是在农民的心目中，千百万农民依然把神话了的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尤其是在那些曾与毛泽东一起进行过革命斗争的老干部和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心目中，也还依然保留着对毛泽东的尊崇。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当代中国的政治事实。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的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在公开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的主要助手们也承认，他们在政治上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来进行这一工作的。

在党于1981年对毛泽东的历史的地位作出正式评价以前很久的时间里，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征性的事件及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毛泽东的声望就已在逐渐下降。尽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政策（明确地开创了后毛泽东主义时代），但全会在这样做时并没有发表对毛泽东或毛泽东时代的正式评价。实际上，三中全会的正式公报还煞有介事地求助于毛泽东著作的权威，并宣布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推迟到未来的“适当的时候”进行。但是，全会确实批准了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和给许多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进行平反的工作。在被平反的事件中，最具政治意义的莫过于推翻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结论了。毛泽东于1959年解除了这位深得人心的元帅的职务。这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时代最不公正的事件之一，近20年来，许多人都一直认为需要纠正这一错误。彭德怀于1974年去世，但是彭德怀案件却依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忌讳的疮疤之一。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1978年12月25日公开为彭德怀平

了反，邓小平代表官方致了悼词，赞扬已故的元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英雄，恢复了他在1959年前的时期里的历史地位。这种仪式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如果不暗示出毛泽东也并非一贯正确这一点，那么要给彭德怀以如此殊荣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不是含有对大跃进的批判，那么也不可能如此厚待已故的彭德怀，因为彭德怀正是由于激烈地反对大跃进才遭到清洗的。

在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一股含蓄地批评毛泽东的潮流，而在短暂的民主运动时出版的非正式刊物和大字报则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为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资派”的人的平反进程也迅速加快了，许多过去遭到清洗的干部和作家又恢复了他们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显赫地位，这在大都市中加强了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舆论和政治活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极左主义”的思想运动，极左思潮仍然是邓小平时代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思想政治异端。虽然这场思想运动表面上是直接反对早已死去的林彪和被关押起来的“四人帮”，但随着大批学者和理论家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根源解释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极左主义”罪行的批判便扩大到毛泽东统治的后20年时间。1979年10月1日，受人尊敬的叶剑英元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发表的讲话，为对极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整个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批判——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动力。在这篇事先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详细审议的讲话中，叶剑英把大跃进的灾难归因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极左”错误，他谴责“文化大革命”是由那些实行“极左路线”的人发动的一场长达10年的全国性的“灾难”，按照当时的官方习惯，叶剑英把罪责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但是显然其他人对这场“灾难”也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毛泽东。

在1979—1980年间出现的官方对毛泽东主义的批判中，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实际上，当在政治上有利时，官方的批判

还有选择地引用毛泽东的著作）。但是，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却越来越严厉。这一术语在当时的中国起了一种委婉作用。这与苏联在反斯大林时代一样。被强调用来克服“个人崇拜”的办法是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妨碍权力集中在邓小平手里。然而，在重新定义后的“毛泽东思想”中，又突出了集体领导的精神。在清除了其中过于激进的概念和思想后的毛泽东思想，如今被称为是党的集体智慧而非某个人的创造物。在新的党中央，毛泽东个人的光辉也稍微比过去暗淡了一些。新的党史终于承认了除毛泽东外的其他革命领袖在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中所作的贡献，而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载中，对其中的大多数人的贡献都只字不提。到了1980年中期，尽管有关毛泽东本人的问题尚有待于作出正式和公开的结论，但是毛泽东统治的最后20年间的大多数事情（除了60年代初失败的“刘少奇主义”时期外）都受到了官方的谴责，或至少是完全公开地受到了批判性的研究。

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美〕R·特里尔

【R·特里尔，美国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为了撰写《毛泽东传》一书，他进行了20多年的访问和研究，曾到过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拜会了那些曾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倾听他们对毛的评论。因为，正如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文版序中所说，“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一书。】

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力拔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他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牒，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刚果能产生一位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

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在封建主义的衰落时期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尝试。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他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的刺激才显得活生生。毛坚信过

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讨厌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教难以接受。在经济领域他不是内行。

毛、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热衷于理想的人无论如何难以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一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象一盘散沙——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 29 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数亿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年轻的毛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自 1949 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壮年的毛意之所欲已得到证实。当北京宣布一次核试验时，你只要看着中国年轻人脸上的那种激动之情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同老年的中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

什么是毛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就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然而，毛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具有了特色。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毛的政治意识中有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一是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一是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

我想，毛根本没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象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然而，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年老的毛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这是他的缺点。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标）。

毛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以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找不出毛这样的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极少费神去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

他 43 岁时会见过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

毛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热情局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以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认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于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这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圣哲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

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而终止了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十年后，他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中国精神的真谛。

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因岁月的不饶，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逝去，人民生活自此持续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后。

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的注意力从毛的世界观中转变过来，但这些现代人是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之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喜欢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收获总是主要的。

总之，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的履历极为复杂，尤其在国内，作为一位要人和政治家，他有严重缺点：心存较大偏见，做事总是前后不一贯。

由于他地位显要，毛不总是令人有安定感。在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极少。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

毛有自己奇怪的合作方式。如果必要，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今天与一名土匪，明天又与一位王子。第二天，这名土匪或王子因情况变化，又象手纸一样被扔掉。

他历经坎坷，因为他经常改变初衷。他常常对自己栽的树结出的果实惧怕畏缩且异常憎恶。他周期性地对官僚机构的作风大发雷霆，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国家，这倒有点象是说不准园丁粘一点泥巴一样。

遗憾的是，中国缺乏某些毛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指望中国出现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毛期待着公民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得多。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衰败的经济中复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它的发展落后于毛革命的第二位任务——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雪耻。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过，部分原因还在于毛不象他精通政治那样精通经济。

这个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真是充满矛盾。他谴责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然而，他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循规蹈矩，陷于他设置的泥淖之中。他自己常常沉溺于传统的浪潮之中，而他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

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边，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不密切，但与苏联保持事务性关系本来可以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较大改善。但是，毛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玷污——他因此宣布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可是，毛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的变化大得多，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紧密相关。

毛的一生很难用某种模式来进行概括。晚期的毛——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刚掌权的毛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自我溶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毛“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他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改变，毛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象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容忍自己权威的丧失，而这又是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毛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

年轻的毛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中国也许会更稳定一些。

毛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

然而，毛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曾几何时，1919年长沙那位少女的孙女或许会因为外遇而判好几年徒刑。

这并不是说毛已经失去了解脱中国人束缚的梦想，而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与六十年前相比，妇女解放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殊死斗争了。

年轻的毛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显然，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与重大政治斗争之间有简单的一致性。

毛毕竟是1893年出生的，他的启蒙教育受之于儒家的私塾，他的大半生是在农村中度过的。这是一种见不到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们那一代的精英们正吃力地试图把那些陷入惊人的落后之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是个维新者。然而，这位维新者不会，而且再也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了。

毛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象朝圣者，对这位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还是家长制般的社会！确实，由毛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脚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

他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

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

的诗篇!毛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在某种毛似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上，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是一穷二白。这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对后来者不再有任何意义。历史自然会揭开新的一页，年轻一代也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新的空白地。

二十世纪初，作为叛逆者的毛，其个人特殊是与一代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然而，毛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只能说明随着毛生命的终结这种不和谐就会消失吗？不，它还说明了为什么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有一次，毛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毛的革命实际上就继续不下去了。

1978 年，一位在上海参观者拿出相机要拍一张复旦大学校门口毛的白色石膏像，然而一群学生干部赶过来阻止道：“不要拍了，下星期我们要把它推倒。”

邓小平、中国现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曾评说过毛的错误与功绩，他主张三七开，私下以为这种评价还是恰当的。

现在，人们心平气和地承认，毛的过多荣耀是以贬损同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事为条件的。而毛对人们的评价很武断，他以“之”字形政策滥用中国大众的热情。他在七十年代过于依赖他的亲信，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

然而，我认为，中国必定会巧妙地处理毛的遗产。中国现在

还不需要他，并也是这样做的。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站起来放松舒展下“它的”肌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伦理上的评价，就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想。

在政治局，斗争将继续，但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它不象毛时代的斗争，它的意识形态成分将更少。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真理。只有毛才集权力（政）和学说（教）于一身，现在的政、教已逐步分离了。政治将有点更带预言性，更少戏剧性；将更加单调，并让那些曾受政治旋流损害的平民百姓减免精神折磨之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句冠冕堂皇的口号随着毛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旗帜将会愈飘愈高，直到无人认清那褪了色的深红色旗面上写了些什么为止。

然而，这面旗帜将投下长长的影子。毛的继承者们将分成不同的“毛派”，在围绕着中国问题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他们都将举起“毛”作为武器。

这面旗帜本身也是一个抽象物，它们将为明日毛的后嗣们所需要。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此后，任何一位想控制中国这一庞大的王国的人，都将要利用这一象征物。

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八十年代以来，在最高领袖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虎”、“猴”相争之梦似正成为过去。

未来似乎属于谙熟权力和欢歌进步的老虎，而猴子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对未曾领略的进步亦抱疑虑。

然而……孙猴王毛还能从他的陵墓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之原的基础吗？正如他象前人一样递次继承了塑造出他的古老中国文化一样，能把这种猴性传递给中国社会中某些接受者身上去吗？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

〔苏〕费德林

【费德林，汉学家，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曾经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16日下午6时，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也来到莫斯科与毛泽东一起同斯大林、维辛斯基进行了会谈。经几次讨论，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条约。

1988年10月2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的文章。作者就是费德林，当年费德林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担任译员。

下面这段文字就出于此。】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矿泉水、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不上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

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在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来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都饮得不多，大多数人不过是在假装喝。好象都只不过是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转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中倒出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右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就是这样商定的。关于条文的内容，两国代表团进行过具体会谈。苏联代表团由米高扬率领，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大家知道，条约是 1950 年 2 月 14 日由苏中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的。

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不久前莫斯科电视节目中放映的影片《冒险》中有一处很荒唐。事情是这样的，1950 年 2 月 15 日我们报纸刊登的图片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并排站着的。在拍照前几分钟，他们愉快地交谈，庆贺顺利签订条约，我曾为他们当翻译。

影片的解说员对这个镜头竟武断地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态和姿态本身说明：这里已经表明不满意，因为中国领袖是两手空空回国的。他没有能够从莫斯科得到核武器。

应当说，这纯粹是影片作者的异想天开。毛泽东在同斯大林会谈时并未提出核武器问题。这一点是在更晚的时候，不是1950年，而是1958年才提到的。

条约是两大国领袖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顶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受到苏联和中国兴高采烈地欢迎。东西方最遥远的地方也作出了巨大反响。

签订条约只是在我们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敌对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凶恶的勾结。当然，这种反应是预见到的。因此，它并不那么突然。相反，这是形势的自然发展。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他们多次冲锋，但是，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这个警句，我听起来很费解。于是，我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他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那根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8个大字。

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您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突然我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象触了电一样……对这个人的缺乏自制能力，我从饱经世故人的叙述中早有所闻。

"是这么回事"我用悔过似的声调说，"我在理解上有、困难……"

"您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他说，仿佛是在进行预审。至

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里有一个中国字……”我再次进行尝试。

“您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字的迷魂阵?”他还是不肯罢休。

“实际上问题仅仅在一个中国字上，”我赶紧说，“但它的意思直译……”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我这样做了。斯大林（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文字能手）沉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后，他问道：

“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如何?”他语气稍有缓和地问我。

“我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毛泽东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说道，连头也没回。但贝利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我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给予解释。他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宋代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接着说，“归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来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因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象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我感到断头台的铡刀从我的头上挪开了。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搞秘密活动的幽灵之一似乎无影无踪了。本来斯大林就觉得他周围有许多幽灵。他一直感到到处都是变节者、间谍、人民

的敌人。黎明前我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查一查中国成语详解词典，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岳飞的格言。一般来说，斯大林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冷静，注意听客人讲话。他从没有心不在焉，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谈话的内容上。他很注意表达的准确性、遣词造句、翻译时的用词。他十分讲究思想的表达、叙述方式和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外部表现。斯大林巧妙地戴着假面具，在面具后面隐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一部分笔记里，我没有涉及斯大林应负责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但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拥有某种近乎催眠术的、威严的阴险的威力。他的整个相貌和举止谈吐的风度好象在向周围的人说明，权力应当是神秘的，因为权力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捉摸不透的性质。由此而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有一种莫名其妙和秘密的性质，笼罩着很强烈的神秘色彩，我谈的是个人感受，也许并不总是客观的。

据我的感觉，谈话地点本身很象夜间恶魔势力逞威的场所。斯大林在这个房间里一出现，周围的所有人便似乎停止了呼吸，个个呆若木鸡，仅此一点就更以说明问题了。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种危险感，一种可怕的气氛。

我又想起一件事，是当时曾任《真理报》总编辑的一位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告诉我的。

“深夜我坐下来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他回忆说，“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当斯大林不在房间的时候，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有时便自然地

交谈起来，这些人被授予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思议的权利，我公正地和无成见地注视着这些高级花名册中的人物，从近处和远处仔细地观察过这些人。这些观察不止一年时间。总之，这些人在我眼里是人的矛盾的和不合逻辑的行为的典型。他们在讲话时往往拿着讲稿，宣读别人写的东西，而且还有点困难，常常不理会任何语法规则和标点符号，仅这一点就可说明问题了。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几乎什么书也没读过。没有读过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有时是根据一些流言蜚语和淫秽传闻来评论作家的。对于外国的作者没有丝毫了解。然而，无知并不能原谅他们对某种东西的不理解。局限性使他们本能地蔑视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把它当作敌人。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时，上级任命的几个杰出人物常常表现出丢人的无知，翻译出来简直使人感到害臊。他们似乎不知道，读书和读回忆录会使人得到多么大的好处。

这就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斯大林了解这种情况吗？他了解自己的亲信吗？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在他风华正茂时期。但是，他还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和指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要否认许多人都信任他是不真实的。信任他，是因为人们还不了解真实的斯大林。然而，现在，当许多情况已经清楚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他们人数不多）还继续生活在幻想之中。难道这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权力（不论是大权或者小权）如何落在了道德上无权享有这种权力的人手中？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品质被提拔上来的？谁把他们提拔上来的？为什么？当然，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十分了解。从以往年代的情况来看，就更加清楚了。紧紧围绕在领袖周围的那些人对他不会有什么威胁。这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差。

有一次，象通常一样，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举行会见，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

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他的话在我内心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恐怖。这种突然的问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把脸转向他，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的凶恶目光。

“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他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我。“请愿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然后微微一笑，开始向客人解释，他为什么把几种酒掺起来。

“您知道，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酒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对葡萄酒较为陌生的毛泽东问道。

中国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生产葡萄酒，并且是在山东半岛的青岛市，这里过去是德国的殖民地，是德国人开始这样做的。

“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沉思说。

……于是我又一次特别深刻地感到，翻译对某些大官来说只

是一种没有思维的机器。

我现在讲一段我亲自参加过的事。1950年2月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时，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决定让中国友人更进一步地熟悉一下首都的精神生活。认为应当从观看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开始。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这个芭蕾舞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了演出。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这也不奇怪)，毛泽东没有能到大剧院来，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来。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都要带来某些意想不到事情。会谈内容全部由主人来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过程中，曾经讨论过语言和思维的纲要。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陈述自己的意见，其中心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意识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

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也阐述了这样一种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在这里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说，“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当我走近他时，他象往常一样，看也不看我，说道：“把这道菜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当然，我对这番盛情表示了感谢，但心里总感到有些担忧。不能不叫人警觉的是：女服务员上菜时，同主人耳语了一阵，然后，她没有把菜放在餐桌上，而是放在斯大林旁边。“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没过一会儿他就问我。“斯大林同志，请愿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我顺口说道，“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嘛不说？”他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这个菜非常可口。火鸡肝加上辣椒和盐，地道的高加索风味。一切顺利。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件事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政府打来紧急电话，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在此期间就下榻在这里，一个军衔很高的特别警卫队的军官见了我，他神色不安地说道："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拒绝接受。"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我问这位上校。

"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我只好去找中国厨师，弄清他的理由。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活鱼。"厨师连珠炮似地讲着地道的北京方言。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了一口气。"那么，我们现在就去逮一条活鱼来……"他说。

光阴荏苒。1949年12月过去了，1950年1月过去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的日子2月的一天即将来临。

"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毛泽东在一次会晤时请求说。

"当然"毛泽东说，"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他的答复，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斯大林就是这样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2月14日，中国东道主和客人按指定时间聚集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虽然这里应当笼罩一种隆重气氛，可是许多人的脸上表现出忧虑，甚至是不安的表情：斯大林是否能践约出席呢？不少预言家夸夸其谈地说情况不妙，他们都显得颇为自信。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充满乐观情绪。事先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呢？象往常一样，根据是会场外的议论，大家都焦急地望着门口。

一位身穿便服的主管同志向我走来，并且用一种秘密地声调悄悄地说："您应当在前厅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请问，难道这是我的特权吗？象平时一样，您做这件事不是更好吗？"我对这位我已经非常熟悉的上校说。

"关于特权的事，我们最好暂且别议论它，让我们改日再谈，现在，我们是把您看作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不明白吗?!"我的交谈者以命令的口吻说。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前厅，指出我应当站的地方，并说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周围没有人，只有存衣处的服务员在衣架前坚守他的工作岗位。很快大门开了，斯大林象镜框里的全身照片一样出现在门口。他很快地扫了前厅一眼，发现我在场以后，就不慌不忙地冲着我走来，就象走向一个熟悉的标志。

快走到存衣处时，他开始解扣子脱大衣，存衣处殷勤的服务员象上了弹簧一样急忙向他走去并且奴颜婢膝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帮您……"

斯大林看了看他，客气地向他问好并带点讽刺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他一边说着，向我这边投来友好的目光。脱下大衣后，他向衣架走去，把大衣挂在那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在架子上，对着镜子照了照，理了理头发。

我领着斯大林步入宴会厅，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这简直是在狂欢的景象，不管是忧郁的悲观者，还是小心翼翼的乐观者，都显得欢天喜地。有一瞬间，斯大林停了下来，环

视了聚在那里的人们。他让我领他向站在“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走去，他们彼此问候，相互握手询问了健康和工作情况。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开始陆续向斯大林走来，表示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人们举杯祝酒，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词。所有发表祝词的人，而且不仅是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位并排站在一起的人物，这两位人物有时交谈几句，议论着各种问题，主要是斯大林发表议论。

最后，看来斯大林对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已极的听众感到厌倦了，好像是在用目光发出呼吁：是否到了停下来的时候了呢。但是，这是徒劳的。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主要的事情，斯大林发表讲话。斯大林触摸了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请注意，我要讲话。

他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举杯祝贺。

大家都友好地一饮而尽。重新又爆发出掌声，情绪激昂的欢呼声，出现一片狂欢的景象。

毛泽东像一个有恩赐感的祖父那样

〔美〕R·特里尔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的嗜好。尼克松曾捡起中国这张王牌，作为一根异国情调之棒来攻击五十年代的民主党。早在这之前，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举动，也是毛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总觉得缺少点接触什么的。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们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

与这以前所做过的许多次一样，毛的最后一次突击学英语并不很成功，不过他做这一准备却要比尼克松翻开备忘录，邀请过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共进晚餐要早得多。

1971 年夏，毛已经在温习他的英语教科书了。恰好在毛与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毛的朋友郭沫若告诉我："他（毛）现在喜欢读的两个新短语是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以及 anti—Mao（反毛）。"不用说，这两个短语是毛在反对林的过程中注意到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 1971 年以前的世人眼里，这两人一

起搞二重奏似乎显得古怪离奇。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十二次阻挠毛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进入紫禁城以来的二十二年中，直到前一年夏天，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此外还有几点：在美国总统访问毛的北京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尼克松在中国八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正是尼克松总统干了所有这一切。据他的办公厅主任H·R·霍尔德曼说：“数年来尼克松一直把共产党中国当作本国的头号敌人。”

然而，他却正在眉飞色舞地与美国最可怕的东方敌人并肩而坐。帕特·尼克松身着一件红礼服，这是她的纽约设计师专为红色中国而精心选择的。

毛像一个矜持、热心，有恩赐感的祖父那样，接待战争瘟神和他的妻子。他们品着中国茶。

举世为之动容落泪，实是情有可原。

每个人都曾怀疑过其他人。然而，一旦尼克松决定去见毛，他就感到有必要以一种豁达的态度来解释他此行的目的。飞机飞往上海时途经关岛，在关岛机场，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间，联想到关岛正是美国时代来临的发祥地。“我希望在坐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喊道，“通过这次中国之行，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全世界降临。”

这支从华盛顿飞到北京的特遣队，吃的是空运的西方饭菜，然而用的餐具却是筷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的诗词。

毛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胄。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的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

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然而，几星期前它还是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所在地的北面有一条街，是红卫兵命名的，叫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即地安门街。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权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确，这两人以同样的眼光看。

然而，毛，一个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权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因为他受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

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干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在某天晚上，跑去对基辛格说是毛坚持要这样做的。"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说，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八十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一百六十八人的随行记者团。

毛则呆在家里。在尼克松逗留北京期间，他从未离开紫禁城

一步。

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商谈过任何政策问题。周为中国方面操办这些事。毛的侄女王海蓉总在这些场合出现，每次过后都向毛汇报。

在这两人会见之后，毛甚至没与尼克松通过电话，在尼克松逗留中国八天中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在以后的几天中，毛也没有与尼克松交换过任何书面材料。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的起居室。这间屋放满了他的明版书。隔壁一间是他睡觉、读书和吃掺辣椒的湖南炒菜的地方。

当尼克松走进毛的堆满书的房间时，他似乎激动了，而且认为毛也一定很激动。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对支气管炎的影响抱怨道。同时，两人握住了手，按尼克松的说法，毛握着他的手足足一分钟。

握手时，毛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生动的开场白，不过，美国人的口气太被动了，对此连反应都做不出。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的意志力。“如果未遇见这个人，我会自在些，”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如果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的。”

毛提到基辛格在1971年的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反问尼克松。

关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一些美国和中国都应有所举动时，毛略带傲慢地说：“我这儿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经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弄、警告的微

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含有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

“不像与周在一起时那样，可以直接发现他横溢的才华，”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老练。”

如果说毛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兴奋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政策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产生这一效果了。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两个版面和七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中国电视台播放了十分钟的实况。这以后，大多数普遍的中国人在看到美国人路过时，都毫不犹豫地注视着他们，并对他们露出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而且，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而毛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调遣着。毛生平第一次对美国人取得的至关重大的胜利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毛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渐减弱。在 1970 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兴趣时，毛心中更做好了准备。

1971 年 3 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

府全面开禁，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说邀请美国人是不可能的。毛在北京听说了这封电报，表示不赞成。他派人打电话取消了这一决定。结果，美国人受到了邀请。

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周也直截了当地领悟了毛对美国问题的看法。

数月后，周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

毛与尼克松握手言和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问题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的观点来看，它却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还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之中，他需要毛的帮助以除掉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的书房时，毛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征

〔日〕中嶋岭雄

【中嶋岭雄，日本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政治评论家，曾著有《现代中国论》(1980年，青木书店出版)一书。书中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作出一些探讨。作者认为，毛泽东在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作者认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三个特征：一、政治实践促使毛泽东的思想的急剧转变；二、土地革命思想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支柱；三、英雄豪杰的权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于《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书，该文原为中嶋岭雄的《现代中国论》一书部分章节。】

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第一步，是从醉心于中国古代的英雄及传奇小说的主人公的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成长为赞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理想主义者开始的。青年时期，他曾与孙文等人的革命同盟会产生过一时的共鸣，后来又倾倒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胡适和陈独秀。接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同情无政府主义，尔后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且，以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为转机，毛泽东的实践活动迅速开始，不久在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革

命思想。毛泽东的这种变化多端的思想经历，的确是当时中国的“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典型。然而，在上述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包含着许多探讨“毛泽东思想”时不可忽略的问题。这里，想就这些问题，即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征进行一下研究。

第一，政治实践促使毛泽东的思想急剧转变

毛泽东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文献、并以此为转机自觉完成自己的思想转变是在1920年，即在他27岁的时候。当考虑到此时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时，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于迟了。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在对国民革命的展望问题上，与其说是与孙文，不如说是与改良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张产生共鸣；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新青年》周围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不是李大钊和鲁迅的赞美者，而是胡适和陈独秀的赞美者。尽管有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是毛泽东自认为以1920年为转机自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在1921年作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是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若干入门著作之后仅仅一年的事情。这种急剧的转变情况，有力地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何等迫切的课题。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指出，即在毛泽东自认为思想转变以前的变化多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于吸收到自己思想胚胎内的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各种思潮和人物形象，当时的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以至如何辨别的？关于这一点，假如考虑到当时的那种将实践活动放在最优先地位的中国历史环境和毛泽东本人一贯具有的乐天派的性格，就不会认为他是在极短的期间内，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进行独立的思考，经过自我否定的媒介，在思想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被毛泽东接受之日起，就具备了容易变样的条件，这是由于他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吸收有各种倾向的缘故。后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而显然存在的他的思想的各个侧

面，也应该在这样的脉络中进行观察。

如果进一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就会发现，尽管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冲动性的共鸣，但就思想上和理论体系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言，就连那时站在最先进立场上的李大钊也是极不完全和极为朴素的。当时，在仅仅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毛泽东身上，更难找到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说，面临当时的中国现状，特别是在以湖南为中心的高涨的农民运动中，改变农民的奴隶状态，即打倒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是迫在眉睫的课题；“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热情的信念和行动，十分必要；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事实。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只能以暴动形式存在，自己的政治实践才是获取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保证。似乎可以说，这种立场并不是由于接受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结果，而是一方面由于受俄国革命——那是马克思主义在后进的俄国的社会形态和思想环境中、在激烈动荡的帝国主义时代取得胜利的伟大特例——的影响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所限制，另一方面为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所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上述过程的结果，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与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相差悬殊。青年马克思在彻底批判德国的现状并立志革命时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他要求人们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号召参加革命的实践。

当时的中国现实，要求政治实践作为至上命令，没有给毛泽东系统地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充裕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可以确信的行动指针和战略战术的纲领予以接受的，而且在他后来的理论形成过程中，又继承了这种接受马克思

主义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同时也基本上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性格。

第二，土地革命思想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支柱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是依靠毛泽东的独创性取得的。所谓独创性，是指在土地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将农民聚集到革命的队伍中，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并且使获得的根据地和周围农村迅速革命化。可以说，这里所指的农村根据地革命方式的各种经验，即激进的土地改革，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术，工农红军的日常规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至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行动方式的源泉，它已成为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性格的原型要素。

如前所述，以土地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形成的。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创见之所以可行，是由于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农民要求改变极其悲惨状况的愿望。他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思想，不久形成了他的以农民、特别是以贫农和工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的理论，这种理论独立于列宁的工农专政理论之外。众所周知，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著名的口号所表明的工农专政理论。列宁指出：“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明确地规定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这种农民斗争的任务。然而，那时列宁也指出：“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扫清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地和坚决地为社会主义

斗争的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他没有忘记指出农民作用的局限性。

与此相反，毛泽东以“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种认识为基本出发点，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可以说，毛泽东最初就看到了农民更富有革命的战斗性，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因而，与列宁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工农专政的理论相反，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始终以农民为主体。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当时的中国现状从这个考察对象中除去。当时的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成熟，几乎还不能说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成分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分量。如果从革命理论的体系上看，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自然是处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延长线上。然而，在1935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找不到从列宁那里摄取理论的痕迹，毛泽东理论中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思想的特殊性，正与此有关。应该肯定这样一个前提：毛泽东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并非由于继承了列宁的理论，而是根据在农民运动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土地革命思想形成的。

既然毛泽东的上述创见是依据农民运动的经验而产生的，是否可以单纯地认为那是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的结果呢？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特点。

一般说来，在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中，虽然农民为与西欧式的个人主义意识不同的关闭式的、自立的小天地所局限，但是以这种关门主义为前提的共同体性质的乡土意识却依然传统地保持着。以这种乡土意识为媒介构成的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均质社会，那是培育特殊的中国的乌托邦平等思想的母体。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多次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所表现的激进主义，决

不是与这种平等思想无缘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井田制”、“均田法”等土地制度，不用说，还有表现太平天国理想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思想中的“去产界公生业”的建议，作为孙文民主主义支柱的“平均地权”以及新三民主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的提出等等，可以说这些改革农村的志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特点。

当我们研究生长在农村的毛泽东在不久前的农民运动中形成的土地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时，不能忘记上述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因为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所以不能认为其形成过程与中国的传统意识无关。毛泽东的创见之所以有效，可以说是由于他巧妙地激发了潜在于中国农民中的传统意识的结果。

当然，上述土地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和背景，使“毛泽东思想”孕育着极为浓厚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思想要素。

第三，英雄豪杰的权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源泉

乍一看，这一点也许不能作为考察的对象，然而，当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并联想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曾认为幼少年时期百读不厌的那些英雄列传对他自己影响很大时，我们不难看出那种影响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而且，在谈论“毛泽东思想”时，正因为他的军事思想的侧面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支柱，所以对此切不可忽视。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再三引用中国古代虚构的和实际存在的英雄豪杰展开武打的场面，譬如在集中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将《水浒传》的主人公林冲的武勇作为“战略退却”之例加以引用。而且，这样的事实，不单纯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作个比喻，而是正如他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那样，加进了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使幼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醉的英雄豪杰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抱有“正

义必胜”信念时的鲜明映象，而且这些英雄豪杰的权术，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源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是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反‘围剿’”这种将根据地作为中心的游击战术为象征的。可以说，贯穿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富于战斗精神的侧面、在中国革命各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理论，不可避免地出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而正是自幼少年时期以来就与中国古代的英雄和传奇小说中的主人公产生共鸣的毛泽东，将这些英雄豪杰使用权术的各种形态分为“正义和非正义”并以此为主要媒介形成了这种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理论。

二十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美〕白修德

【白修德，即奥西多·怀特，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1939年4月离开美国，来到中国，曾担任过《时代》杂志的特派记者。1944年底，他来到延安，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采访。在延安，他接触了中共许多领导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共产党政治局有13名委员，……我至少采访了11位。"延安及其中共领导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与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

在延安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只是人们并没有称其为神。他只是"主席"，但是他像耶稣那样地说教，别人洗耳恭听。他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他的第一个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被国民党杀害，在我见到他的前一年，即1943年，他的二弟被新疆省主席绞死。毛为他人树立了榜样，

他在自己的烟草地里锄草，因为他是个烟不释手的人。但是他的威望主要来自他是一位权威的导师。别的人都犯错误，唯独他是一贯正确。1927年，他第一次同俄国共产党人决裂，后来他原谅了像周恩来这样一些人，虽然他们曾在短时期内信奉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举行城市暴动的主张。在毛的面前仿佛摊着一本只有他自己能辨认的、用神秘符号写成的历史书。根据这本书，他教训其他同志和他们的领导人，为他们指明中国的出路，阐明他将如何率领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及在此以后他们又必须干些什么。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他曾经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博览群书；但是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坚持使其意志得以贯彻的那种决心，也许是除了列宁而外，在20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一天早晨，有人在7点钟把我叫醒，通知我说，如果我想见主席，我应当立即准备同他共进早餐。他不是在办公室里是在他的私人窑洞里接见了我。这个窑洞光亮整洁，泥土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桌上纤尘不染。

此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外貌，而是他那威严的风度。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不像在讲台上的那副神气，也没有劝人的意思。他不尚空谈，对我所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体轻轻晃动，步态稳重。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静静地坐着，带着一幅无精打采的神情阐述自己的见解。

我最初提出了一些会见一位国家元首时的例行性问题。既然美国的目的是统一中国的各派力量，使所有的人都能同我们一起抗击日本，我就问他是否有希望改组国民党，是否有希望“解开这个结”。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个结没有办法解开”。谈判会不会有成效？他说希望极其渺茫，谈判是国民党用来欺骗美国人的一种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人打败日本，只有这样他们才

能回师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赤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他的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旧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他们当时确在考虑以新的“人民参议会”的组织形式把各游击根据地和各解放区连结起来；在前方作战的将领强烈地要求采取这一措施，不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他并不反对美国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用物资，但是，假如我们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一二十个师的蒋军，那么蒋就会调动这些军队来对付他。美国最好是对国共双方都不供应军需物资；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他就要求美以国共双方对日抗战的贡献为比例，把军需物资分配给两方。

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我答应将采访记录送请他过目，因为他所作的是一项正式声明。但是当那篇稿子退还给我时，已经改动很多，以致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如。在蒋的办公室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常常有人进来送电话记录或便条，不时打断了宾主间的谈话，但是和毛谈话却没有这种情况。他的办公室是共产党中国运筹帷幄之所在地。毛泽东显然不是一般行政首脑，而被认为是个圣人，在他进行思考时，一定不能打断他。兴之所至，高谈阔论我们之间没有对话；我是个学生，在洗耳恭听他的教导。这个声威显赫的人物，不容他人持有异议或和他争执，而且令人望而生畏。在正式谈话结束后，我问到他们一旦获胜，将在大城市实行什么政策。大城市的情况同他组织起来进行抗战的农村大不相同；在大城市里，有报纸和杂志。他会容许持不同见解的报纸发表他们想发表的文章，甚至发

表敌对性的见解吗？毛回答说当然可以；在共产党的新中国，将有言论自由、权力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他明日的中国，除了“人民的敌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他所要发表的文章。当时我没有想到问他：将由什么人来划定人民敌人的范围。

他的知识似乎也很渊博。他的谈吐像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进步意义。在我恭聆他的教诲时，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时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的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人们是否穿军装是无关紧要的，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他的学说就是不断革命论——他比同我谈话的其他领导人都更了解他的人民。用极其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他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而是在进行一场反对孔子和两千年来的旧思想的运动。他决心要根除那些思想，以他自己的思想取而代之。

我是应邀来和毛泽东共进早餐的，因此认为这次会见很快就会结束。但是他似乎很喜欢这种说教式的非正式谈话，并且有人事先把我向他作过充分的介绍，所以他就继续谈下去了。当到吃午饭的时候，他问我是否能留下来和他共进午餐，我欣然从命受宠若惊。他的夫人江青（他的第三个夫人）进来招待我们。她参加革命以前是上海的一名电影演员，那天，她虽然穿着一条厚厚的棕色毛呢裤子，仍然显得风姿秀逸。她端来了简单的午饭和我

们一起进餐。那时她32岁，妩媚动人，几乎比毛年轻20岁。我颇感兴趣地观察她，想必他也是很高兴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时隔多年，在她上了年纪时，成了政治局委员和流血的文化大革命的设计者。政治上的男演员或女演员都是危险人物，因为追求政治权势的野心往往加剧了政治所固有的戏剧性效果。江青当时成了、也许现在仍然是个危险的女人。但是她在窑洞里侍奉这位伟大思想家时却显得笑容可掬，举止温文尔雅，不像那种居心叵测的女人，完全不像后来西方报道中所说的那种“残暴女人”。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几次见到过毛，一年以后又在重庆见到过他。那几次都是正式会见。而我和毛的首次会见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足智多谋，既能掌握枪杆子又能迫使历史的发展适合他的想法。

他为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而遗憾

〔美〕李政道

【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曾于1974年5月30日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他与毛泽东就物理学中的一些名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李政道的《我同毛泽东的会见——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一文。】

"请你谈谈，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毛泽东问。那是1974年5月30日，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四人帮"居于权力的峰巅。我十分痛心地看到，在这个文明古国，我出生的地方，教育几乎完全停止了。苦闷之中，我急切地希望找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哪怕改变一点点也好。

没想到那天清晨约6点钟，我住的北京饭店的房间里电话突然响了。我被告知，毛主席打算在一小时后，在中南海住处见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见面时他想了解的第一件事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

根据韦伯斯特（Webster's）词典，对称（Symmetry）的意思是"平衡的比例"，或者"产生于平衡的比例的形式美"。在中文里，对称是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含义。从本质上说，这是

个静止的概念。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社会进化的基础在于变革，动态，而非静态，才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要素。他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认识对于自然界肯定也是对的，所以奇怪为什么对称会在物理学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在我们的会见中，我是唯一的客人。我们的坐椅之间是一个小茶几，上面放着铅笔，笔记本和两杯绿茶。我把铅笔放在笔记本上，把笔尖指向毛泽东，然后再把笔尖转向我。铅笔转过来又转过去。我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样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我解释了爱因斯坦根据等价原理的对称要求而建立的相对论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他为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而遗憾，但他仍记得并很欣赏生物学家阿瑟·汤姆森（J. Arthur Thomson）所著的一套著作，那还是他年轻时读过的。

我们的谈话逐渐从自然现象转到人类活动。我谈到教育同创造性、同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割裂的。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接受了我的建议，中国的教育应该加强。后来这导致大学“少年班”的建立，让那些聪颖过人的十三四岁的优秀学生跳级进入大学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巨大混沌中，这次会见带来的只不过是微量有序。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出人寻求自然界对称的迫切愿望同他建立富有意义的平衡社会的强烈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天，我在机场收到了毛泽东的送别礼物：一套阿瑟·汤姆森的 1922 年版原版著作《科学概要》（Outline of Science）。

他有系统地毁灭已有的神话般的形象

〔英〕韩素音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韩素音的《他的境界超越眼前的时空》一文。】

1966年，中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被召到武汉会见毛主席。除了我外，还有40名亚非作家协会的代表。第二天，我们到长江看毛主席深有意义的畅泳。在船上，郭沫若对我说："毛主席为我们打开一条新道路。"

在我探索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是另一个转折。我当时（原文如此，应为"后来"。——编者注）才知道，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的。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

我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程。时而感到愤怒，时而感到喜悦，有时竟夜不眠，在沉思、在摸索。我还到各处旅行，看见一些以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古旧落后，更看见一些新生事物朝气勃勃地茁壮成长。这样，在街道上，在庭院里，或在农村，便再度听见毛泽东的讲话。

现在，我才感觉到有能力来写下对毛泽东的认识。不错，

毛泽东已带有一个神话般的形象。但他却有系统地毁灭这个个人崇拜。他希望自己消失在毛泽东思想背后。

毛泽东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

〔美〕R·特里尔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却随着日本的投降到来了。国共两党相互竞争接受日本的投降，因为从日本人手里收过了枪几乎等于掌握了对未来的控制。关于这一问题，相互责骂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当时蒋介石占有明显的优势，毛不得不暂时屈服。国际的力量和美国的后勤援助都使蒋在接受日本投降时走在了毛的前面。莫斯科与蒋的政府签订的条约使毛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

因此，毛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非常乐意去重庆与兄共商和平与建设事宜。”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发了电报，“小弟恭候回音。”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的重庆之行。没有美国对毛的安全作出的保证，毛不应该前往蒋的领地。

1945年8月，仍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毛平生第一次爬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局势发表看法，毛写了一首诗。

这是毛平生第一次戴有边儿的帽子，他戴着太阳盔从飞机里走出，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小心

翼翼，同时也带有几分冷淡。

自1927年他以合法身分在武汉出现后，时隔十八年，这是他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分住进城市。许多人来访，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他见到了老朋友和过去的敌人，他对见到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慷慨大度和爱国热情，相互交换一点儿自己的习作。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他的词《雪》(这是他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看到了他对中国山河的热爱，也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感。

蒋介石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他们握手问好。

一个像普鲁士式的，一个看上去像波希米亚人式的。蒋介石的服装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毫无装饰。好像是从一百件服装里任意拣来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蒋介石看上去像根铁柱子，而毛像一根竹子。

有人曾说当时蒋很紧张而毛则是镇静自若，这不一定准确。没有哪一个接连抽烟的人——毛正是如此——是完全镇静自若的，尽管毛尽可能慢地呼吸。

毛之所以能保持镇静，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个性除外）将会战胜蒋。部分地因为这种因素，毛是坦率耿直的，而蒋则遮遮掩掩。

四十五天以后，毛和蒋签订了一纸协定，委员长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而毛泽东的签字则是平滑流畅。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同分享政权吗？如果有联合政府存在的话，红军难道就会遣散吗？但是，安排召开全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领土边界的划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两位对手叮当地碰杯时，都有点过分地笑了起来，宴会上的其他人注意到这种靠不住的场面，简直笑不起来。

回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毛作为蒋的客人同去看中国古装戏。戏

演到中间，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面的汽车挨了子弹的袭击，毛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在地上，已经丧命。周恩来脸色煞白，他找来蒋的首席谈判官，表达了自己的极度愤慨。

毛仍然呆在座位上，他很喜欢中国古装戏——尽管取得政权后他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参加了一个饯行宴会。毛已注意了他的汽车受到袭击了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起杯建议道："为蒋介石先生的长寿，干杯！"

自那天晚上看戏之后，毛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和蒋怎么能彼此信任？毛没有相信蒋，"世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他回到延安后对几位助手说。他的重庆之行就是曲折的，他并没有认为与蒋介石的谈判会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不得不对蒋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发生内战，毛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

他去重庆的目的也在于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都更加重要。它及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统治了一亿人口，并拥有一百万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

"天不能有两个太阳。"蒋对他的助手们说。但是毛认为，中国的天空对这两个太阳作出了选择。

毛鄙视蒋，"蒋介石已丧失了他的灵魂，"他总结道："只有一具朽尸，没有人还会相信他。"然而，毛在重庆时掩盖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实在没有兴趣与蒋谈判，因为自 1927—1937

年这个人一直与他们作战，现在更是如此。有些人已经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蒋的谈判会取得成功。

毛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世界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他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做出判断。现在的形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将来的形势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的话，间接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其后的三年对毛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产生了效果，他们的政治预言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奇妙的魔术师。

1946 年，国民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南部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很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介石军队的三分之一，枪支弹药也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第一年毛选择了防御战术，蒋介石四处出击，到 1947 年早期，世人已经相信，共产党像过时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

特别是在 3 月份，毛放弃了延安，他的一些同僚希望坚守下来决一死战。莫斯科也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共产党的失败会就此到来。

毛泽东并不伤感。“不就是几座窑洞吗？”毛说延安。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丢掉一座空城没有关系，目的是粉碎敌人的军队。”

蒋得意地飞到延安，毁坏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可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三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1947 年底，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进攻战。

“人民是我们的铁壁铜墙。”毛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辞，但结果正是如此。

在东北，蒋介石上了惨痛的一课，只占建筑物而不占有人民的心是没有用的，他乘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扔进山里。蒋只占据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结局。毛已经获胜。

1948年春天展开的几次战役充分体现了毛的灵活机智。他从未反对过这种正面冲突，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变得强大了，突然之间，战斗不是在毛的领地之内进行，而是在蒋所管辖的地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了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中国这块屏幕上的画面以不寻常的速度交替出现。每一个画面都显示了蒋的国民党受到重创。毛的胜利已经可能摸得到。

蒋介石变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一封充满温和的言辞的信从南京发出。但现在毛的言辞就像一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人民解放军从绿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漂亮的城市，这是毛给蒋的真正答复。

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抓住这个机会。

毛把他的胜利投掷到蒋的脸上。

毛泽东获胜了吗？蒋介石失败了吗？两者同时发生了。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全力以赴，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碎。

两个失败是统一的，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毛之所以能战胜蒋介石，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的群山绿野之中，而蒋介石并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那么就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部下也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用一半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巢穴。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支援，像蒋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毛的军队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一边宣

布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感到他们的国家在蒋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公然的不满。

蒋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鼠目寸光。作为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毛有着更长远的打算。

蒋是一个自负而愚蠢的人，常受一些琐事的牵制。毛（在四十年代）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目标的实质。

蒋只是一位军人，而毛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只是一种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蒋完全可以与毛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他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却深谙其重要性。蒋只知道寻求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其结果既丢了军队，又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毛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这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斗争方法。毛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蒋却因丢了宝玉而常处恐惧之中。

毛泽东的领导作风

〔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泰韦斯早在6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的研究生涯。他侧重于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现象，著述甚多。他所著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原书名为《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对毛泽东现象作了独到的剖析。作者发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领袖权威三种类型学说，用以探究毛泽东崇高权威的形成与发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A·多克·巴尼特评价说："此书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R·汤森也曾说，泰韦斯这部书"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领导的动力。"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

初看起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很难与"文化大革命"中透露的材料相吻合，比如刘少奇宣称，毛泽东也是一个人，也会犯错误；周扬反对过分宣扬"毛泽东思想"，反对将它庸俗化和过于简单化；陈毅曾认为，领导人很少有谁没有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反对过毛泽东，这样做没什么不正常和不合适的地

方。尽管无可否认，许多人不赞同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认为毛泽东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受到党章的约束。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本人的言论表明他十分赞同上述观点：

> 去年（1961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
> 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
>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这些话以及其他言论表明，毛泽东已经具有强调民主准则的领导作风。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这并不妨碍他在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实行自己的主张。但它的确表明，毛泽东征求坦率意见，鼓励党内辩论，也愿意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别人的观点和主张。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的同事们也恰恰期望他这么做。但必须指出，这种作风对于维护毛泽东的威望极其重要。毛泽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人们的忠诚，因为他的同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期望自己不因坦陈心迹而被打入政治冷宫。正如陈毅所言，毛泽东宽容、大度，不打击报复那些过去曾经错误地整过自己的人，这些使主席得到人们莫大的尊敬。

在这种情况之下，60年代初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个性化和通

俗化的热烈辩论，便需要加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有力地指出，是林彪而非毛泽东本人，是主张“毛泽东主义”的人们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导者。正是林彪，提出了诸如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等概念，把毛泽东描写成“天才”，并广泛发行载有毛泽东语录的小红书。毛泽东最后明确反对林彪的大部分发明固然重要，而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党的领导人可以依据毛泽东长期的领导作风和他当前的言论，来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当然，这牵涉到重新肯定他们作为党的领导人的自身地位，而这正是毛泽东始终认可的事情。

但是，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状况不满的增长，他对自己的长期合作的同志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毛泽东的理论主张曾经多么鲜明，他现在显然开始把对他的思想和个人的口头拥护的热情程度，作为检验是否在政治上忠诚于自己的试金石。有些人在1965—1966年通过了这个标准的检验，但事实最终证明这种检验是错误的、靠不住的。毫无疑问，当时许多没有通过这种检验的人，事实证明也是弄错了。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日〕野村浩一

【野村浩一，日本私立立教大学教授，法学系主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曾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动态》、《文化与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

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灵魂的体现。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特点：一、争取人民和民族解放是其基调；二、最自觉地抓住了革命实践；三、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在变革社会的同时变革人的思想。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书，原文载自《毛泽东》（东京）。】

回顾历史，恐怕没有人对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这一点表示怀疑。

毛泽东是杰出的革命家，是率领几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动乱中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同时，他与所有的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富于独创的思想家。

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之后，又连续写了

不少有关中国的优秀报道作品，他在《今日中国——另一个世界》这本书中是这样写的："说毛泽东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党的领袖，从纯粹的意义上讲，对于几亿中国人民来说，他是导师、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一流诗人、人民英雄、家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

的确，根据历史事实判断，应该说，毛泽东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伟大的解放者。同时在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业绩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给当今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包含许多内容，但是从广泛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来看，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以补充。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也曾反复地谈过这个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初次听到。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所一贯追求的，首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为此，他确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自己的思想。

一般说来，在欧美，"毛泽东思想"被称为"毛主义"。一个原因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翻译上的差异；另一个原因也同时包含这种观念：与依据马克思主义进行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相并列，的确将它作为象征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主义"来看待。另一方面，中国把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贡献说成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也许是说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前提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其具体应用的一面。

毛泽东屡次引用列宁的话，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野村浩一注），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个"活的灵魂"就是毛泽东的思想。

这种思想，最能动员人民从事现实的伟大革命运动，人们把这种思想当作行动的重要依据。这种思想在现实中应用，推动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思想能够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像这样密切联系现实的运动、并从现实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几乎是没有的。毛泽东自己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讲的：

> “《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这里可能包含有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它应有的状态或者结构方面值得注意的重要侧面。确实，至少那不是在书斋里一味地思索、只是向着纯理论的结构努力的结果。

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必须根据它的多方面的相貌，对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分析。倘若大致区分一下，可以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轴和中国思想这一磁场或土壤。另一方面，作为一心为革命从事理论建设的毛泽东本人在思想上和哲学上的贡献以及几亿人民解放运动的反映，这种思想已成为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无疑，毛泽东首先是运动的人，是参加革命实践的人。他的整个思想及其特点是在几十年的具体革命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运动难以分开一样，他的思想中的本质部分也与他的现实活动密不可分。极而言之，他的行动轨迹和成果本身，也许可以说就是毛泽东的思想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的思想，仅仅通过他的生涯，便可将它多方面的相貌和特异的结构以及独特的理论全部表现出来。毛泽东的思想恐怕比其他任何人的思想都更为明显地大部分与历史或革命史密切相关。

然而，在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时，仍然需要抓住他那最富有特点的几个侧面。今天，毛泽东已经结束了他的一生，将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位置。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

说，“要见上帝的那天”——看来已经描绘出了他那具有独特轨迹的思想，并且已经到达了终点，他的全部生活历程，作为一个整体留给了我们。

这里，作为考察的一种线索，我想从介绍毛泽东言论的几个方面开始，大致描绘出他的思想轮廓。

一、解放的思想——根本性格

造反有理的“道理”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发表了如下演说：

>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这句话成为毛泽东非常著名的一段语录。在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时期讲的这句话，经过了二十几年，成为给解放后的中国带来激烈冲击的口号，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大概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里提到的这句话已深深地埋在他的思想中。

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写过“造反”这句话。此后，在大约十余年后的延安，进而在二十余年后的解放了的中国，“造反有理”作为他的运动的关键之一出现了。这样看来，这句话在他的行动或运动中，是从其内部间歇地出现的，这样讲决不过分。

毛泽东非常有力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针对“压迫有理、剥削有

理、造反无理”而讲的，据说马克思确实推翻了以前的“判决”。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恐怕只有“造反”了，而且所谓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辩证“造反”的“道理”了。

不用说，这是他在许多人面前所作演说的一段话。众所周知，听这次演说的人，即领导延安运动的负责人，基本上是由中国的农民阶层构成的。假如从“造反”这个词来研究，它是深深地存在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语言。“造反”“谋反”这类语言，过去意味着对所有的“正”＝体制上（儒教的）秩序的一种叛逆，在这种语言和基于这种语言的行动之间，虽然存在着难以形容的深渊，但它们却一直广泛地潜藏在民众之中。这是面对特定的听众，在企图唤起人民、激发人民的演说中使用的日常语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演说中这句话所追求的一切，一定是过于性急了。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尽管如此，可以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那一部分是以粗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压迫”与“剥削”的“反抗”与“斗争”，或者说是由“压迫”和“剥削”引起的解放运动。在千条、万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中，最突出的是在这种意义上的革命的道理、解放的道理。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到这些话在6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次作为激烈的运动的关键性的语言之一出现的话，那么这不正暗示毛泽东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或者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的侧面吗？

这里突出地显示出毛泽东本人的最基本态度，即在与“剥削有理”相对的“造反有理”这一构图中，最坚定地相信造反的“道理”，而且根据这种“道 理”谋求解放。

也许可以说，这里出乎意料地显示出了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催化剂形成自己的思想的基本部分。

我想，首先把这种思想规定为解放的思想，以此表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本特点。与其说这是思想的构成和特点，莫如说这是使它形成的基本特性，也是基调。形成这种思想的一切契机，是由这种特性带来的。无论怎样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实际及其发展，当与他的行动轨迹相对照时，便可以看出这种规定是妥当的。

二、实践的思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超过马克思

据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即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这样讲：

> "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看来，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但同时又是充满信心的主张。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半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9年至1957年）公开出版了。在这之前，已有几个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存在。这是中国国内编辑的，收集了毛泽东在解放后的言论。看来中国不打算将其全部内容立刻原封不动地公开发表，因为其中多数带有内部性并且是有待今后加以验证的素材。不过我认为这些文章，还是有很大可靠性的，经过必要的研究和整理之后，可以适当地加以利用。

不要怕无产阶级教授

这一年——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全中国掀起了所谓的"大跃进"。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首先提出要"破除迷信"。与此有关，又号召"不要怕马克思"。恐怕

在推行大跃进政策时，人们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各种理论问题仍然相当踌躇吧。毛泽东在讲上述内容的话之前，讲了如下内容的话：

"（我们对资产阶级教授已不再怕了），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上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号召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也不要怕"无产阶级教授"的毛泽东形象，或者还有主张"年轻人可以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的毛泽东的形象。与其说是这句话的内容，莫如说是他的形象更引人注目。大概这次讲话是研究推行"大跃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很好史料。

不过，可以说他的以基本实践为核心的，或者把实践放在最优先地位的想法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中国革命的实际成果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主张"从实践中产生道理"、"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里成为理论"。

当然，在实践——革命的实践中，人的一切活动，即发现人的本质的东西，一般说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而且"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马克思的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强调实践在本质上的优先地位本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的主张。

革命实践的思想

对于立志中国的解放、即把中国从殖民地的封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毛泽东来说，革命的成功与否，自然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最终只有现实的革命行动和运动，即无数的中国民众的革命实践，

才能促使革命成功。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上被用来指导这种革命实践，同时，其思想的有效性，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锻炼。

按照这个观点研究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最自觉、最有意识地抓住了革命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践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第二个特点。

但是，这不单纯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是实践者，因而其思想就是实践者的思想。不用说，这种思想结构和构成这种思想的带有本质性的契机是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实践浸润的。大概这里包含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这种思想企图让人们在开始从事革命实践时意识到意志本身的重要性。在上述引文中，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不要怕马克思”，可以说是要求“精神解放”。这是从领导人毛泽东的政治立场上发出的号召，但这里所表现的，确实是对要“实际干”这种能动意志的强调。

实际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态中，这种对意志的强调，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同样，在大跃进那年——1958年4月，毛泽东写了论述“一穷二白”这句名言的文章：

>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这种理解方法，按照表现本身研究，大概带有一种精神论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当作富有特点的极为独特的思想来看待，那么这就是一种重视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说较广泛地强调自觉性和精神的思想。

第二，毛泽东的思想，是把理论的出发点首先放在实践上。更确切地讲，是在实践中发现认识的基础。社会实践的过程才是认识的基础，同时也是人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在“大跃进”后的60年代初，毛泽东重新归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

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种思想，是企图在人们的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找到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可以说，它反映了作为实践者的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

如前所述，在实践中寻求认识的基础，一般说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之一。而且，列宁本人曾说过一句名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理解本身，一般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果从这点上讲，只有毛泽东才把这种想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另外最让人联想起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副标题，它用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知和行的关系》这个题目。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毛泽东著作，为什么要使用《实践论》这个题目？这篇著作在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发展之后写道：“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根据这种看法，用极富有象征性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在这里，毛泽东的思想显示出它那极其独特的相貌。

知行统一观

正如副标题所示，毛泽东是将实践作为“行”来理解的。这属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哲学派系。而且，在他比较自觉地反复思考自己的实践活动的这篇哲学著作中，主要的内容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知易行难”（《尚书》）也好，“知行合一”（王阳明）也好，这些令人称赞的语句，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观。

这种哲学观，对我国的思想所给予的极大影响，无需再论述。毛泽东的《实践论》，恐怕就是从这个“行”出发的。而且，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虽然基本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分析，但还是想重新加以组织。可以将它称为双重过程，即毛泽东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接近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中国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作了一些补充。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时，指出：

>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里，包含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的观点。“共产主义的时代”，是指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移植到《实践论》中，他的《实践论》是作为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人间论”而展开的。

这里，我提到了与毛泽东的实践思想有关的几个论点。这里所涉及的内容，从日常经验到哲学和理论，都需要进一步说明和考察。但是，我们应该首先确认毛泽东的思想是由这些显著的特点构成的，进而论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另外特点。

三、教育的思想——实现人的转化

伟大的导师

埃德加·斯诺在《革命在继续》一书中写道：

> “一阵沉思之后，毛泽东说他的一生是从小学教员开始

的。那时，既没有想过战争，也没有想过要成为共产主义者。……不管怎样，事物并没有按照个人的意志发展。重要的是，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他说，人们要想打破具有三千年传统的崇拜皇帝的习惯，是很难的。毛主席就挂上了‘四个伟大’的头衔。多么令人讨厌啊！迟早要把那些全去掉，只剩一个‘导师’。——单指学校教师的意思。毛泽东一直是学校的教师，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小学教师了。其他的头衔大概全要去掉。”

毛泽东的一生，是从一名小学教师起步的。他在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学，任附属小学的主任（校长），并成立湖南自修大学。后来，他成了八亿中国人民的领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称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几乎成了绝对的崇拜对象，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客观地看，他显然是中国的政治领袖，也是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根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从年轻时立志当小学教师以来，直到在晚年的巨大政治变动中自己说“讨厌”导师以外的任何头衔为止，可以看出他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求自己的本质是“教师”。也许还包含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人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究竟想教给人们什么呢？这与毛泽东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无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所有解放运动的基点。他的一生，的确是在斗争中度过的。如果他确实如自己所说是一位“导师”的话，不是可以在这些斗争中或者在这些斗争的方法上找到表现吗？

变革人的思想家

众所周知，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的“整风运动”，是带有中国共产党色彩的最独特的运动。“治病救人”是毛泽东的党内斗争方法。而且，他写了被称之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些简洁而又平易的文章，为人们指明了人生道路。

当然，一切思想，最终都与人生问题有关。这种思想越与现实结合紧密，它的冲击力越是有形或无形、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强大。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在以这种一般思想的问题为前提的基础上，作为教师的形象和作为教育思想的侧面更突出。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讲，也许他想作为一名教师度过自己的一生吧。在20世纪的中国，他胸怀解放的思想，是一名为此而奋斗的教师，实践的教师。同时，他也许还是想作最终超越这种斗争本身的教师。然而，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他的整个实践也应该包括对过去的、尤其是对旧中国传统伦理与规范的挑战和对其实施变革的尝试。

当然，这种挑战及其现实的成果，如果是指思想特点和其立志方向的话，则暂属别的范畴的课题。作为伟大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的行动，处在变革的意志和政治现实之间，遇到了种种矛盾。他生活在几亿中国民众的中间，毛泽东本人及上述提及的他的思想，在“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这一巨浪中，得到了很大锻炼。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思想，从其思想本质上看，无疑包含有一个伦理思想，进一步讲，是变革人的思想这种特性，或者说，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中国，同时在现代世界上，企图变革现实和变革人们的思想。

至此，我谈到了作为解放者的毛泽东，一位革命实践家的毛泽东、一位作为导师的毛泽东的各个侧面以及由此引出的思想上的几个特点。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是由这几个方面构成的，这

种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应该说，他的思想及其理论的形成，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适应的。

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

〔美〕杨振宁

【杨振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于1973年夏天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并在其《思想家，领袖，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一文中，谈了这次亲身的感受。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出于此。】

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原因是，1973年夏天，当北京旅游局问我在中国想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最终鼓足勇气问能否见到毛主席。第二天我由于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而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旅游局的人说，"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点空想要见我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我到中国既不是以记者身份去的，也不抱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想促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所以当我去见毛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拟定的问题要问他，也一点不知道谈话大概会怎样进行。其实，这样倒也好，因为这是一次非常轻松和漫谈性的谈话，毛主席非常有办法使我不感到拘束。

他问我们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正在做些什么，当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结构的时候，毛主席对此非常感兴趣。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显然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当代高能物理学的某些发展情况，特别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我告诉他这个问题仍然在激烈地辩论，迄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

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谈话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

我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的伟人之一，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对于思维过程，对于各个领域的概念都感兴趣；然而他又是一位非常注重实际的人。通过把他的特殊的洞察力与品格相结合，他成了许许多多其他极有才能的人们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英〕狄克·威尔逊

【狄克·威尔逊，1928年生于英国，新闻记者兼作家，以汉学和研究中国出名。曾著有：《人类四分之一》、《新加坡——东西方的焦点》、《1935年万里长征》、《毛——人民的皇帝》、《两虎相争——中日战争史》等等。威尔逊1973年至1981年在伦敦大学任《中国季刊》主编。1984年他出版了《周恩来评传》。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周恩来评传》一书。】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作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毛的上司和批评者，变成毛的下属和支持者。这种不寻常的合作关系，后来决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整个活动范围和进程，而这些表现早就有苗头了。周在1930年底发生的“富田”事件（?）所持的态度，以及1932年宁都会议上提出对毛的批评，表明他从来对毛提意见总是温和有节的。此外，他还找机会对毛表示赞扬，而不像有些恶狠狠的人对毛的批评，总带有报复性味道。因此，毛有理由对周的公平灵活态度表示感激，而后来毛也这样如实讲过。（作者似有误，如果指的是“古田”会议，那年代是1929年。如果指的是福建事变，那年代是1933年。原文“Futian”，或错了第一个字母，或错了第三个字母，错了第一个字母，可

变成“Gutian”即古田；错了第三个字母，则可变成“Fujian”，即福建。姑存疑，——编者）

遵义会议急需解决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很明显，毛的游击战争思想，在当时战争情况下，要比周的传统战争做法合适得多，但是，在游击战的作法一旦完成了任务之后，或者情况使党进入一个比较愉快，或者更加正常的局面之后，周完全可以把毛抛开的。长征后期到了四川省，张国焘的队伍同主力红军会师，就提供这种机会，然而，周最后还是支持毛，反对张。第二个选择的机会是1943—1945年，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当时王明再次要争夺领导权，然而，周却不支持他。张国焘和王明在早年是周的合作者。毛在中共权力圈子里又从来显得是个土里土气的人物，按周的气质和风度，他会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顺眼，甚至可笑——但是，周还是对毛忠心耿耿。长征以后的这种情况，需要加以解释。经过一段勉强在一起的合作后，毛本身的权威以及他的令人信服的号召力，很可能给周以深刻的印象。

共产党人自从第一次在上海和南昌举行城市起义以来，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周亲自体会到中国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以及为什么农村革命比城市革命更重要，更加可取。没有比毛更适合的领袖来领导这场革命了。此外，周也可能认为，在政策和党的工作许多方面，毛比其他人成见少些。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就相辅相成，别的同志也看到遵义会议后，周让出了权力，在长征后期的各个阶段甘当毛的助手指挥军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要应付来自刘少奇和林彪方面对毛泽东最高权力的威胁。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副手，一生经历有起有落。周从一开始就是毛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支持毛反对刘，例如：1948年，在西柏坡研究是否继续对国民党作战，举行关键性表决时，周就和毛站在一边。1957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0年代后期关于“文化大革命”，他支持毛反对刘。在70年代他支持毛反对林彪。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周反对毛的

做法，直接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对大跃进方针在经济方面的不明智，持有如此强烈的意见，于是，一反常态，从各个方面组织反对力量，使大家协调起来，以致毛不得不让步。

但这伙伴关系，几经沧桑，还是保存了下来。事后诸葛亮，可以从中找出几条不成文的规律。其中之一，就是周同毛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好，他只需要同毛的追随者搞好关系就行了。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在 1943 年的整风运动以及 1967 年的文化革命中，周就遇到一些困难，基于同样的理由，显然周有权利，实际上有义务，防止毛退化成一尊神，由追随者中的压力集团顶礼膜拜操纵起来，事实俱在，周经常告诫党内年轻一代，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让毛，或毛的神话或形象取代应由他们每个人自愿履行的决策责任，这种劝告事例真是多不胜数。当毛被奉若神明的时候，特别是如在 1943—1944 年整风期间，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这种劝告很容易被误解，给周招来敌人。

还有一条规律，那就是尽管周同毛会热烈争论，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同毛持相反意见，他从来不搞反对毛的非组织活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周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虽然他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必要时为了某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把他们鼓动起来，像 1958 年在武汉就是如此。有许许多多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是拥护周的，但这不是什么旧式的拜把兄弟的关系，而是出自对周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报答过去对他们的教育，指导和提拔。这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在巴黎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留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几乎都受到过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后来在中国政府和部队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包括像邓小平和由周介绍入党的朱德。

此外，虽然周从来没有在战场上统率过一个军，可是在黄埔军校教过红军的大部分将领，在后来的年代又领导过他们，并给他们传授了军事理论。因此，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他从来不缺少一个能为他效劳的部队朋友。在 60 年代后期，当个人的安危受

到林彪的威胁时，他的这些同情者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些部队朋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在任何问题上，或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他的。他从来只要求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这在一个充满各种权力派别的党内，对毛泽东说来是很重要的。

周可以表明自己没有推翻毛的野心，他没有结成任何集团，他没有出版过什么“文选”（他去世后出版的选集是不引人注意，不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一贯在公开场合称颂毛的为人与领导。埃德加·斯诺说他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而阿兰·裴勒菲特说毛是圣灵，通过作为“罗马教宗的周恩来”行事。

所有在中共领导层中，曾经地位高过毛的人，只有周一人继续留在毛的圈圈里一直保存自己的地位，要说毛信任周，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多少年来，他们越来越感到彼此有求于对方。周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活力，必须由熟悉农民生活和思想的农村领导人来提供。至于毛那方面呢，也需要一个能代表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说话的外交家。周不吹捧毛，但是对他性格的中间地带，能投其所好。毛为人一方面不信任阿谀奉承之徒，另一方面对可能出卖他的人又存有戒心。周能够巧妙地给他解除这些不安全感，而毛却为周提供了周孩提时代可能求之不得的一位坚如磐石、说一不二的父辈人物。

到头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承受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种种压力。周在中国政坛中的作法有极大的透明度，他做什么都是清清楚楚地为着党的利益，而不是为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某一个人，所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免遭批判，这就使他能经历了那场浩劫而幸存下来。陈伯达说过：“说周恩来的坏话，没人相信。甚至那位老人家也不会相信。”陈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周同毛能不拘礼节。一个法国人回忆有一次会见毛，周就坐在旁边，随便翻阅报刊，显然没注意谈话的经过。这位外宾评论说，“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坐在戴高乐旁边敢看新闻报纸。”

对周推崇倍至的背后，毛也可能嫉妒，羡慕周高人一等的本

领，风度和知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缺乏涵养，不去参加周的追悼会。毛需要周，使用他，也欣赏他，后来甚至渐渐不感到周对他有什么威胁，但是毛从来也许并不喜欢周。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可能觉得可以不做自己不真正喜欢，或者对他风烛残年无所裨益的事情。这仅仅是一种臆测，也可能是江青干的，是她设法不让毛参加，因为她有她的种种借口要这样做。

周恩来从来不犯这种错误：把政策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或者使自己站到反对派立场，或者使自己丢官受辱，而其实只要承认"错误"就能保住乌纱帽。也可能他有自我贬低的毛病，就是不向高处估计自己，因而他总是以改善他人的工作生活为己任。他讲的道理是，自己个人的成就无关宏旨，他又善于调动鼓励别人为他的理想服务。正如詹姆士·麦克唐纳说过的，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于此可以联系到周的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有时喜欢做这种工作，而同时代的中国男子汉，却感觉迟钝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

孩提时代的周恩来遭到过摈弃，也许这也使得他同情社会上居于少数地位的人，并且能同他们打成一片。引人注意的是他经常在这些少数人中找到朋友——如回民马骏，如基督徒张伯苓博士（都属南开中学的），以及在武汉传教的美国罗根、吴德施主教。没有第二个中共领导人像周恩来那样有那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朋友。而周同各国人士结交以及了解他们的文化的能力确是十分出众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说明，在谈到共产党要加速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带来的残酷手段时，周会显得手软或温和。早在1931年，在上海黑社会杀人不眨眼的这个大城市里，周就曾表明为了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对执行冷酷无情的死刑负起责任。在后来的年代里，达赖喇嘛发现周比毛更难对付。周的众多崇拜者仰慕他处世为人的礼貌和表现的现代化思想，因而对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秘密公安

工作以及庞大官僚机构的过火行为，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周对共产党的政策从不打折扣，除非政治局表示同意这样做，例如：在执行统战工作的几个时期——以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认可。

周确实有时候同毛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一致，如关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机及先后问题——周有时想迅速一些，而毛却主张放慢些，或者是反过来也一样。分歧仅仅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速度，而不是对共产主义本身有什么意见，对这个问题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毛是个英明但又会犯错误的航海家，那么周就是个有耐心的水手长，他保证轮机正常运转，水手们各司其位，船上的饮食不断得到补充。

1964 年 11 月在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提到“不破不立”，预示混乱局面的到来，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衡量，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温和派”。后来，他有几次重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他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至关重要的宗旨。1965 年 4 月，他就向全国号召过，起来“粉碎资产阶级思想”，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是郑重其事的，甚至比毛还认真。比起毛来，他在红卫兵身上花更多的精力，使他们的行动不越出轨道，按预定的目标前进。他无非希望红卫兵不要损害整个运动。

周顶撞毛时，比如在大跃进的 1958 年他反对的不是旨在增加生产的运动，而是由于相信这样搞法，会把政治资本放在毫无实现希望的指标上，并且过于仓促从事，会损害运动本身，周有理想，也讲实际，两者水乳交融，变化多端，但是会使两者各得其所。

理想主义意味着乐观主义，周是人，自然也会犯过于自信的错误，特别是在血气方刚的年代。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意图是什么样，他显得过于乐观。1926 年关于中山舰事件，以及 1927 年的上海起义都措手不及，可以归结到同一个缺点，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断定情况确实是如此。但是后来还是有许多例子足够说明他对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作了错误的判断。再

举蒋介石这个例子，周在 1937 年（应为 1936 年——编者），西安事变中就对蒋作了错误的判断。

周想在 1946 年到美国去访问罗斯福（罗斯福总统 1945 年去世，作者有误——编者），但是这件事情没弄好。在 50 年代（应为 60 年代初——编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他也把尼赫鲁估计错了。再举一例加以说明，由于过于乐观之故，1957 年他拥护双百方针，没想到刘少奇和其他党员干部决不同意让非党人士攻击党的组织。在外交领域里，他过于乐观，认为安东尼·艾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编者）能够在金门危机及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对杜勒斯施加影响，然而，他同时感到悲观，相信美国有进攻中国的可能。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可以用暗淡的色彩描绘一下，他牢牢抓住的意识形态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是不适用的。他把自己放在从属的地位，听从一连串共产党首脑的指挥。而这些人的能力如何，往往值得怀疑。他甚至表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如经济发展，已经选定的原则，同他的第一流贯彻能力配合起来，也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他在 40 年代已经认识到，除非等到千百万人民大众真正受到教育，改变自己的信念，决定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共产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他担任这个庞大国家的政府首脑之后，他感到对共产主义的各个目标，非同时齐头并进不可。

不过这可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周不能贯彻初衷，不能在有生之年真正把中国带进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使中国人民生活显而易见地改善，取得更高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水平，严格地说：这不是他的过错，毋宁说事情本身实在无法办到。在这样疆土辽阔，基础又那么差的国家要取得巨大进展，无论谁都会碰钉子的。然而周恩来不是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或者对不可避免的挫折吵吵嚷嚷，而是毅然守住阵脚，在共产党中国提供唯一的一支巨大力量，保证改革的方案进行下去。周是主张继续不断地进行改革，他不像刘少奇那样固执地板着面孔行事，而从来总是高高兴兴，很民主地鼓动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做好工作。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卸任，以及邓的接班人一个一个接过工作又一个一个交班的时候，人们将首先缅怀周恩来的工作和为人，其次才是毛泽东或者任何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成绩。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毛泽东有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之称，又兼两个角色一身，但现在要加以贬低了，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做法，即在周恩来死后把无可非议的“列宁角色”的谥号加在他头上——虽然他对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列宁是大不相同的。他去世后的几年，中国人民佩戴的周恩来纪念章，多于毛泽东或其他的纪念章。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很近人情，耐心细致，靠自力更生的中国。毛泽东则主张以巨大飞跃的步伐前进，往往使中国人最后倒退回来，在原地踏步。通宵达旦，连着几个星期大炼低质量、毫无用处的钢铁，或冲进市政府的办公室，威吓、侮辱、拷打一些干部，这些也许是令人兴奋得意的举动。但是到头来，这种活动不能产生值得称道的进步，更不能说能带来太平盛世。这样一比，周的不怎么令人兴奋但合乎情理的渐进主义就吸引人了。

周推销共产主义不短斤缺两。反而是毛泽东和与他持相同意见的人逾越正轨，在目的与手段之间丧失了平衡，违反自然规律，急功好利。他们妙想天开，以为引发人的恶性一面，就反过来导致人的善性一面。这不是共产主义，这是伟大狂的幼稚病，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些人只是提供了他提供不了的政治领导而已。周恩来具有拿破仑式人物的丰富改革才华，兼有梅特涅式人物的政治坚韧性。

周恩来忠于自己的信仰，同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信守人情之道，并无二致。这就是他有别于本世纪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固然他确实没有了解尼赫鲁，正如同他没有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西方世界犯这样毛病的人，也不乏其例，因此，不必多所指摘。周恩来同外国交往，偶尔露出固有的沙文主义苗头，但这同他地位差不多的同僚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他了解外部世界见闻之广，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西方人在周恩来身上可以

看到有这样的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同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文化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进行合作。凡是同周恩来见过面的人，分手之后一定会感到将来同中国在一个单一国际社会合作的信心增强了。他给所有想法跟他相同的人留下两个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是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二是引导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负责的角色。就此而言，我们对周恩来选择的人生道路满怀感激，对他遗留下的中国存有希望。

第 五 编

军事家笔下的毛泽东

揭开我们时代军事奥秘的人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

【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英国军事问题专家，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方面有一定影响，著有《在东方的失败》等书。他认为，毛泽东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学说的基础是“人民军队”的军事体系和“人民战争”的政治军事哲学。“毛的军事理论是不断发生战争的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评价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在东方的失败》一书，原文由李天林等译。】

引　言

1704年，马尔巴勒公爵率部穿过欧洲，到达多瑙河畔，凭着迷惑敌人和灵活的运动战术，战胜了居优势的对手，取

得了辉煌的战果，从而挫败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野心。1796 年 3 月，奥地利人及其盟军占据了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一线，此时，拿破仑接过了该地区法军的指挥权。4 月 12 日，拿破仑在芒泰诺泰地区击溃奥军。奥地利人从此一蹶不振，连连败退，导致了他们在里沃利的最终灭亡。1862 年，“石壁”杰克逊尽管四面都受到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的包围，但他在谢南多亚河谷还是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1930 年到 1933 年间，毛泽东粉碎了四次围剿，挫败了蒋介石消灭其部队的企图。在作战中，尽管毛在兵力上与对手处于 1 比 10 的绝对劣势，但是他凭着难以置信的机动灵活和时间上的选择，还是战胜了敌人。在一次围剿中，他在群山之间徒步走了两百英里，16 天当中同包围的数师敌人打了 6 仗并击败了他们。德国军队在 1940 年 5 月突破了阿登山脉，迫使盟军连连后退，造成了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英、法、比、荷联军的失败。1940 年 12 月，只拥有不到 4 万人突击部队的韦维尔元帅和奥康纳将军在西部沙漠打击并消灭了 13 万 4 千意大利军队。1941 年 5 月，德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当时规模最大的空降突击，动用 1 万 7 千人突袭他们以为只有 9 千联军守备的克里特岛，尽管岛上实际有 4 万联军把守，德国人依仗其空中优势来弥补他们装甲部队和炮兵的严重不足，在 10 天中夺下了该岛，建立了赫赫战功。1941 年 12 月，日本人出动了一支在满洲零下 40 度的严寒条件下锻炼过的 6 万人部队攻打马来亚，不到 1 百天，他们就歼灭了英军 13 万 9 千人（其中包括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1942 年 5 月和 6 月在灾难性的“加柴拉和大铁锅”两战役中被打垮的残兵败将们在二次大战最关键的战役之一——阿拉曼第一战中，击溃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1950 年 10 月，尽管中国人在公认的战争基本要素，如火力、空中支援和装甲部队等方面处于完全的劣势，但是他们还是向进逼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队发动了进攻，迫使敌军落荒而逃，相形之下，7 月份的全线溃退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1954 年 5 月，虽然越盟兵力在数量上与法国人相等，但他们的炮兵远不及法国人，而

且也没有法国人所拥有的坦克、伞兵，飞机和凝固汽油弹。但是，武元甲指挥下的越盟还是在奠边府给了法国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导致了那场战争的结束。

许多军事著作对这些以弱胜强的战例进行过论述。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胜利者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对手处于无准备、无组织或者无训练状态。在这些由胜利者安排的情况下，战败者的战争原则和思想是毫无用处的。

本书试图运用毛泽东军事学说对这些战例作些剖析。选择毛泽东是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军事上，他表现了一种与上述战例中的其他胜利者相似的思想方法和哲学观。其次是因为他本人的思想是在形成阶段真实记录下来的，比其他胜利者的思想记得更为详尽。第三个原因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本书还试图解释毛的思想，深入到他的思想之中并加以展开，而不是仅仅将他的著作和讲话改头换面地重写一遍。这是因为，对自由世界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要理解他的军事思想，而且还要将这种思想运用于在东亚的西方军队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难题之中。不懂得毛的理论的意义，过去导致了法国人在印支的失败，现在正在导致美国人在南越的失败，而且看来还要导致英国军队在东方遭受类似的失败。并且也有可能致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吞下类似这种无知的苦果。

序：最初的经历

“运动战”这一定义甚为重要，因为它表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种思想导致蒋介石1949年在中国大陆的最终失败。如果法国人深入研究了毛在对付蒋介石和日本人时所采用的作战方法，那么，他们在理解运动战和找出对付这种作战形式的方法方面，应该不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使法国人可能没有看过武元甲

的公报，印度支那的新发展同毛的方法之间的联系也是明摆着的。

法国人在奠边府的失败恐怕早在1927年就见其发端了。当时毛泽东率领着损失惨重的秋收起义的千名残部，衣衫褴褛地来到中国南部的湘赣山区。在此数月之前，当蒋介石明白了他在国民革命中的伙伴——共产党人的意图后，就先发制人，开始了大屠杀。蒋介石同共产党人的“蜜月”就此突然结束了。共产党人自身的存亡就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了。他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对军事所知甚少。这样惨痛的经历使毛得出了教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开始深入研究战争。毛的研究之所以入门自然是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以及他从前所作的研究所促成的。在此之前，他已花了多年的时间详细地分析过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他把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和暴动，依照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现实加以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就与实际相吻合了，成了他后来军事上胜利的起点。他中肯地指出，对战争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社会的研究，战争并非社会真空中的军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人类的社会本质，经济本质及人类历史背景中根深蒂固的特点和特性。毛从前对农民问题做过实地研究。对老百姓的了解给了他在湘赣群山中的斗争至关重要的帮助。在这关键时期，他特别有幸地迎来了朱德。朱德是个久经沙场的骁将，具有多种惊人的品质，为人谦逊，胸怀开阔，乐于学习。毛和朱之间发展了一种紧密的思想联系。毛汲取朱德的军事经验，完善了他发展中的战争理论。朱德则能抓住毛的方法的要点，并在实践中验证毛的观点，从而将理论化为军事实践。朱德可能也协助毛分析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科学。直至今天，一些人还愚蠢地臆断这种科学只不过包括一些方法上略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战略和战术只不过是建立在毛的军事哲学基础上的军事思想体系的不同产物。而这种军事哲学与西方的学说就象白垩与奶酪，

貌似相同，实质却风马牛不相及。毛的理论和实践在1930年到1934年间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时开始演化。在1934—1935年的长征期间和之后，以及在1937到1945年的抗日时期在中国西北得到了发展。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试图以残酷的阵地战阻挡日军的进犯，结果导致了千万人的死亡和大批装备的损失。而毛却宣传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学说，他的学说的基础是“人民军队”的军事体系和“人民战争”的政治军事哲学。结果是，当日本人1945年垮台时，他的政权便建立于19个解放区的1亿民众当中。相形之下，重庆的漫长岁月并没能使蒋介石的军队或政客更接近中国人民。恰恰相反，五花八门的贪污腐化现象如同癌症一样遍及国民党。就连美国漫无止境地给予财政军事援助，也未能使蒋介石从北方日渐长大的巨人的打击下逃脱彻底灭亡的命运。就这样，1949年10月，国民党被打垮，共产党中国诞生了。

很清楚，西方的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在东方的这类战争中取胜。的确，历史表明了在这种战争中空中优势作用有限。要在这种战争中取胜，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拥有按这种战争要求进行训练和装备的、不依赖陆空现代运输手段的兵士，最要紧的是，拥有精通毛的政治军事学说的指挥官。

除非有人能找出对付毛的办法，否则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是不懂毛的学说，我们的部队要是不适应这种战争，莫边府式的灾难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重演。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书籍文章里对这个问题已给予相当的重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懂毛的学说呢？当然，不少人都已读过毛的著作，也读过武元甲的。不错，作为一种职业的象征，在许多军官的书架上都可找到这两人的著作，但充其量只不过读了二十几页，仅此就足以使一般读者明白，这些军官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一些有毅力的人确实从头到尾读过毛的著作，但是读完了又觉得

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毛依然是个谜。我曾下功夫寻找过因能解释毛的学说而闻名的英、美军官，但总是发现这种人有名气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从毛的口号中弄到了一点皮毛而已。这些词句与毛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有何关系，他们并无深刻的认识，甚至不懂这些口号的用意是什么。但他们却一有机会就复诵这些口号。许多关于毛的著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注意力放在毛的这些口号上，意在表明这些口号是毛的学说的核心。这就如同在说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只是要星期五不吃肉和不得控制生育一样。这些口号很可能是朱德选编的，因为一般的士兵并不要求懂得毛的整个军事思想，而只需知道其结论即可。例如，当这些士兵在没打仗就先撤退时，就会将此与“敌进我退”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当单独陷入大批敌军重围时，他们就会联系“以一当十”，并坚信在其他地方敌军遭到“十比一”的包围。这些口号有很好的心理效果，而且给那些无法理解更多内容的人透彻地点明了许多要点。但对于了解一个复杂的对手，这些口号算不了什么。

一　文化与环境

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运用的概念是从阵地战学说演化而来的，但失败了。因为在那里，时间，地点和特殊性等条件都对毛的基于运动战的学说有利。这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是占据阵地，从本质上说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所包含的理论则认为进攻既是歼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又是保存自己的重要方式。阵地战所固有的一个方面就是安全感，运动战则不追求这种安全感，而把基本目的放在歼灭敌军力量上，不放在夺取或是固守阵地上。

奠边府有可能作为一个类似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标志着一种新的军事思想，即毛的运动战和政治军事思想载入史册。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这一战役，它的意义以及芒泰诺泰之役的意义在于无论是法国人在奠边府还是奥地利人在芒泰诺泰，都是被运

动战的拥护者逼入了一种绝境，使他们的压倒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不能说毛的独创思想是在奠边府开始的，但他的独家思想是在这里首次成功地用到了西方人的头上。

有时人们说，毛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他的思想都是传统的中国思想，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孙子、一个身份不明的在公元前400到320年间就颇有见地地论述过战争的中国人。与此相似的是，拿破仑的业绩也被人贬低，说他也没有什么建树。这些说法只不过表明，还没有什么全新的军事思想出现，有的只是一些新的解释，新的程序和新的运用方法。在任何一个军事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有关战争各个侧面的论述，其中大部分曾经是有效的。拿破仑和毛泽东都分析了过去的见解以及它们付诸实践的环境。两个人又把这些具体环境同自己所处的环境相联系，从而发展了这些见解。这样，两人都发现了战争的自然规律（即战争艺术的秘密）以及成功地运用他们的运动战学说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毛在朱德将军的协助下用实践检验了他总结的战争规律，而后又根据实际经验做了修改。这些规律在中国导致了蒋介石的垮台，在奠边府导致了法国人的惨败。拿破仑说过："这样，我在战争艺术的秘密中找到了另外的对策，它代替了我所短缺的十万兵士。"在印度支那，毛的学说使越盟找到了另外的对策，代替了他们所没有的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

毛的军事理论是不断发生战争的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他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必须避免打败仗。他将目前的战争同过去的进行非常细心的比较和分析，这就是毛之所以能够一次接一次地打胜仗的基础。

二　现代运动战

在日本侵略缅甸期间，真正的游击队实际上不存在，但那里有大量的渗透部队，并打了一些程度不同的胜仗。梅里尔的"抢

掠者”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曾在缅甸北部地区到日本人的后方作战，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尤其是他们在与正面战场的主力配合作战时更是如此。温盖特的钦迪族部队也在日军后方活动，但由于他们不与主力部队的行动配合，因此影响甚小。看来温盖特认为，就是不和主力部队密切协同、不了解敌人的具体部署、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没有严密的情报组织，他的部队也能战胜敌人。这是一种幻想，但也许这是由于主力部队司令官坚决反对他的整个战争理论才迫使他这样做的。实际上，温盖特懂得游击战的重要价值，并且他实际上是盟军方面游击战的唯一伟大的实践者。从他为缅甸的钦迪族部队的主要作战行动制定的计划来看，他懂得根据地作为游击队实施运动战的基地的重要作用。在能够将上述作战计划付诸实践之前，他死了，西方军队中的游击战理论在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夭折了，这是整个西方的不幸。

温盖特将军死后，有九个钦迪族游击旅试图按流动游击队的方式作战，这样就违背了毛在三十年代初指出的一个基本点：“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其他的旅则按照命令，挖壕固守，打了一场静止的防御战，结果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所以，他们被消灭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错误中的幸存者应该对如何按毛泽东的学说打仗发生兴趣才对，要是温盖特将军还活着，他们恐怕就会这样做了。温盖特将军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他要是活着的话，一定会很快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也许因此就能避免莫边府的惨败，而且也一定能拿出办法，阻止美国人在南越所犯的愚蠢的错误。

在运动战学说的范畴之内，有形形色色的防御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从不滥用防御战。

有一种是靠纯粹的运动进行防御，无阵地可守。“防御”的一方在所防守的区域内运动，不据守哪一块地方，也不在防御战中正面迎敌。当“进攻”的一方运动到一个不利的位置时，“防御”的一方就突然发动猛烈的攻击，歼灭敌军，至少将其击溃。只有

在时机合适时才能发动进攻，如毛所说的那样："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毛的这个观点在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中多次得到证明。蒋挖空心思地要把毛围困在山区根据地中。第一次围剿中，蒋派遣了十万大军进军江西的群山，编成八个纵队，同兵力仅有他的三分之一的毛的部队抗衡。毛避免打阵地战、持重待机。与此同时，游击队在山区打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击溃战，消耗了蒋的一些力量，并使其误入歧途。当时机一到，毛将主力集中，趁夜暗向蒋最强的一个纵队发起攻击。五天以后，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又消灭了蒋另一个纵队的十分之一，蒋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在溃败中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中，在同一地区，蒋试图用封锁山口，逐渐向中心压缩的办法来包围毛的部队。毛又一次等待时机，攻击了敌士气低落，局势不利的第五路军，将其歼灭。在此后十五天中，毛在山区徒步走了二百里路，同包围他的敌军各师又打了五个胜仗，缴获了两万多支步枪。

第三次围剿中，蒋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他率领30万大军，其中包括10万精锐的嫡系部队，进逼同一山区，企图逼毛在赣江背水一战。毛和朱德将军设法突出了包围圈，取得了主动权，他们在夜间迅速行动，声东击西，五天之内袭击了敌五个纵队。三个半月后，蒋丢下3万5千名被俘的部下和大量的武器装备撤退了。毛在这几次围剿中取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游击队。这将在下章讲述。

三　游击战理论

毛泽东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但他的革命游击队活动一开始就具备了这种活动固有的一切不利因素，如兵员不足，武器缺少，没有人受过行政管理方面的训练等等。但在1926年到1930

年间，他的部队的发展规模简直可以与一个全面范围的运动初期相比。当地居民都受到了他的思想灌输，完全支持他。毛也找到了使用游击队的方法。他在广大的地区用游击队来引诱、迷惑和牵制敌主力，同时让自己的主力留待时机的到来。当他终于动手时，就取得了完全的突袭效果，消灭了敌野战司令及其参谋部、一个师司令部和两个旅的兵力。毛夸耀道：敌未能逃脱一兵一马。蒋的军队毫无效果地盲目作战，他们三番五次地被游击队所迷惑，误认为自己正在同毛的主力作战，而实际上毛的主力远在多少里之外。毛的主力是经过游击战锻炼的部队，正在向打运动战的正规军发展，各部队的发展程度不同。他们的游击背景是从事运动战的理想基础。他们在山地快速运动的能力，发动旋风般猛烈攻击的能力以及夜战的能力是蒋介石的军队无法比拟的。蒋的一位将军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他的经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同正规军的其他作战形式相比，毛指出："游击战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这些程度上和形式上的不同是彼此相联系的。在游击战中，攻势占据最主要的地位，远远多于其他形式的行动。攻势通常是采取突袭的形式。主要的攻势都是采取外线包围，但都是针对小股之敌，这是因为必须比一般集中更多的兵力，以满足在增援之敌到达之前迅速解决战斗的更高要求。在作战之前，就要有取胜的把握。这就要求必须有一种不同的作战方式，以及在决定作战的地点和方式之前，下面各级必须深入地分析情况和制定周密的计划。指挥和控制游击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下级指挥员有更大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使他们在作战方式方法的选择上有必要的灵活性。运动的方式也不同，要有更高的机动性。强调迅速集中和分散，并进一步使用各种欺骗和荫蔽手段。打了就跑式的袭击和夜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补给的形式也不一样，游击队总是用敌军的武器，这样敌军就成了弹药的提供者，而且这条原则还常常决定着战术行动的形式。取得给养的任务也下放到各级作战部队，而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

后勤系统。除了歼敌之外，其他各种任务都与疏散部队紧密相联。诸如骚扰和牵制敌军及破坏敌交通等活动都是在较大的地域内进行的。环境要求游击队在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尽量疏散，以避免被敌吃掉。分散后在群众中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工作，就象情报收集工作一样，这是十分重要的。

据毛泽东说，游击队的胜利取决于三大条件：一是广大的农村，二是人民的支持，三是巩固的根据地。

乡村广大是根本的条件，但这是指时间而言而不是指距离而言。如果乡间是开阔平坦的，游击队就要有相当大的空间才能开展活动。相比之下，在多山和丛林密布的农村，只要有一块小得多的地方游击队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东南亚的密林就是游击队活动的理想场所，这里，在较小的地区内就可以进行活动。乡村地区的人口密度也是一个因素，因为人口稠密的地方可以使游击队藏身于当地居民之中。两个地区，尽管大小相仿，林木稠密度相似，但无人居住的，游击队就无法藏身。

对游击队的所有活动来说，人民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而对整个革命运动来说，人民的支持则是基础。不首先取得人民的支持，游击战就无法开展，也无法持续下去。正如毛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水，游击队是鱼。而人民的支持来自从政治上动员人民。对此，毛是这样说的："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有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这就自然要求首先取得这些宣传工具。毛接着说："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一件绝大

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政治上，发动群众要在第一个选作游击队根据地的地方认认真真地开始。根据地的要求和种类将在后面谈到。从根据地的发展中就可看清政治动员的方法。

“就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根据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

在游击活动的革命种子播下之后，需要时间积累足够的力量以对付政府军的反扑。因此游击根据地都是建立在人迹罕至的地区，不利于受过训练和装备正规的政府军实施作战，而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却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并将最终摧毁一个政权。

毛的“弟子”们也认为有必要建立游击队根据地。毛说道：“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接下去，毛又讲到了根据地的种类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

“所以，在整个敌占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的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这一个

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

毛花了整整一章来讲如何建立根据地，而且讲解得比上面概述的各点更为深入。

一个革命运动需要根据地不单是为了发展和训练其武装力量，也是为了发展和训练新建立的政权，而且后一个任务更加艰巨，费时更长。实际上，军事活动的步子应该由政权的发展来决定。这是因为，播种革命的种子就是为了医治弊病，只有用一个能够医治弊病的政府来取代现政权，才能取得全面的军事胜利，最终完成革命运动。这一点许多革命领袖都忽视了，毛却意识到了。在1934到1935年的长征之后，他将军事任务交给将军们去完成，自己集中精力致力于政府的发展。当十多年后，他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的时候，他已能够在内战带来的混乱上建立一个中国数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效率的政府机器，甚至比俄国人整顿革命后的混乱进展更快。

从这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根据地”这个词的含意对共产党游击队同对西方是不一样的。在共产党的语汇中，根据地的首要方面并不是指可以移动的作战物资，而是指经过各种政治思想灌输的老百姓，以及在乡村有利于抗击入侵的敌正规军并取得胜利。

其次，在毛的游击战理论中，反攻学说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表明毛懂得游击战的局限性。他指出，游击队应该在他们的局限性内谨慎活动。毛说：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股敌人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大规模的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革命只能是白手起家的，它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情况就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有了一定数量的作战物资，收编了敌军的全部，掌握了国家机器，特别是当为了长期管理国家，事先制定了计划时更是如此。……然而，一场革命运动中固有的问题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其它革命运动中，所以毛的学说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游击战。

我们已谈了不少关于游击队向能够打运动战的正规军发展的问题，值得再谈谈的是一种相反的发展，即正规军向游击队发展，因为这一点适用于西方。游击队的特点已经谈过了，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大多数军人都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如果要在游击战中取胜，就要训练一支象游击队一样活动的特种部队。游击队有各种形式，有些形式美国的库格上校在其《现代游击战》一书中已经提到过了：“从本质上来说，海上突击队就是一种两栖游击队，再如各种自给自足的战斗小分队，渗透部队和纵深突击部队，都

是各种形式的游击队。”这种小分队，经过学习运动战——游击战的理论并为此专门装备过后，就能在这类战斗中取胜。这种部队中的成员当然经过严格的挑选，比如海军陆战队，空军特种部队和伞兵都是如此。困难在于这些部队的数量不足。另外的困难是，为了使毛的学说奏效，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组建主要的突击部队，可以从正规部队中挑选。但是更大的困难在于这些部队过去都习惯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和稳定的阵地战，要打运动战就要改编，训练和装备这些部队。更难的是，要消除他们以前头脑中固有的观念。

四　毛泽东从事的战争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在过去二十五年当中，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如当今世界上希特勒、卡西姆一类的人物。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战争哲学，如同他以前的战争胜利者的战争哲学一样，也是来源于对战争的分析。毛泽东的寻根究底，洞察一切的头脑很容易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来自他那具有上述两种特性的头脑和他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毛的战争理论对诸如武元甲和切·格瓦拉等人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领导人的思想。

五　指挥与主观认识

也许这就是象拿破仑·波拿巴和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们都推翻了各自时代的因袭智慧。但是编史家们认为他们二人不过沿用了前人的观念罢了。对法国首席厨师的新菜谱可以进行同样的指责，因为他选用的盐、胡椒、大蒜以及也许有15种之多的其他调料早些某个时候也曾有人用过。也许，公元前400年的一份食谱中包含的恰好是这15种佐料，份量也完全一样。可是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说明新菜谱不独特。每种佐料的用法，使用的温度、火候和调制的方法，以及最后的装盘可能同400年前大不相同，结果就象牛奶与奶酪、失败与胜利那样完全不同。那种认为毛的教导没有什么新内容的议论，是一种危险的议论，因为它常被用来压抑研究毛的著作的愿望和要求。根据我在陆军里工作的经验，放大嗓门叫喊毛的教导没有什么新东西的人正是那些对战争知之不多的人。

拿破仑·波拿巴和毛泽东都是经过战争和革命的动乱时期而出现的军事领袖。那时，军事才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也是最迫切的事情。事实上，本书提到的伟大的胜利者没有几个是在他们各自的战争时期一开始就出名的，大多数人是在小人物失败之后才涌现出来；他们是一些在和平环境下职务已经到顶，而在成千上万下级士兵牺牲之后非由他们来指挥战争不可的低级军事头目。

要成功地驾驭战斗，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在战斗的混乱、黑暗和迷惑之中发现秩序、光明和确实性的能力。我在第六章中引用了毛的一个观点，这里应该再次加以强调。它的含意是，要求指挥员不要热衷于主观主义，不然他就只能象二次大战开始时盟国的许多指挥官那样，被战争中意想不到的事件压倒而陷入困境。毛是这样强调这一点的：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上次战争期间及以后，许多作战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只弄清了部分情况就制定详细的综合性计划，结果是当全部情况显现时就感到迷惑不解，一片紊乱。全部情况在开始制定计划阶段都搞清楚的事是极少见的，而且情况在不断变化，因此制定计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并充分利用敌人也同样面临这种情况的因素。这种能力是运动战指挥官必须具备的。毛说道：

“认识情况的过程……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就必须……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的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拿破仑·波拿巴曾对一个败军的指挥官说：

“我要告诉你们老是犯什么样错误。你们在打仗前一天就制定了计划，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敌人的动向。我从来不过早地发出命令。我亲自勘察战场，并且只要还有怀疑就继续使部队待命不动。然后，我全力猛扑敌人，哪里地形更有利于进攻，就在哪里打击他。”

战斗中取得的军事经验有着潜在的不利方面，原因在于把这种随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准确的用于尔后的不同情况从而得出新形势下的战争规律，是极其困难的。实际上极少有人能成功地把他

们过去打仗的经验同当前的或今后的情况吻合起来。多数人只是坚持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放，如同抓住救生筏一样，因此制定的作战原则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不是什么批评，而是对人本性的理解。当今时代，很少有人具有全面的作战经验。多数人只仅有部分经验便把它当作作战经验的全部。凭一孔之见，以为所见的就是全部问题，这是危险的。但是，既然实际上不可能看到全部问题，那么又如何去发现全局呢？毛对此作了论述，他的回答是，首先应该尽可能多方面观察，然后将所见的各部分与深入研究战争全局联系起来，把局部的经验放在战争全局中的正确位置上。对个人经验的每一个局部都应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可能找到它在战争全局中的正确位置。但是许多人对这个费力的过程既不懂，也没有耐心和愿望，他们是一些“尊重经验轻视理论，因而不可能有全面的观点、缺乏明确的方向和认识的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经过毛在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上阐明的这个过程，片面的经验是危险的，而且比根本没有经验更坏。

为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进行何等程度的研究和准备，毛是这样归纳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懂得战争的情况，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物的联系，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每个具体的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在掌握战争艺术方面是一名专家

〔美〕塞缪尔·B·格里菲斯

【塞缪尔·B·格里菲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他认为，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毛泽东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是新式游击战争。从军事、政治、经济观点上看，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象中国游击战争那样组织完善的游击战争的例子。在他看来，由于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命运是跟农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毛泽东毫不迟疑地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要求革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并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教条主义理论作了修改。

下面这段文字摘译自《毛泽东论游击战》一书"译者的话"和"序言"。】

新式游击战争

1941年7月，中日不宣而战的战争将进入第五个年头。这场战争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是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参加广泛的游击战。战争按照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们在《游击战争》这本小册子里定下的格局发展。《游击战争》于1937年

出版，在“自由中国”广为发行，售价一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红四军前政委的毛泽东，在掌握战争艺术方面不是一名新手。具有正规军和游击队两方面实际作战经验这一点，使他有资格成为这方面的一名专家。

对读过《孙子兵法》的人来说，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孙子写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和兵不厌诈是进攻的基本要点。“声东击西”（声言攻打东方，实际攻打西方）这一说法言简意赅，在今天跟在2400年前他撰写时一样正确。孙子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今日中国的游击战战术。

毛说，广泛的游击战争由于其进行的时间长，空间大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军事进程。这似乎是一种正确的看法，因为从军事、政治、经济观点上看，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像中国游击战争那样组织完善的游击战争的例子。我们海军陆战队人员至今所遇到的只不过是比较原始的，受到严格限制的游击战争。因此，毛所写到的这种新式游击战争可能会使我们感兴趣。

“异教徒”的胜利

毛泽东通晓中国的古典著作，但轻视孔夫子，瞧不起这位古代圣人流传下来的思想体系，并下决心在时机成熟时彻底摧毁这个许多世纪来阻碍中国前进的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

他反复阅读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熟记了《孙子兵法》，研究了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推翻了清朝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并认为，农民经过发动、教育和指导，是可以进行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占一适当地位而进行的革命的。

毛极其尊重群众的力量。他指导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并使他们站立起来。

由于他认为中国的命运是跟农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毫不

迟疑地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要求革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并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教条主义理论作了修改。毛认识到，不管这种理论看起来是多么适合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但不适合于中国。他认为中国革命要以五亿农民为基础，以持久的“人民战争”为基础。这一思想遭到中国共产党内那些盲目追随莫斯科路线、称他为“异教徒”的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斗争中，这位“异教徒”取得了胜利。

毛在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人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形式，并在反蒋以及后来的抗日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形式。

历史又一次证明，这位“异教徒”的预见是正确的。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有游击战争，历史上有过许多成功的游击战领导人。只有当列宁登上历史舞台时，游击队才被注入了强有力的社会成份，即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特性。但是毛泽东首先对“人民战争”作了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现在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一个领导过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的人的著作的价值，并将继续在孕育着变革的社会中产生决定性影响。

革命游击战争中的组织、战略、战术和后勤

毛从不认为只有游击战才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只认为它在持久的革命斗争中是个可能的、自然的、必要的发展阶段。

毛认为这种战争要经历几个阶段。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孤立和地形复杂的地区建立、巩固并保存根据地。

第一阶段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投入这个运动，以便使它逐步具有群众支持这个特点。

在第二阶段，破坏和恐怖活动成倍地增加。他们清除通敌分

子和"反革命分子"；攻击易受攻击的军事和警察哨所；伏击薄弱的纵队。搞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武器、弹药和重要物资，特别是得到药品和电台。随着游击队力量的增大，装备的改进，能力的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铁路和公路运输上。

起初，敌人必须把作战部队的成百上千人转到警戒上。不久，它就得把成千上万人转到警戒上。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敌人战斗力的削弱而增长。

第一阶段（建立、巩固和保持根据地）和第二阶段（逐步扩大根据地）之后是第三阶段，即解决或消灭敌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游击队的有生力量有很大一部分逐步改编成在决定性战斗中能够和敌交战的正规部队。游击活动继续开展，并密切配合正规部队的活动。

情报在计划游击活动中是个决定因素。

游击队情报网组织得很紧密，而且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游击区内，所有的人——老人、妇女、赶牛车的男孩、放鹅的女娃、农民、仓库管理员、教师、牧师、船夫和清道夫都必须无一例外地被当作特务使用。

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游击队使敌人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情报。正如后来在中国的日本人及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那样，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中不断地抱怨搞不到情报，这是一切游击战争都具有的特点。

由于有大量情报，游击队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交战；由于熟悉地形，他们就能利用地形，使敌人陷入困境。游击队只在有胜利把握时才打，如果情况出乎意料地不利，他们就撤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愚弄敌人。他们的进攻来得突然、激烈而凶狠，且持续时间很短。其中许多进攻是骚扰性质的，而其它进攻则旨在打乱敌人的计划，激怒敌人的指挥官，并搅乱他们的思想。搅乱敌人的思想及其指挥官的意志要比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重要得多。

毛曾并非完全开玩笑地说过，游击队必须是逃跑的专家，因为他们如此经常地逃跑。他们避免固定部署，总是努力使局势尽可能地变化多端，从敌人最难料到会遭到攻击的地点和时间发起攻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主动权，确保行动的自由。由于"逃跑"通常是为了诱使敌人上圈套，搅乱其领导人的思想，分散其对即将受到决定性打击的地区的注意力，因此，它是进攻性的。

敌人的后方是游击队的前方；游击队自己并没有后方。他们的后勤问题是用一种直接的基本方式解决的：敌人是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来源。

毛曾经说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按照毛"对立统一"的原则研究一下他的战略、战术理论，是很有趣的。"对立统一"的原则似乎是把中国古代有关阴阳的哲学转用到军事上。简单地说，阴阳是基本的、普遍存在的两个方面。阴阳相对，分别代表着雌雄、暗亮、冷热、退进。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永远不会停止。用辩证法的字眼来说，可把它们比做正题、反题与合题。

阴阳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论点就是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游击队分小组活动，几分钟里就会被消灭掉，这是他们的一个弱点。但由于他们分小组活动，他们就可以迅速地偷偷地进入敌人易受攻击的后方。

按传统的战术，分散力量会招致失败；在游击战中，此战术对于搅乱敌人的思想，保持游击队无处不在的幻觉来说，却是很理想的。

没有重型步兵武器常常是个不利条件。但直到最近，由于必须运送这种武器，正规部队就摆脱不开对公路和铁路的依赖。游击队行动起来又轻又快。他们使危险地形变得对自己有利，并利

用热带雨、暴风雪、酷暑、严寒来为自己服务。长途夜行军困难而危险，但是夜暗却能掩护游击队接近毫不生疑的敌人。

游击战术理论可归纳为“声东击西”（声言攻打东面，实际攻打西面）这四个字。我们发现它表达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即一面分散兵力，一面集中兵力；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并在其最难预料的地点和时间打击之。

游击队精于掩饰和伪装艺术；他们制造假象，掩盖其本来面目。其战术思想机动、灵活，但并不适用于一切特殊的形式。但是毛的战争的基本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总是起着主导作用。

革命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

常有人说，游击战争是原始的战争。这种笼统的说法会把人危险地引入歧途，何况它只是从技术意义上说来是正确的。如果有人认为整个情况都是这样，那显然是错误的。“原始”方式事实上要比核战争，或比由具有传统思想和常规装备的陆、海、空军发动的战争复杂得多。人民革命战争并不依赖复杂机械装置的有效工作、高度组织水平的后勤系统、或者电子计算机的精度来取胜。人民革命战争可以在任何地形、任何天气、任何气候中进行；也可以在丛林、沼泽、山区、沙漠中进行。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因素是人，而人要比其它的任何机械装置更为复杂。人是有智力、感情和意志的。因此，这些战争不但充满并反映着人的令人不那么愉快的品质，也充满并反映着人的令人钦佩的品质。人虽然不总是仁慈的，但至少是有人情的，比斩尽杀绝的战略富有人情。

在美国，我们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使士兵不过问政治，甚至作出更大的努力使政治不触及到士兵，而游击队却恰恰相反。他们竭力保证士兵们有政治修养，在危险情况下也能认清问题。一名经过训练，有纪律的游击队员要比一名用老式鸟枪和自制炸弹

武装起来的爱国农民、工人或学生强得多。他甚至还没有练射击就开始接受教育，不停地接受教育。教育的结果使他成为忠心耿耿、信心十足、目的明确、有政治警惕性的战士。

游击队领导在组织、教育、鼓动、宣传工作上花的时间要比他们在作战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争取人民。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耐心地解说”，“解说”、“说服”、“讨论”、“使信服”——许多中国论早期游击战争的文章都单调地重复这些字眼。毛恰如其分地把人民比作水，把游击队比作水中鱼。只要政治温度合适，鱼虽少，但会茁壮成长、迅速繁殖开来。因此，一切游击队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让水具有并保持适当温度。

毛写道，革命战争中的武装斗争必须与其它斗争形式相结合。他强调，只有游击队和人民之间保持牢固的团结，斗争才能成功。除开很有限的地区外，这种团结将使干涉力量不可能把其意志强加于革命战争。

一切干涉力量都幻想着能够建立一支忠诚有效的反革命力量。侵华日本人未能做到这一点，侵越法国人或侵越美国人也未能做到这一点。

在越南，胡志明、长征和武元甲都是聪明的学生。他们像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样，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政治的继续。我们和在我们之前的法国人都不懂这一点。而正因为我们不懂这一点，我们才被赶了出来。

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军事领袖、军事理论家

〔日〕宍户宽　中山敏雄

【作者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不同，毛泽东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军事理论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几个人当中只有毛泽东把军事问题作为主要课来研究。毛泽东的战争论是以持久为核心的、彻底的持久战理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把持久战理论系统化，提高到现代战争的一种基本战争形态，是毛泽东整个战争论中的独创性部分。文章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军事领袖的最伟大之处，是认识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一事无成。

下面这段文字摘译自日本《进路》杂志1976年12月号。】

中山：去年以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人感到历史的发展告一段落了。今天，我想专门从军事问题的角度，以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思想和红军、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路线为主题，听一听先生的高论。

宍户：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的理论家。但是，我认为，

与马克思、列宁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军事理论家。

根据我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部分是他的军事思想。因此我认为，不理解他的军事思想，也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恩格斯、列宁都谈论过军事，但军事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恩格斯曾写过不少军事论文。他爱好军事，据说他的同伴曾给他起了个“将军”的绰号。但他的军事论文读起来总使人觉得是外行人谈军事。所以，不能说他的论文构成了新的军事理论体系。到了列宁，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处于一个重要的建设时期，但他并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红军建设的指导性论文。特别是具体实施，都全权委托给了托洛茨基。社会主义的军队应该是怎样一支军队？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讲了应该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装这一基本观点。但具体怎样实施却未能解决。我觉得在实践中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及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的正是毛泽东。

中山：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几个人当中，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把军事问题作为主要课题来研究呢？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时代，作为革命的任务和方法，始终没有把军事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没有考虑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我们应该怎样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宾户：对于列宁搞的革命，用我的话说是“趁火打劫”。他利用了沙皇政权昏庸腐败的空子，即所谓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时机，夺取了权力。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是可耻的；相反，我以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正因为如此，革命成功后，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军事问题才突出出来了。而就在这时，出现了八国军队联合入侵俄国的事态。托洛茨基急忙从旧沙皇军队中挑选了三四万名军官，加上士官共 20 万人，把这些职业军人编入自己的部队，建设了红军。

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加强党的监督作用，军队的本质还是变了，从人民的军队变成了正规化的国防军。托洛茨基也曾考虑过

民兵制问题，但是到了以后的伏龙芝、伏罗希洛夫，民兵制就已名存实亡了。到1939年实行军衔制时，民兵制度就被全面废除了。因此，苏联的红军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人民的武装。我想这也是今天苏联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山：这就是说，苏联红军将作为所谓国家的军队发展下去吧。但是，中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军队是党指挥的，军队的建设过程本身也就是革命的建设过程。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宍户：是的。因为出发点不同，所以也就产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毛泽东自己并不是一个军人。我想，在上井冈山之前，他恐怕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事领袖。但这时他感到有必要研究一下初期的红军。可能是在上井冈山后不久，他才感觉到自己有军事领袖的天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山：顺便说一下，最近我从小山内宏先生那里得知，大约是在1924至1925年前后吧，毛泽东在广州开办了一个农民讲习所。据说在那个讲习所里挂有军装和步枪。这说明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军事问题，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建立一支农民军队的想法是由来已久的。

宍户：看来，不武装农民去战斗，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理论在他头脑里早就有了。但是在初期，即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党内并没有过多考虑农民问题。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无产者干革命，而农民只不过是靠不住的同盟者。不唤起无产者在城市夺取政权，革命就不会成功。但毛泽东的做法完全相反。所以在整个瑞金时代，他一直与党中央的看法对立。我认为他是反对派。

中山：据现代评论社出版的《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里面登载的《在外地视察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说，1927年前后，瞿秋白在湖南搞到一本小册子，里面有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瞿秋白等人看了以后大为恼火，从而免去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可以说明，在上井冈山之前他就已经相当清楚地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军事问题了……

宾户：在国共合作走向崩溃的时候，他就是个武装斗争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在这个阶段，他是否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军事领袖还不清楚。但我想他知道这是势在必行。

还有，我觉得毛泽东对所谓军事知识、军事技术懂得并不多。1928年，朱德等人在湘南活动。为了迎接他们上井冈山，毛泽东曾亲自率部出征。在《星火燎原》一书中他说："兵旅之事，未之学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由此可见，他既没有军事知识，也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与朱德会师后，在井冈山可能指挥过几次作战，但那都是例外。也就是说，他不是以司令官的身份，而是以军师的身份来指挥军事的。

中山：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农民起义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毛泽东读过很多古书，这一点他一定很清楚。在统治阶级的武装遍及全国的中国社会，不是通过建立正规军，而是通过武装民众来进行斗争，这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而是把它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与之联系起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与从苏联回来的、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的领导们不同，他那立足现实的做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山：解放军被称为是党的军队，与日本的军队不同，没有文职、现役之分。就拿林彪和毛泽东来说，林彪将军正如有人评

价的那样，具有战术天才，他作为司令官看来是称职的，但在指导战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他终究比不上毛泽东。不仅如此，正像文革后期所受到的批判那样，他并不能全面统帅政治。在中国，军事是受党也就是受政治支配的，从而也就有了司令官和军师。

宾户：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处理的很好。在井冈山时，人民都称他为毛委员。他运用战术很巧妙，士兵们都说："毛委员用兵如神"。在实际的作战和战术运用中，他最擅长的是孔明的设置伏兵，诱敌深入，一举歼灭的战术。但他的本领并不仅限于此，最重要的是，在上井冈山时他就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一事无成。我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位军事领袖的最伟大之处。在当时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心中，人民的军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一涉及到具体怎样建立这样一支军队，概念就变得模糊起来。而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明确提出了，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运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术，坚持长期的持久战，逐步使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这样一条基本方针。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建设

中山：日本似乎没有军师这个概念。旧帝国陆海军的统帅权是分开的，而军事又分成军政和军令两大体系。

宾户：正规化的国防军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军人只从事军事，而不应过问政治。但是，越是现代战争就越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否则就不能进行战争。但军人只应从狭隘的军事观点看问题。

中山：这就是说，要区分各自的职能却又不可能划分得很清楚。作为一名野战司令官，只负责作战、指挥、兵站等军令方面的工作；而身为一名军师，政治战略就不用说了，他还担负着从征兵到训练以及给养、军纪等所有军政、军令方面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把毛泽东比作军师，这对于他创建红军、解放

军的工作是再恰当不过了。

宾户：是啊！真正缔造了解放军的还是毛泽东，虽然把南昌起义定为建军纪念日，但起义以后，共产党的军队——红军究竟是怎样一支军队还不明确。而毛泽东早在井冈山初期就明确提出了：必须建立一支与人民融为一体的人民军队。

中山：我觉得，在他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对他的一系列建军经验做了初步的归纳、总结。但重要的转折点还是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之前进行的三湾改编。

宾户：重要的是，在三湾改编时，明确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说，这个人民军队的纪律在井冈山建军初期就存在了。

中山：上井冈山的一个有趣问题是，他们去的不是无人居住的荒山，而是到土匪、草寇栖身的地方去吸收他们，开辟根据地。

宾户：草寇袁、王等部被改造成了红军的部队。毛泽东说过，我们如果连这些人都改造不了，就更谈不上进行革命。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革命的思想》一书中，野村浩一说，井冈山时期的观点是：人应该是无产者，而工人是无产者的条件，只有无产者才能领导革命。而毛泽东认为：人要向无产者转变，这就联想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这个观点是他的一贯的、基本的观点。从《井冈山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经过一年左右的作战，红军的成份发生了变化，从旧军阀队伍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占了大多数。

中山：人要转变，而且能够转变成无产者的观点，大概是对人运用了矛盾法则才得出的吧。

宾户：虽然说不是无产者就不能完成革命，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约四亿人口中，无产者只有二三百万人。即使这部分人全都具有革命意识，但如果没有其他人，革命也不能成功。因此，他对农民的阶级分析——没有钱的都是革命的，受到了“马

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看来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没有钱是好事，这些人可以具有无产阶级意识。

朱德在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以前，在湘南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朱德的态度是：多多益善。于是队伍迅速膨胀起来。但是正如这一年“八月失败”中发生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农民士兵结果都逃跑了。毛泽东认为这种作法是行不通的。以军队这个执行革命的、党的任务的武装集团为中坚，通过它来领导民众、唤起民众这样一个方式是他在井冈山向瑞金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这是他的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

中山：谈到这儿我觉得毛泽东在红军建设初期的思想基本清楚了。尽管毛泽东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到遵义会议以前，他一直是受排挤的啊！

宾户：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因此，共产国际的代表权力很大，真是狐假虎威。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化名李德，真名叫奥托·布劳恩的人指挥军事。今天看来此人毫无军事修养。但当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所以具有很大权威。他说，红军发展到今天再照老办法办不行了，必须按照苏军的经验做。于是大家就都照办了。这样，毛泽东的意见被束之高阁。总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毛泽东被一直看做是右派。

中山：前面谈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比例。而苏联当时的情况是，在1亿2千万人当中，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约有400万。以此为基础，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这被作为典范强加给中国。

宾户：是的。这就是说一种方式成功了，其他方式就都被否定了。所以，毛泽东从瑞金时代开始，常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伤脑筋。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

中山：再一个问题就是，红军经过长征转入抗日战争，以八路军、新四军的形式编入国民革命军。这时，曾围绕着指挥权是否交给国民党的问题出现了争论。

宾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没有让步。因为他切身体会到，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在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1936 年底，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在 1938 年又写了所谓三大军事论文。至此，他的军事思想体系已接近完善。

抗日战争开始后，立刻召开了洛川会议，决定了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方针。这在他以前的军事思想中是没有想到的。他分析认为：敌人是异国军队，民众在武力压迫下内心并没有屈服，而敌人一心只想占领城市，沿交通线一个劲地向内地深入。这样，在敌后出现了大片空白地带，这正是中共军队活动的舞台。这一结论是他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后得出的。

中山：抗战胜利后，中国又经历了历史上规模罕见的 3 年国共内战。800 万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了。

宾户：国共内战不单纯是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我在给人民战争下定义时认为，对人民战争程度的判断取决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政治所占的比重。政治的比重越大，人民战争的程度也就越高。

中山：毛泽东从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到研究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进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他一面掌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面研究规律性。我觉得这一作法在我们考虑日本的问题时可以参考。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我想，日本的革命斗争并不一定要拿起枪杆子开展日本革命战争……根据日本的情况，应该像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的开头中说的那样：在有条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在

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合法斗争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种迂回吧。欲速则不达——这是毛泽东经历了流血的革命战争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仔细回味吗？

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美〕菲利普·戴维逊

【菲利普·戴维逊，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戴维逊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战略理论是由六项原则组成的，即：了解情况；具体地分析情况；找出互相对立的特点或双方强弱的因素；利用我之长敌之短争取主动；根据情况改变战略战术；观察战争要有远大的目光。

下面这段文字摘译自美国《陆军》杂志1963年4月号（原文由吴敏译）。】

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十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毛把他的成功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战争不是神物，乃是受规律支配的一个事物发展过程。……毛所提出的一些战争“规律”来自何处呢？他通过研究中国著名的统帅孙子（公元前五世纪）和岳飞（1103—1141）的著作，以及后来研究克劳塞维茨、拿破仑和列宁的著作，探索出这些规律。他研究历史并总结自己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融会贯通，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战略理论。

毛的战略理论是简明的。如果它不是简明的，它就不会经受住那么多的考验。但是它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因为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马克思同克劳塞维茨一样，都是黑格尔的学生。毛通常是经过正面论述和反面论述，再得出结论。如讨论中日战争时，他说：“亡国论是不对的”，然后他又说：“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战争将是持久的，但是中国将取得胜利。

一些刊物和书籍引用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作为毛的战略。这是对毛泽东著作理解的错误。他的战略理论是很高深的，很需揣摩的。

毛的既高深而又简明的战略理论是什么？他所说的指导战争的“规律”又是什么？

简要地说，毛的战略理论是由六项原则组成的。

毛的战略理论的基础就是他所说的具体地分析情况。这是他的第一项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在他看来，情况就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情况是会变化的，然而在某一既定时间它又是固定的。

他的战略的形成，是从对情况进行战略分析到战略构思，再到战略行动的过程，而这一切又是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为基础的。

在1946—1948年反蒋战争中，他原先把他的战略划分为三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游击战，相持，反攻。可是，后来他鉴于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强，又把战略方针改变为运动战、局部进攻和全

面进攻三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朝鲜战争中，他又脱离了几乎所有他过去采用过的战术和行动方法。是什么原因？原因是条件变了。

第二项原则是重视情报资料。自己要了解情况，对敌人要封锁消息。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强调这一点。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最重要著作当中，他都引用了古人孙子书上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历次战役中（朝鲜战争可能例外）他对敌人的了解都远胜于敌人对他的了解。他不仅把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的任务交给情报机构去完成，而且把这一任务托付给全军甚至全民。

毛的第三个战略原则是研究双方互相对立的特点。他立足于事实和对情况的分析，推断出战争的特点，指出双方战略的主要方向。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分析了中日战争，并且指出了互相对立的特点。

这一分析中潜有一种好心的宣传，因为在1938年中国遭到日本步步加紧的进攻；然而，历史证明，毛是最好的预言家。

前面三项原则是毛研究战争的基本思想方法。以下三项是作战原则，这些原则规定了他在战争、战役或战斗中指挥部队的规则。这三项原则是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毛非常强调主动性。对于他来说，主动性是战略和战术的关键问题。毛的主动性的定义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他还说主动性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

毛的第二个作战原则是灵活性。它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而采取及时的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

毛的机动性的概念与我们的不同。美国军事思想中的机动性是指在战斗情况下对于情况变化（一般是意料之外的变化）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毛的机动性的概念是，根据情况采用正确的战

术和手段。他警告说，要审慎地使用抄来的原则（例如我们的战争原则），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战略战术。其实，这完全是贯彻他的第一项原则：战略、战术必须适应于情况。

毛提出的第三个作战原则是计划性。毛一方面承认一切战争或战役的计划都可能改变，另一方面又强调计划是必须制定的。毛指出，战略计划比战役计划固定，而战役计划又比战术计划固定。虽然毛从来不使用“目的性”这个术语，但他在阐述计划性时，始终强调我们称之谓“目的性”的这项作战原则的重要。毛说：“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他时刻强调要有远大的目光。

总之，毛的战略原则就是：了解情况；具体地分析情况；找出互相对立的特点或双方强弱的因素；利用我之长敌之短争取主动；根据情况改变战略战术；观察战争要有远大的目光。

朝鲜战争说明了什么？毛在那一次战争中的行动，能否证明本文对他的战略的分析是正确的呢？

毛对1950年秋季朝鲜的形势作出具体分析之后，认为不能让美国向中国边境推进，但只要联合国军猛烈追击溃败的北朝鲜军队，他就得面临这种前景。为了防止这一点，他必须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交锋。

尽管北朝鲜和中国在军力上，特别是在海军、空军和核武器方面要弱得多，但他们具有某些有力条件，他们有适应这次战争的原始性特点的取之不尽的人力。地形对联合国军不利，但对共产党有利。朝鲜虽然比中国小得多，却需要大量人力。中国邻接朝鲜，陆路交通可由中国直达前线，这些都对共产党有利（即使联合国军对中国实施空袭也是如此）。

总的说来，双方有如下互相对立的特点。联合国军方面的长处是有强大的军力，特别是在空军、海军和核武器方面。它的短处是：必须守卫西欧，因而置朝鲜战争于次要地位，地形不利；对

于战争的目标和战争的指导意见不一。

共产党的长处是：中国有雄厚的人力；中国邻接朝鲜，并有直达前线的陆路交通线；崎岖的地形；地面战斗的原始性。中国的短处是军事上居劣势，特别是缺少空军、海军和核武器。

毛在1938年说过："这些特点，规定着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然而毛需要作的事还不止于此，他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打法。他也必须考虑如何运用他的三项作战原则（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来对付美国军队。

众所周知，毛利用突然的行动在战争初期赢得了主动，这就不必详述了。他在夜间使用一支人数和战斗力都微不足道的部队，迅速出击，不惊动敌人。最后，他利用联合国军部署时取得主动。

其次是灵活性。灵活性对于毛来说就是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作得很出色。他改变了某些既往的观念和行动方法，打了他一生中竭力避免的阵地战。他没有指导中国军队进行游击战。地形条件和中、朝民族间的差异（这使中国游击队无法荫蔽于民众之中）都不利于游击战争。最后，他的军事行动没有经过防御阶段。这与他以往各次战役初期的战法都不同，原因是，情况要求战争初期要充分采用出敌不意的行动。

毛制定计划是有目的性的。他不为口号或美好的愿望所迷惑。他所希望的只是联合国军离开中国的边境。如果他想把联合国军从朝鲜驱除出去，反倒奇怪了。因为这会引起美国强烈的反应，进而招致他所不希望的祸事——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空中袭击。运用计划性这一原则的另一个例子是，在他用兵朝鲜很久以前，他就在1950年6月将部队集结在鸭绿江畔，为他后来突然出兵做好准备。最后，他虽然看到了朝鲜停战即将实现，他还是从长期着眼，继续扩大中国军队的兵力，发动进攻。他知道，这样做可以在谁"打赢了"这次战争的问题混淆视听。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毛在朝鲜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原则，都是

他过去借以取得胜利的原则。他又一次证实了这些原则的有用，并表明他恪守这些原则。

不幸的是，许多西方人士并不了解毛的理论，以为未来的共产党的游击战会因袭毛对日本和蒋介石的作战式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因为毛和他的忠实信徒都知道具体地分析情况是毛的战略的基础。他们是根据情况办事，而不是依照过去某次冲突中行之有效的东西办事。

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不记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共产党取得优势的钥匙

〔美〕亨利·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前任美国国务卿。他在许多著作中论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而可以这样说，基辛格博士既是一名外交家，同时也是一名军事问题专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全部胜利或更确切一点地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毛泽东正好像是一个擅长柔道的拳师一样，他总是想趁机使敌人麻痹，并且利用对方的力量来击败敌人，趁着它丧失平衡的时候，在敌人最难自恃的情况下，就下手打击。"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全部胜利或更确切一点地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

益。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执行毛泽东所制定的这套战略。

毛泽东基于大家熟悉的列宁主义学说，即战争是斗争的最高形式，研究出一套军事理论。这套理论表现出高度的分析能力，罕有的洞察力和充分的残忍性。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共产党取得优势的钥匙，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比作能区别本质与非本质问题的望远镜。因此，他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是采取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本质，在于敌对双方的相互斗争，而双方的意图与企图又是保密的。……战争是社会结构中各种基本因素的反映，只有了解了这些因素，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因此，理论是战略的必要基础；理论的任务是使“主观的”估计与“客观的”因素相符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那么，毛泽东的理论洞察力到底给予他以何种启示呢？它揭示了一股横扫世界的革命洪流，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给予这股革命洪流以更大的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引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将这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归纳为如下三项原则，他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

“（一）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二）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三）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引自《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由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不利于共产党采取拚实力的全面战争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转化力量对比的措施。单就每一措施来说，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历次的效果积累起来，却足以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粹军事性考虑为基础来进行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却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毛泽东军事理论一再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要能巧妙地运用兵力，以打击敌人的弱点，力求陷敌于最不利的地位。……他特别强调要能造成敌人的错觉，然后袭击敌人。而事实上能袭击敌人，就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最大限度迷惑敌人的战略，这样就可以利用敌人急于求胜的心理挫败敌人。他以十六个字的口诀来表达这个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着重从精神上疲惫敌人，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特别重视战略反攻。如果由于对敌人的意图未获得足够的情报，而造成战争的部分混乱，则只有引诱敌人在预定的方向前进，才能使情况逐渐明了。当对方在一个含有敌意的地区中前进时，他可能由于过分自信而犯错误，也可能感到难以和狡猾的敌人决战而气馁。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更难获得必要的情报，而采取有目的的行动。根据毛泽东的看法，在敌人进攻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即共产党的精神优势，胜过敌人的兵力优势。如果能对运动中的敌人纵队实施袭击，就更会如此。

因为这样，敌人的绝对优势，就会变成在战场上的相对劣势。战争的艺术就在于：不管敌人总的兵力优势如何强大，都应当力求孤立敌人，并设法对他们加以各个击破。

因此，毛泽东极力反对“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以坚守一个地区和要求速胜的倾向。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共产党的战略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只要在有利于全面战略计划的条件之下，他们是能够自愿地退却的。共产党的优势是基于下述事实：在持久战中，敌人方面的内部矛盾，必然会逐渐成熟。

“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引自《论持久战》）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如果有必要时，甚至也可以利用谈判的手段，对敌人施加精神压力或者使敌人无法获得胜利果实。毛泽东正好像是一个擅长柔道的拳师一样，他总是想趁机使敌人麻痹，并且利用对方的力量来击败敌人，趁着他丧失了平衡的时候，在敌人最难自恃的情况下，就下手打击。敌人要求速胜的心情，被认为是一种弱点，共产党的战略就是要巧妙地利用这种弱点，并等到对方认为：胜利似乎在握的时候，挫败敌人。显而易见，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制定的战略，几乎被完全地运用在朝鲜战争中。

因此，在共产党的思想中，有限战争，在战略上并不是一种失算，而毋宁说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它是利用当前列强的种种成见和内在弱点的、最适合的战争形式。它每一次都可以使对方感到冒险太大，而争夺的目标太小，简直似乎是不成比例，或者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人们对现代武器的恐惧心理，使这种战略获得了额外的活力。一个根据战略原则或兵器体系，制定全面战争

战略的国家，就会给共产党顺利实现其喜爱的迷惑战略大开方便之门。总而言之，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只有对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未作有限战争准备的敌人，才能奏效；这个敌人认为不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所以若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时，必须先假定具有一种在国际关系中，使物质平衡与心理平衡相配合的能力，要能寻获一种行动的典型，使我们的实力和运用这种实力的意志相适应。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的思想，使它对于似乎是毫无收获的斗争，也不至于感到不舒服。而我们却一向相信，全面胜利还有获得的可能性，所以遂难免患得患失了。不管对有限战争作何理解，我们必须赶紧找到一种行动的典型，并建立一种心理的基础，以便消除我们的急躁心理，不至于使时间变成敌人的盟友。今后，在我们的战略中，耐性和机警必须与实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与孙子、克劳塞维茨

〔日〕伊藤宪一

【伊藤宪一，现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曾多次出任日本驻外使馆外交官。其著作《国家与战略》是作者基于长年的外交生涯，经过潜心研究，通过历史和现实，着重论述了什么是大战略，什么是军事战略，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缺少这些战略的弊害。作者在书中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的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逐一介绍，一并对他们的主要战略理论作了评价，其中不乏独到之见。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国家与战略》一书。】

埃德加·斯诺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从纯粹的意义上说，他是数亿中国人民的教师、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桂冠诗人、人民英雄以及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本书要叙述的毛泽东，当然是上述几个方面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

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从他后来人生中发表的讲话和著述看，引用中国的古典著作和故事书籍的地方较多。这些不仅是丰富他的思想的部分知识，而且是形成他的核心思想的主要成分，这一点是能够看清的。

毛泽东的路线，在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得到党中央承认之前的这个期间，他在思想上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抵制和批判以莫斯科留学生，即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控制下的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当时，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革命的理论，还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重要性。以此，确实形成了作为民族传统思想的他自己思想的性格。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即确信自己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特性。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越到晚年，在他的思想活动中似乎越发加深了那含有东方风格的独特性。从毛泽东整个一生看，可以认为，他的思想核心部分是中国文化传统培育起来的，他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使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能适应现代中国的情况和问题，他的思想的基本性格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

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在他的战略思想方面，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基本上属于战略领域的理论。在西欧产生、在俄国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理论，在中国屡遭失败，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被党最后否定之前，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造成了莫大损失。对马列主义的正统的战略理论，毛泽东的战略理论可以说不仅是部分的，而且是整体地作为批判者而不是作

为继承者出现的。

孙子对毛泽东的影响

那么，形成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基础，即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介绍。据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文轻武”的国家，在其战略思想上，主张巧妙地运用外交和谋略手段，旨在努力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使用军事力量极其慎重，当决心使用武力时，很重视在短时间内，在局部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来影响全局的形势。这是军事上的万全主义，是避免决战的思想。可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军事思想具有农业民族的特点。也可以说，这种思想的象征，即中国历代王朝为对付北方“尚武”的游牧民族而不断努力修建并维持的“万里长城”。也许可以说，这是军事上的“弱者”巧妙地运用文化力量，同军事上的“强者”相对抗的战略。

这种战略原则有以下三条：第一，不是拘泥于局部利益，而是纵观全局即“把握全局的战略”原则；第二，抓住人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与敌作战即“动员人民的战略”原则；第三，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游击持久的战略”。

在第一节里，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使用“原理”一词；而在第二节以后，关于马汉、毛泽东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则使用“原则”一词，但这两者都是构成大战略论的要素。这是为了区分一下使用的术语，更多地叙述理论的部分（哲学部分）使用“原理”一词，更多地论述实践的部分（战略部分）使用“原则”一词。当然，这样区分术语是相对的，也是便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战略原则都渊源于光辉的中国战略思想的古典著作《孙子》之中，可以说，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已经开花结果。当然，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到《孙子》而结束，只从“诸子百家”中的“兵家”所留下的“七书”看，除《孙子》外，

还有《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和《李卫公问对》等六本书。就《孙子》本身来说，其思想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它的影响力在其后来的整个历史上未必一直如此，但可以说孙子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栂博先生的《关于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栂博先生在列举《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所引用《孙子》的语句之后说："毛泽东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语句时只作为语言，或者当作谚语；而引用孙子的语句时则从肯定的角度，不仅当作语言，而且采取引用其思想体系的立场。在直接引用的基础上，理解、消化、掌握孙子的思想本质后在选集中加以阐述的地方较多，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并指出，孙子的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栂博先生还说："只要通读孙子的13篇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就能领悟到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两者的共同点和思考根源中的一致性。仅仅这一点还难以断定哪些是毛泽东自己有意地吸收孙子的思想，哪些是作为同样一个中国人而偶然达到一致的，无论哪一面，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只有自古以来中国的和东方的哲学观为主体的思想体系，这一点已得到证实；而且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七七事变中，由西欧大陆学派的战争哲学和军事学培育起来的欧美和日本的军队，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惊慌失措，归于失败。这似乎是面对西方与东方的根本不同点和差距出现的惊慌失措。"并强调指出，这里存在着堪称为由孙子一直传到毛泽东的中国战略思想的睿智。过去，有过这种情况：把《孙子》和《吴子》合为一体称为"孙吴兵法"。如果按照这种作法，即使提出"孙毛兵法"这一称呼，也是顺理成章的。

与军事战略大师孙子反其道而行之

〔美〕斯拉姆

虽然毛不寻求战争并且宁愿用政治行动来推进他的事业，但毛作出不畏惧战争的决定时，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他相信美国一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核武器与群众的坚决斗争相比，并不起决定的作用。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关于前一天丢在广岛上空原子弹的报道，题目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但是，仅仅四天以后又有一篇文章宣称，原子弹虽然有威力，但不应当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在日本投降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联的参战和其他盟国的地面部队。

这第二个观点，直接受毛看法的影响，因为毛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阐述过：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

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毛在1946年8月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中，又明确地和有声有色地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宣称，原子弹是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这符合当时苏联官方的观点，虽然斯大林用的语言没有这样生动。但是到了1948年年初，苏联在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方面获得了进展，斯大林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赞赏，他宣称原子弹是"一个有威力的东西。有一威一力！"毛的观点则至今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个我们在以后会看到。在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时候，由传统和经验形成的个性至少和客观现实同样重要。

从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主要是军事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在此详细来谈。在严格的军事方面，毛的总战略主要和他在1938年著作中有关抗日战争的建议一样，即从以运动战反对强大敌人为主的阶段，转为直接进攻国民党主要据点的阵地战的阶段。1947年，他把红军的作战原则概括如下：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现在，毛和过去一样总认为政治动员和赢得群众同情，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诚然，他仍然相信他在1938年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47年，他号召红军"发扬勇敢

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他也发布了许多“解放区”应当执行的政策，也发布了许多指示，以便巩固革命根据地。当时实行的农村政策要比1937—1945年间的政策激进，因为那时候的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但当时的策略是渐进和适合当地情况的。毛打算仍然把“开明绅士”包括在他决心维持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之内。只在共产党在上述地区控制数年之后，才重新分配全部土地；但打击面暂时不能超过人口的百分之十。毛还催促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在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以种种形式表明了对老百姓的尊重和反对强取豪夺，这就使红军区别于中国农民所见过的一切军队，从而大大有助于赢得百姓的支持。

中国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无疑是历史上一支比较小的但得到群众支持、有献身精神、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一支比较强大的但士气低落、领导无能、不得人心的军队的惊人事例。1945年，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的部队，总数从五十万左右扩大到了约一百万人。国民党部队大约是他们人数的四倍。到1947年年中，经过了一年大规模的内战，国共军队的比例从四比一到二比一，毛才能在一项命令中断言，如果能以同样速度歼灭敌军，那么再有一年，优势将转到共产党方面来。1947年年底，毛宣称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六个月以后，国共部队在数量上的对比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毛的部队已仅稍少于蒋的部队。鉴于共产党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智谋，事实上现在共产党已经更为强大，而且确实在1948年下半年获得了一连串明显的胜利，从而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中国国统区通货膨胀、浪费和贪污猖獗，人民中普遍厌战和憎恨蒋介石，这些也有助于最后的结局。1947年9月，国民党宣布民主联盟为非法，从而把中国“第三势力”（其实从未成为一股势力）中的一大部分推进了共产党的怀抱，这个错误加强了毛的

实力。但是，从纯粹军事方面来说，国民党也打输了，相当重要的是由于蒋在任命重要指挥官的时候，继续顽固地推行任人唯亲的做法。

毛在1948年11月写道，战争进程将比他原来预计的缩短，大约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结束。到12月初，东北和华北实际上已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除了北平和天津附近地区以外，那里大约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队。毛遵循歼灭敌军为决定性目标的原则，指示林彪切勿立即攻打各国民党兵团，在以后的两星期内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方针，这样敌人才不致从海上向南逃跑。这个计划迅速实现，国民党阵地上的五个主要牢固据点，一一被攻破。天津于1月中旬经二十九个小时战斗以后被攻占；傅作义将军为了避免无谓的破坏，北平和平解放。如果共产党继续他们的攻势，整个中国显然都会听从共产党的摆布。

在此关头，南京开始发起和平倡议。蒋于1949年1月1日亲自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的和平愿望，并申明他不计较他继续任职或者隐退，1月21日他把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但是，一方面，他为自己保留了大多数有效的控制手段并利用它们推行他自己放弃大陆立足台湾的政策。另一方面，毛的条件完全可以理解为简直是全部投降，最后，就连国民党内部的主和派也不能接受。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协定最后修正案。次日，毛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共产党部队在三百英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4月23日终于占领南京。几天以后，毛在一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情怀：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正如我们所见，毛虽极钦佩孙子，但他现在却与写“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的军事战略大师反其道而行之。毛提出共产党不应重犯“楚霸王”的错误——指项羽在对汉朝未来的创始人刘邦有生杀之权时，留下了刘邦的命，但最后项羽却被他手下留情的敌人所灭——事实证明毛这个与孙子相反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无意为了一个为主宰中国而同他斗争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人，去冒丧失自己胜利的危险。

他在采取这个立场时，不仅仅和孙子背道而驰。1964 年发表过一篇对这首诗的权威性评论，文中说：

> 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都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其实，在这些“好心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斯大林本人在内。在国内则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毛在 1948 年 12 月 30 日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斥责了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不论如何，不论那些在 1949 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当毛的军队继续胜利进军的时候，毛又一次开始想到了政治问题——筹备成立新政府和新政权将奉行的政策的基本提纲。

毛泽东的战略是具有各种特点的战略的综合体

〔日〕浅野祐吾

【浅野祐吾，日本军事问题专家。在他看来，要了解军事思想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各个时代的战争史和兵家的理论著述及其时代背景。若欲论述这些问题，非宏篇巨制则无法做到。然而，在紧张的生活之中，一般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很难找到读书的时间。基于此，浅野祐吾编写了《军事思想入门》这本通俗读物。书中作者用一章专门阐述了中国军事思想的演变。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军事思想入门》一书。】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那时起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通过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并驱逐了国民党的军队，赶走了外国的侵略者，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常把这些战争的方法称为人民战争。

这种战争方法和传统的战争方式有明显的差别。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作战方法，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中国与列强中的先进国家相比，明显落后。在军事力量方面，尤其是物质战斗力贫弱，不具备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

第二、尽管有以上弱点，但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数亿人口。

第三、其领导人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人民战争，其特点是，依靠总体战进行长期持久战争，发动全国民众投身到以广阔领土为战场的原始的游击战中去，并把这一切置诸革命战略的指导之下。

这种战争方式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对其他后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旋即成了现代战争的一种代表性模式。

在现代的环境中，这种战争方式拥有其得以成立的可能性。然而，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着渊源关系，有很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研究。

不仅于此，这种战争方式在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地位，在现阶段还不宜下结论。下面笔者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的著述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一下他的军事思想的概貌。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的特点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可以说是具有各种特点的战略的综合体。这种战略是防御战略，歼灭战战略，总体战战略，长期持久战略和革命战略等。

（一）防御战略

在以本国的国土和人民为主要作战力量的战争中，这种战略从全局上看是防御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分为三个阶段，即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最后实施战略反攻。在这三阶段的过程中，使其得以成立和发展的战术手段是游击战。

（二）歼灭战战略

贯穿以上三个阶段全过程的思想是，开展以歼灭敌人有生力

量为主要目标的游击战，而不是去占领城市和地区。

这种作战充分发挥了防御的优越性，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

在这种情况下，努力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全歼敌人，并以此来振奋部队的士气，俘虏敌人，夺取敌人的武器。因此，从全局上看它与加强作战能力密切相关，所以说歼灭战战术是战略的重要一环。

（三）总体战战略

总体战的战争样式是在近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形式是以武力战为中心，军队相互间争夺胜利，而众多的国民在后方从事着广义的后勤活动。

但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总体战，全体人民参加战争的程度更高。

没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军队，必须使用人这个战斗力来代替装备，因此所谓“人海战术”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另外，广阔的国土是革命战略的基础，它能够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不可缺少的国力、财力和作战力量。特别是被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精神力量更是“人这一战斗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精神力量可以团结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使歼灭战战略得以实现。

总之，这种总体战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的自然条件——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使人们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团结起来，采用目标在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战略。

（四）长期持久战战略

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是在短时间内结束武力冲突。但是，为了抗击现代化的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除了在战略上应重视上述的国土、人民和革命理论之外，时间要素也是一项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与敌人展开长期的战争，并以此来消耗和疲惫敌国军队的实力，挫败其作战意志。在采用这些方

法的同时，为了坚持住长期战争，还必须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以便在得不到其他国家的物质援助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地积蓄并增强自己的力量。

中国之所以无法实行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其原因就在于它有上述那些条件的限制。长期持久战战略是中国社会建设过渡时期的重要战略。

（五）革命战略

毛泽东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必须依靠武力实现。他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世界只有靠枪杆子改造"。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要打破旧的封建体制，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用革命的意识把人民引入革命洪流中，与此同时还应采取各种方法，运用上述各种战略，以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蓄并增强武装力量。

"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中国特殊的革命理论，它与对世界后进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世界革命思想一脉相通，其基础是进行武装革命的思想。

中国的游击战和毛泽东的基本战术

质言之，人民战争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因而，其战术也是基于这种思想形成的，代表性的作战方式是游击战。

但是，这种游击战是很艰难的，它要对强大的敌人持续地发动进攻，疲惫敌人；与此同时，还必须不断地提高游击部队的士气，即使遭敌重大打击也不能溃散。

另外，人民战争还有一个难点，即在战略上是防御战，而在战术上却又是进攻战。因此，"袭击"、"浸透"、"分散"、"化整为零"、"重视战术上的特殊条件"、"重视有组织地进行作战的条件"等，均是游击战的原则。194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十大

军事原则”，可以说这是形成游击战基础的一般原则。现将其主要内容概要介绍如下：

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夺取地域为主要目标。

4.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避免打那种不彻底的消耗战。

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7.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8. 在攻城问题上，坚决夺取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和据点，相机夺取敌人中等守备程度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城市和据点，对于敌人守备强固的城市和据点，待条件成熟后再加夺取之。

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 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尽可能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综合研究

〔日〕持田真一

【持田真一，日本陆军中校。他在《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长篇论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的战争观；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综合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各篇论文中的理论，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正义性并使之合法化的有利于自己的理论，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实践的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非常富于灵活性，把对方（自由主义势力）的战略的一般观念、信条和规定等等，完全抛在一边，用迥然不同的一套章法进行作战。”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摘自持田真一的这篇论文，原文载译自日本《干部学校记事》1970年1月号。】

一、综合的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策略

毛泽东的战略，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而是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军事等综合起来的战略。这正象上面强调过的那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方面，一方面作为政治家对国家实行最高领导，另一方面作

为军事战略家进行战略战术指导。他最忌单纯军事战略挂帅。革命的政治策略应处于最高地位，而军事则必须服从于政治，这是他不可动摇的法则。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军队的政治性，认为政治是统帅一切的，军事是服从于政治的。军队的实际领导权，一直由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1969 年 4 月召开的中共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 279 名新中央委员中，军人占 126 名（46%），显示出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正在崩溃的倾向，正在朝着军事国家的方向滑下去。军事服从于政治的这一不可动摇的法则被打破了。其矛盾将给今后留下很大的祸根。

二、归根到底超不出陆上战略的范围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共军队是从工农红军脱胎而来的，由于建设海空军的时日尚浅，毛泽东的战略必然是超不出陆上战略的范围。

目前，中共的海军系由近海巡逻舰船和潜艇组成，仅有进行部分海上游击作战的能力，空军飞机数量虽多，但机型大多陈旧，而且区域防空能力很低，支援陆上作战的能力也差。在考虑现有的中共国力国情的时候，可以说，中共军队要想成长为三军均衡的现代化军队并确立综合战略，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很难做到的。

三、本质上是劣势军队的战略，是守势战略，而且是内陆歼敌的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产生的基础是，对极为优势的军队的进攻，用劣势的军队抵抗，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把侵略军打退。为此，他们回避战略性决战，允许在战争初期暂时放弃地盘，排除速战速决、沿岸歼敌的思想，相反，倒惯于使用把敌人引诱到自己所希

望的地区加以消灭的作法，也就是内陆歼敌的思想。

四、只有在整个力量对比有利于共产党，同时对胜利又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采取战略攻势

这也是毛泽东战略的基础，在战略方面他的这一思想是很坚定的。

这种思想，决不否定在局部地区采取攻势，在整体战略的指导之下，当看到一个个战区和战场上力量对比有利于共产党的时候，也决不吝惜采取积极的攻势。如中国事变中的百团大战，以及越南战争的春节攻势等，都是这种战例。

五、面的战略（与点和线的战略相对而言）

毛泽东在1936年7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谈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通过迅速前进和迅速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来实现的）高度的运动战。”在《论持久战》的结论部分也强调了这一点。

在中国事变当中，日军就曾为中共军的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所折磨，就像双脚插进泥淖一样的战场上。日军的战略是占领城市，确保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的交通线，即所谓“点和线的战略”。与此相反，毛泽东是用“面的”战略进行抵抗，并且取得了成功。

六、奇特的战略（不正规的战略）

毛泽东的战略是，与“正统”战略相反的“奇特”战略，换

句话说，也就是与“正规”战略相反的“不正规”战略。毛泽东决不希望采取同对方相同的法则作战，而且绝对避免在对方选择的摔跤场上较量。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进行“不与敌人纠缠”的战争。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一味追求奇特的战略。按照毛泽东的独特的思路，正是为了消灭非正规战才进行非正规战的，这里潜藏着一种一旦有确实胜利的把握就把非正规战转变为正规战的想法。对此必须予以注意。

七、人民战争战略

（一）“人民战争”的概念

经常可以见到“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民族解放战争必须依靠人民战争”一类的话，然而却看不到给“人民战争”下定义的毛泽东的论文以及中共的正式看法。毛泽东在1945年4月所著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使用了“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一说法，可能就是“人民战争”一词的来源。

“人民战争”的原型，就是以游击战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本身。以农村为据点建立农村根据地，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最后以这种农村根据地和人民的力量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占领城市，这就是“人民战争”。其基础是前面一节研究过的统一战线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以及游击战争战略，而且这些战略，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等非军事战略相结合，综合地被加以运用。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曾在他的论文《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中解释说：“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是，把正规战和非正规战结合起来，把正规的运动战、阵地战和非正规的游击战结合起来，同时，把武装斗争同其他的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军事战线上的斗争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战线上的斗争结

合起来的全民战争和总体战争。”这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

（二）从另一个角度掌握“人民战争”的概念

下面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人民战争”的概念。“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对“唯武器论”的一种挑战。“唯武器论”就是“只有武器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它虽然潜在于中共军事界当中，但是它本来是支配现代化军队的思想，而且放开眼界来看是西洋流派的兵学思想。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的是中华思想，它来源于独立自主精神。“人民战争”的概念就是毛对西洋兵学“唯武器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划时代的挑战。

八、总 结

上面进行了综合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精华可以归纳为这样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反“围剿”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美〕斯拉姆

【斯图尔特·斯拉姆，并不是一个军人，更算不上一个军事家、军事专家，只是由于他对于毛泽东指挥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有其独到的见解。故将斯拉姆的这段论述放到这一编中。

从斯拉姆这段论述不难看出，他是熟谙《孙子兵法》的，并能将其与毛泽东的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相对比而论。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斯拉姆的《毛泽东传》一书。】

毛泽东丧失军权一事具有双重的严重性，因为当时红军面临蒋介石的围剿，正在为挽救江西苏区而斗争；毛丧失军权的确给最终导致失败的僵硬战术开了方便之门。1930年夏秋之际，红军攻打长沙和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各派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发现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便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哄，以便对付这一威胁。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春的第二次围剿和1931年夏的第三次围剿，所动用的兵力大不相同，但红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却始终如一。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和朱德上井冈山以后逐步制定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起见，也可以分开来。两个方面看来都是融合了古今的思想，既有传统性，又具创造性。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几个世纪以来，地面部队的作战策略，较之成功地取得人民政治支持的条件，其变化要小得多。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切战术原则，在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崛起的著名军事作家孙子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

首先，其根本思想为每战必集中兵力、以己之相对优势对敌之相对劣势，方能取得胜利。如30年代红军那样，在同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时，显然必须采用这种战术，而孙子早就把它视为一切战争的基本原则：

>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毛泽东将这一基本思想用之于红军在江西反围剿的特殊条件，对它作了如下的阐述：

>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
> ……
>
>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

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上述孙子引文中的第一句和毛引文中的最末一句，清楚地表明了“以十当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便是对自己一方部队的行动必须保密。这是孙子全部学说的基本思想：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毛泽东并未充分发挥这个论点，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保守红军秘密（以及有关敌人的补充情报）实质上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毛援引国民党将官陈铭枢的话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毛的解释，当然是说由于农民群众喜欢红军而仇恨国民党。但同

时，从纯粹军事方面说，他绝不忽视欺诈。毫不奇怪，他直截了当地援引了孙子的论点："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还从他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里学到许多战事中欺诈的作法。

这些都是毛的主要战术原则，它们没有得到"归国留苏学生"的赞同，与此同时，这些"留苏学生"无疑并不厌恶党的领导，而是厌恶毛的高度灵活的战略概念。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井冈山发明的有名四行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毛和朱在第一次"围剿"期间，为了指导敌人包围中的弱小部队，在这些基本是防御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形成了"诱敌深入"苏区的原则，以达到在最有利情况下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目的。无需说明，毛并未想过无限期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与他自己早期的乐观主义相反，他越来越感到斗争的长期性，红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开始战略进攻。从 1931 年 9 月开始，支持"归国留苏学生"领导的秦邦宪和周恩来，批判毛的思想为"游击主义"，认为在已发展成一支几十万红军以及国共之间斗争很像两个国家之间战争的情况下，"游击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坚决主张以"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以及"不打烂坛坛罐罐"这种新口号来代替那些旧口号。

这种战术方针改变之意义和后果，我们只要比较五次"围剿"，就可以非常明白。1930 年 12 月和 1931 年 1 月第一次"围剿"时，由于富田事件，情况变得很复杂，当时富田和东固的群众不相信红军并且和红军对立。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不是精锐部队，在数量上也只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十万对四万，所以

困难并不突出。那时充分运用了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战术，在第一次交战前，须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用毛自己的话说：

……（我们）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

红军第一仗便打着了张辉瓒的两个旅和他的师部，连师长张辉瓒本人在内九千人全部被俘获。这次战争的胜利，吓得另外两师逃跑；共产党追击其中一师，并将其一半消灭。于是第一次“围剿”就以全部失败告终。张辉瓒后来被当地农民审讯后处决了。

第二次“围剿”作为毛战术例子来说，要更加艰苦和有趣得多。对立双方部队，敌军从数量上说处于两倍以上的优势；进攻部队约达二十万人，而红军只有三万余人。这样，首先打击敌军中最弱之部就显得更为重要。红军于4月底5月初不顾有被发现的危险，驻扎在东固二十五天以等待王金钰撤离富田的战术据点。最后时机成熟，红军同时打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总共十一个团，并诱其在富田附近和红军打了一仗。打这一仗的地方，东北距国民党另一师仅三四英里，西南距蔡廷锴精税的十九路军仅十多英里；但他们竟未觉察，因而也未出来干预，真是国民党军“处处黑暗”，而红军“处处光明”。红军在第一仗打赢后，十五日之内行军七百里，又与敌军弱部打五次仗，缴枪二万余支。这样结束了第二次“围剿”。

毛在此后不久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得意心情：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白云山位于福建省边境，接近红军长驱七百里的终点。按照北京发表的注释，直立之云代表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在“围剿”期间红军暂时放弃的根据地里胡作非为的愤怒；“枯木朽株”代表敌人，他们虽然还直立着，但已注定要腐朽灭亡。诗的最后两行，反映第二次“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对几个孤立纵队缓慢推进的失败战术非常气恼。

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努力在战争规模和战术上作出重大改变。蒋介石现在积极起来，亲自到南昌指挥这次作战。在这次战斗中，他还投入了他的十万嫡系精锐部队。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红军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未能像上两次“围剿”时那样预见和制订全部战役的步骤。下面是毛本人对这次“围剿”的叙述，他自己还画了一个地形图。

图中表示了第三次“围剿”时敌我双方的力量部署。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围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

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毛对此次“围剿”的叙述极其有趣，它阐述了如何运用其作战思想——着重隐蔽自己和打击敌军薄弱之点，以及“诱敌深入”根据地之战略。这次讲话中的事实无疑许多都是准确的，但是还不能把这当作对这次“围剿”完整的和客观的报道。